

克氏全集

第二卷

麵包略取

一 九 二 七

MG
DPA1.6
L8

克魯泡特金 著

麵包略取



3 1796 7559 4

目錄

邵可侶序	一
自序一	九
自序二	一四
自序三	二五
譯者序	三〇
第一章 我們的財富	一
第二章 萬人的安樂	一八
第三章 無政府共產主義	三七
第四章 充公	五五

第五章	食物·····	七七
第六章	住居·····	一一八
第七章	衣服·····	一三五
第八章	財源·····	一四〇
第九章	奢侈的欲求·····	一五二
第十章	愉快的勞働·····	一七七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一九一
第十二章	反對論·····	二一五
第十三章	集產主義的工錢制度·····	二四三
第十四章	消費與生產·····	二六九
第十五章	分工·····	二八一

第十六章	工業的分散	二八六
第十七章	農業	三〇二
附註		三三九

邵可侶 (Elisée Reclus) 序 (法文本序)



(南)

彼得，克魯泡特金要我寫些字在他的書前。我便順隨了他的志願，雖然這是使我受着某種的困難。他書中所引的例證很豐富，我不能另外增加一點什麼，現在來替他作文，恐怕是畫蛇添足，反將其中的語力減弱，有違初意，但友誼寬宥我，驅使我不得不違心的做下去了。當法國的「共和黨人」以匍伏「沙兒」(Tsal) 脚下爲無上美味的時候，我却愛與一般被「沙兒」鞭笞，終身被他幽禁於炮臺的暗監中，或縊死於冷院裏的自由人相交往。與這些朋友一塊兒，我暫時會忘却了那些在少年時代高喊着：「自由！自由！」而現在却將馬賽歌 (La Marseillaise) (法國大革命期間中的歌，現爲法國國歌，反對暴君，詞句頗激烈——譯者註) 與「沙兒」頌 (Boje Tsara Khrani) 二調合唱的背叛者的卑鄙。

克魯泡特金的前一本書「一個革命者之言」，特別注重猛烈地批評這又殘酷而又腐敗的有產階級的社會，同時欲喚起革命的毅力來反抗「國家」與資本制度。現在這本書，

是稱頌前書的，語氣較平和一些。牠是向那些有善意而真願襄助社會改造的人說的，並且以很簡潔雄偉的筆法向他們述出「當前的」歷史的變象是如何能讓我們在銀行與國家的廢墟上建設人類的家庭。

我們應該在極廣義上領會本書的題目麵包略取，因為「人不但藉麵包而生活」在某一時代，寬仁厚義的勇士欲化他們社會的正義的理想為活的「現實」，他們的願望并不是祇限於略取麵包，甚至酒或鹽等，而同時須略取一切為生活所必需的，及僅有利於生活的安適的東西；更應該使我們有能力保證一切人們都有需要與享樂的滿足。只要我們沒有做過這第一種的「略取」，只要世上還「有窮的人與我們一塊兒」，以「聚會」二字給這種如兇獸共關一欄似的，時常相嫉而又相毀的人類的集合體，實在是太滑稽，太笑話了。

從第一章起，著者就歷舉人類已有的無限的財富，及自古公共勞動所得的不可思議的機械的工具。就現在說，每年所得的生產物很足以供一切人的麵包，若車區，房屋，可

耕的田地，工廠，運輸的道路，以及學校等極大的資本，自私產一變而為公產。那末，「安樂」亦不難略取：我們可以把我們手邊的力量不用於無用的或矛盾的工作上，而使牠生產人類所需要的食品，住屋，衣服，安適，科學的研究，藝術的修養等之一切東西。

然而，人類領有物的「復原」(Reprise)總一句說，「充公」只能以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去完成；應該破壞政府，撕碎牠的法律，厭棄牠的道德，不顧牠的代理人，而自己順着自己的「創制力」(Initiative)照着自己的「愛性」(Aimée)利益，理想及企圖的事業的性質，盡力去工作。這「充公」的問題，為本書中之最重要的，亦是著者以平靜的態度，明晰的眼光，很簡潔的，一點沒有激烈的詞句，所記述得最詳盡舉至的——這種態度，這種眼光，是研究下次的，已成不可避免的革命的革命所不可缺的。解放了的勞工團體，在國家推翻後，不再來替一班壟斷者與寄生蟲盡徭役，就可盡力於自由工作的有趣的專業，準科學的方法，作土地的耕種，及工業的生產，間有餘暇從事於學問或行業。本書敘述專業的幾頁給我們以很重大的益處，因為其中所敘述的事實，在實際上都已有的，而且

很易不為少數人致富，而為一切人的利益而實行起來。

一般談話的人常以「世紀的末日」(La fin du siècle) 譏那些美少年的惡習，與怪癖；現在不管「一世紀的末日」了，另外還有別的呢？我們已到一個時代的末日，歷史上又一紀元了。我們看見古舊的文明全部都要湮沒，「力」的權利，與「權」的貪婪，猶太粗暴的「成訓」與羅馬險惡的法制，再不能強迫我們；我們傳播一種新的信仰，自此種信仰——

同時即是科學——成為一切探求真理的人的信仰時，「實現」的世界中就有牠的位置了，因為歷史的第一條的定則就是「社會是依牠（社會）的理想而構成的。」陳舊的秩序的保守家怎能維持這種秩序呢？他們再不信仰什麼了；他們既無領導，又無旗幟，他們只可輕率地，無目的地作戰。他們雖有法律與快槍帶棒的警察與襲擊的砲兵來反對維新者，但這一切却不能為一種思想的敵手。任意作惡與專事壓制的一切舊制度不久都會沉沒於一種歷史前的境況中去了。

確實的，當前的革命無論牠在人類的发展中是如何的重要，而根本仍無異於先前

那些革命，完全「突然的舉動」：自然界中所沒有的舉動。但人們可以說，無政府的社會藉幾千百不同的現象，幾千百深遠的改正，已很長久的，很充分的滋長着了。牠到處顯露出來：自由思想脫離教條的死文；探求真理者的天才不願陳舊的法式；人類的意志顯為獨立的行動；誠實的人反抗一切強迫的紀律；彼此隨自己的願欲聯合起來，互相交換知識，而且不要「主人」，手攜着手，一塊兒去重獲他們於生活上應有的部分，及他們需要的完全的滿足，這一切就是無政府，即使牠不自知為無政府，但牠現在已漸漸地使人們認識牠了。當牠的敵衆，再無信仰了的敵衆，在那邊聽「命運」的擺佈，喊着「世紀的末日！世紀的末日！」的時候，牠怎麼不勝利呢，因牠有牠的理想和很大的胆略？

因此，這已顯露頭角的革命將會成功的。我們的朋友克魯泡特金將盡歷史家的本分，先站在革命的時期中，發表他對於由一切人的勞動而成的集合的產業應重歸公有的意見，而且喚起一般怯懦者來作有爲的事業，——這般人對於現世不公道的事實都很有知道的，但不敢明目張胆地反抗這種有無數利益的，與「成訓」的線索繫住他們的社

會。他們知道法律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虛偽的，法官是強者的侍衛，弱者的暴君，生活上合規的行爲，以勞作維持生活的誠實不妥的品格，時常得不到一塊穩定的麵包的報酬，而放小利者不願廉恥的卑鄙，以「押」「當」爲生的借貸人的惡行，於略取麵包與安適的途中，反勝於一切的美德；但他們不依正義明顯的意義，整理他們的思想，決心企圖與行動，他們中大多數爲避免率直態度的危險，而趨入某種迂曲的狹道。例如新宗教論者，他們不能懺悔他們祖先「不合理的信仰」，甘心沉溺於某種更奇妙的神學中，無確定的教條，而失迷於混沌的感情的暗霧裏；有時爲精神論者（Spiritist），或爲「玫瑰十字」黨人（Rose-croix），有時爲佛教信徒，或爲顯聖跡的奇人，又如自稱是釋迦牟尼的僕從，但不費半點力量去研究教義的慮憂鬱症的先生們，及終日煩悶的太太們，假裝着想於肉體的毀滅中來尋求安靜。

但是，這些美的靈魂（Belles âmes）既然不斷地談論理想，請她們安心罷。我們既是物質的生物，我們當然有——那是實在的——想得食物的弱點，因爲我們時常缺乏

牠；因為現在有幾百萬我們的兄弟，斯拉夫人，「沙兒」的臣民及別的幾千百萬人都沒有牠。

然而，在麵包之外，在物質的安適之外，在田莊能給我們的一切集合的財富之外，我們看見有一種新的世界，遠遠地在我們前面顯現出來，在這新的世界中，我們彼此將能圓滿地相愛，充分地滿足理想的高尚的欲望，即一般美的溺愛者，輕視物質生活時，所關他們靈魂的「不解之渴」的欲望！當世界上沒有貧與富之分，當餓者不以憤恨的眼睛望着飽者的時候，自然的友誼就能復生於世，而今日被遏抑的「休戚相關」(Solidarité)的「宗教」就可代替這種虛影的天空的虛浮的宗教了。

革命的成功將超過牠所預計的：牠將更對生命的泉源，洗淨我們與一切警察鋼接近的穢濁，最後將把我們從這些毒害我們生存的金錢的勾當中解脫出來。那時，每個人都能自由地走他的大道；勞工者完成適合於他的工作；探求真理者不隱匿地竭力研究；藝術家也不再為麵包的問題而污蔑他美的理想，總之，一切的人以後都是朋友了，我們

將同心合意地實現那些詩人所瞥見的大事業呀。

這是無疑的，那時人們有時將憶起這些熱心於宣傳，一生曾以亡命與監獄爲生涯的人的名字，知道他們是預備創立新社會的人。當我們讀麵包略取時，我們立即想到他們，他們在囚柵中或在異邦收到這種共同思想的證據時，他們的精神將會舒暢而益壯。著者一定允許我將這部書呈與這些爲主義而受苦的人，尤其是呈與一個極親愛的朋友，他的一生是完全爲正義而奮鬥的。我用不着道出他的名字來，（即馬爾敦（Malrieu）馬丁（Martin）一生坐過二十年左右的監獄——譯者註）他讀到他兄弟的這些話時，他自己能隨他的心的顫動而認識自己了。

（震天譯）

自序一 (俄文本初版序)

本書是 *La Conquête du Pain* 的法文譯本，我想在這裏面，把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盡量描寫其開端的時期。

從政治與經濟上批評現社會制度，並對於代議制，法律與政權等成見，加以分析與反對，我在一個革命者之言 (*Paroles d'un Révolté*) (俄文譯本的名稱爲「現社會制度的崩裂或暴動者的言論」) 一書裏已說過了。他的結論是應該實行充公，即一切土地，積聚的財產，必須爲人類生產與生活的，而現在歸私人所有的，均須把他沒收起來。——至於本書原文則曾載於 *Le Révolté* 報社論欄，後在法國被捕入獄時，遂無機會發表這類文字了。

過三年我又出獄，仍繼續在 *Le Révolté* 報，發表這類文字。那時該報已移至巴黎，因審判應干涉改名 *La Révolte*。

根據我們的意見解說，怎樣實行社會主義，我以為最好不描寫理想，却拿事實來證明，在社會革命時應怎樣進行，方可脫離現社會的制度，達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怎樣是由於環境的自然前進，與我們怎樣去操縱他：即實現社會裏的傾向，或因舊社會根深蒂固，成見尙未完全拋棄，祇能仍循着奴隸的道路，不能去實行共產主義。

我以巴黎做例，是由於左列的原因：

無論任何文明的國家，決不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程度在同一的水平線。在實際上的各部分，總站在不同的階級上。

法國雖經過一七八九年，一七九三年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十九世紀中內部的物質發展（不如英國靠向外的侵略，剝削印度與其他殖民地的利益，合收入總額的半數），與近百年中因政治怒潮而發生思想運動，但法國仍與從前一樣，是無聯絡各部的共同生活，其西北各部比東方的部分，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農民運動的偉大革命，取消了農奴的取贖債務。二、三百年前地主與教堂侵佔的土地，也被農民奪了回來。城裏工匠舉行的

暴動，想消滅城市的半奴隸制，脫離皇帝的獨裁政治。當時這類民衆運動，是限於法國的東西，正東與東南各部，至於西北與正西等處，都爲貴族與皇帝的柱石，甚至在汪台伊斯克（Vandaisk）暴動裏，拿着武器去反對雅谷賓黨的共和。但法國的東西的區分，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現今法蘭西共和國創造時，於選舉國會議員中，須決定共和國或帝國，共和派的選舉區域（選舉國會議員三六三名）適如我所知道的，正合一七八八與一七九二年的農民與市民的暴動地點。自從現在法蘭西共和國成立後，民主思想才傳入西北與西部的農民中去。

法國的東西部分，西南，東北，中央高原與羅那（Rhône）窪地，都如各個獨立的世界。這種分別不但在那幾州的農民中間（猶拉（Jura）的鄉村工匠與勃列東農民（Breton），其民性是兩種不相同的），就是市民裏也是一樣。祇有高賽或聖愛底安與綠昂列恩（Rennes）等處，現在還在教士權力之下，迷信着帝皇的統治！

法蘭西雖經數世紀的集權政府，實際上國家的生活，除表面的官僚聯合外，總是着

個獨立的部分。尤其是意大利與西班牙。因拉丁國家（連法國在內）是聯邦制的國家。但德國的國家派與雅各賓派，常把他們所深恨的個體獨立主義（Partitularismo）在薩克遜谷蒲格阿加脫（Sachsen Kohle-Owoetz）與其皇朝時發生）與各州各城的人民聯邦主義相同。

因此我深信法國的社會革命，無論他的步趨怎樣，總脫不了地方公社的性質，決不是雅各賓派的國家。任何明白本國的法國人，未為雅各賓的集權主義所迷，深知（西班牙的比伊馬爾加爾（Pi-i-Margal）也是這樣說）法國的任何革命，須是一八七一年的獨立公社，即巴黎與聖愛底安所宣布的，與巴枯甯派在馬賽里昂所嘗試的。所以法國國會會議上，決不能規定社會革命，而各城市不服從國會，恐也如一七九二與一七九三年巴黎不服從嚴刻的國會一樣。

大概各地的革命狀況，也視當地的情形與需要而異，一般宣布獨立公社的人，也將自動的解決二十世紀的社會問題。換言之，假定拉丁國家發生社會革命，則必定帶着他

方的性質。基埃里（O. T. Hill）說得非常確切，這是二十世紀城市革命。英國將來也免不了這樣，西班牙與荷蘭的大多數城市，也可說完全相同。我深信俄國各部由城市主動，如不將土地與一部工廠收歸公有，組織農業耕種的團體，或將產業歸社會公社經營，則恐於社會主義上毫無成功（生產工具收歸公有）。

我在 *Le Revolté* 報著文，是供給法國工人讀的，所以就拿巴黎做例，因這是法國文化最高的城市。我想描寫在法國與其近郊，實行社會革命時，即如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受各守舊派的攻擊，也可以支持下去。

本書末所發生的問題，即「到底怎樣生產，」我想盡力在英文本的田莊，工場與手工場中說明。

（賈維譯）

自序一（英文本序）

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占勢力的時論之一，即是說這個思想已經是這樣舊了，然而却從不曾實現過。古希臘的思想家常常有理想國家的計畫；稍後，初期的基督教徒組織了共產的團體；又過了數百年，當宗教改革的運動的時期，便有大的共產結社發生。後在英法大革命之際，這同樣的理想又復活起來；最後近世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爆發了，這個革命受社會主義的理想尤廣。因此便有人告訴我們說：「你們試看罷，你們的計畫的實現期遠遠得很呢！你們也會想到你們對於人類的本性及其需要的了解究竟有沒有些根本的謬誤？」

驕視之，這個反對論似乎很利害。但我們考察人類歷史時若更加精密一點，這個反對論就會失掉力量了。第一，我們看見有億萬的人在他們的村落社會中能夠維持了那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生產的主要器具，土地，歸為公有，並且依據各家族的勢

動能力來分配——以至於數百年之久；我們又知道西歐土地共有制之崩壞，不是從內幕，而是從外部被政府創設土地的獨占幫助貴族和中產階級所致。我們還知道中世紀的都市能夠繼續了幾百年，維持着某種社會化的生產和商業的組織；這數百年都是智識上，工業上和美術上進步最速的時期；至於此等共產制度的衰頹，大半因為當時人們沒有能力，不能聯合農村和都市，農人和市民，協力來反對那個摧殘了自由都市之武力的國家的生長。

這樣來了解的人類的歷史，是並不能供給反對共產主義的論證的。反之，彼却是實現某種類的共產組織之努力的一種連續，這種努力在某時期之內是會得着部分的成功的；而且我們還敢斷言人類至今還沒有尋着依共產的原則，把農業和突然發展的工業以及發展得很快的世界的通商結合起來的適當方式。這所謂世界的通商尤其顯出是一個騷動的元素，因為彼不單是那種遠道的商業和出口而增進自身的財富之個人的或城市的了；而且國民全體，取利於那些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來增加自己的財富。

這些情形，雖開始出現於十八世紀的末葉，然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戰爭之後，才完全發展。近代的共產主義，是不能忘却這些情形的。

我們現在知道法國大革命，在其政治上的意義之外，確實是一七九三和一七九四年法國人民的一種企圖，這在三種不同的方面，和社會主義多少有些近似的。第一就是財產的平均，用很重的累進率徵收所得稅和相續稅，直接沒收土地，然後來重新分配，並且單獨向富人徵收苛重的戰爭稅。第二個企圖就是一種都市的共產主義，日常最需要的消費品，由都市購備，以實價出售。第三是製定標準物價的國家制度，注意生產的實費和相當的販賣的利潤，國民議會很盡力來實施此種計畫，然而快要成功的時候，反動派便得勢了。

這個超著的運動從來不曾正當地被人研究過，然而近代的社會主義却發生於此種運動中，如里昂之南吉 (T'ange) 的福立葉主義，與乎巴布夫 (Babouf) 蓬拿羅梯 (Bonarotti) 及其同志的強權共產主義。恰當大革命之後，近代社會主義三派學理的

偉大建立者——福立葉、聖西門、奧文，以及無國家社會主義的建立者高德亥便並舉起來；而蓬拿羅梯、巴布夫等所創的共產黨的祕密團體，則為後來五十年間武裝的強權共產主義的模範。

實言之，近代社會主義自發生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而且這百年的前半期中，只有兩個站在工業運動先頭的國家——即英法兩國，是有功於完成社會主義的。當拿破崙的十五年慘酷戰爭時，這兩國流血最多，又受着從東方來的歐洲大反動的包圍。

其實，僅僅在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和英國一八三〇——三二年改革運動開始動搖了那可怕的反動之後，直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幾年，社會主義的討論，才成為可能的了。在這些年代之中，福立葉、聖西門、奧文的志望，才由其信徒努力完成出來，取了一定的形式，現在存在的各派社會主義的定義遂因而定妥了。

在英國，奧文及其信徒完成了他們的農業和工業的共產村落的計畫；創立了很大的合作社，想以他們的股利來創立更多的共產殖民地；於是大團結的職工組合（Chart

Consolidated Trade Union) 成立了——這就是今日的工黨和國際工人協會的先驅。

在法國，顧立業派的昆西大朗 (Considérant) 發表了他的超著的宣言，這個宣言包含着資本主義的生長之一切理論上的考察，而且做得非常之好，這便是現在所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蒲魯東完成了他的無政府主義和互依主義 (Mutualism) 不要國家的干涉的思想。路易布郎刊行了他的大著勞動組織，後來便成了拉沙爾 (Lassalle) 的綱領。法之維達 (Vidal) 和德之司太因 (Lorenz Stein) 也做了兩本超著的書，祖述昆西大朗的理論的概念，出版於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四七年，後來維達，尤其是柏加 (Pecqueur) 更詳細地完成了集產主義的系統，維達甚至還希望一八四八年的國民議會以法律的形式來批准彼。

然而那時期的一切社會主義者的計畫有一個共通的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社會主義的三大創始者著書於十九世紀曙光初現的時候，爲社會主義所展開於他們

眼前的廣大的地平線所迷惑了，竟視社會主義爲一個新的天啓，視自己爲新宗教的建設者。社會主義應成爲一個宗教，他們也應像新教會的首領一樣，去規定牠的進行，而且他們在法國大革命後反動的時期中著書，看見彼的失敗方面多過於成功方面，便不信任羣衆，他們不鼓勵羣衆把他們以爲必需的改革實現出來。他們反而去信仰一些大的支配者，和社會黨中的拿破崙。他們以爲那些大權力者也會了解這新天啓的；他看見了他們的共同店住（共產村）或聯合之實驗的成功後，也許會確信這是必要的；他也許會用自己的強權來和平地完成革命，帶來人類的安樂和幸福。那時軍事的天才拿破崙正統治着歐洲，爲什麼一個社會的天才不上前去使新福音實現於歐洲的社會呢？

僅僅到了一八四〇——四八年，人人覺得革命是快要來的了。無產階級在堡壘上樹起了社會主義的旗幟，社會改革者的心中又起了對於平民的信仰了：一方面有的人信仰着共和民主制，一方面有的人信仰自由聯合，信仰勞動者自身的組織能力。

然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中產階級的共和制來了，從此又把希望打破了。共和

制宣布了僅有四個月之久，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暴動，便爆發起來，但爲血潮所鎮壓下去了。勞働者全飲彈而死，羣衆被流放於新金尼亞（New Guinea），最後拿破崙第三的政變又繼之而起。那些社會主義者便受着極猛烈的迫害，其剪除的方法又殘酷，又精密，以至其後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之間社會主義竟完全絕跡；社會主義的書籍也完全散失了，甚至在一八四八年以前人們異常熟習的書至此時也無人知道了。當時流行的思想（卽一八四八年前社會主義根本思想）皆完全消滅，到了現在人們有了此種思想便要視爲新的發現了。

約在一八六六年，新道復活，共產主義和集產主義重測人間，關於實現彼等的方法之概念，却已有了一個很深刻的變更了。對於政治的民主制的舊信仰已消失了。當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四年巴黎的勞動者同英國的職工組合主義者和奧文派在倫敦會見的時候，他們意見一致的第一義便是「工人解放的事應由工人自己去辦。」關於另外的某一點，他們也是一致的。卽勞工組合自身應握着生產的工具，自己組織生產。法蘭

立憲派和互依主義者的「聯合組織」的觀念和奧文的「大團結的職工組合」（現在還在擴大）的觀念攜手，於是國際工人協會便成立起來了。

然而這次社會主義的新復活，也不過有數年的壽命。未幾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爆發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又繼之而起——但隨後社會主義的自由發展在法國又成爲不可能了。可是當德國由馬克思、昂格思的著作中接受了法國「四十八年諸家」（譯者按此係指一八四八年創立社會主義的人而言）的社會主義，即是昆西大朗和路意布郎的社會主義，柏加的集產主義的時候，法國也更進一步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人民宣言他們此後不等待法國進步遲滯的一部分，而立意在公社之內創始彼等自己的社會發展。

因爲這個運動的壽命太短，所以不會生出什麼積極的數果。彼只是公社派；這只能確定公社完全自治的權利而已。然而第一國際的工人階級立刻會看出其歷史上的意義。他們了解自由的公社今後會是實現近代社會主義的方法。那自由的農工業的公社。

(這是一八四八年前英法人常常說起的)並不必像共同居住或二千人的小社會那樣，彼等必須是大的團結，像巴黎那樣，或像小的州縣那樣，更要好一點。那些公社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聯合起來，不管現今的國界分別。(如英國的五港和德國的同盟都市)同時因為要辦公社間聯合的鐵道，船渠及其他的事業，便成立了大的勞工聯合會。

這便是一八七一年後在有思想的工人中，特別在拉丁諸國的工人中間風行的思想。在有些這樣的組織中，其詳情已由生活自己決定了，工人團體知道社會主義的生活形式的方法，由這方面比較由那以國家提取了一切的工業財產和農工的國家組織，要容易得多。

我在這本書裡便想把這些思想多少說明一下。

現在回顧到這本書草完後所經過的許多年的情形，我能以完全的確信來說，這本書的主要觀念是不錯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然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國有鐵路、國有銀行、國有商業在各處都實行了。但是向這方面走的步武，雖然結果能把貨物的價格減低，却

還是工人解放自身的戰鬥中的新阻礙。所以我們可看出在工人中，特別在西歐的工人中間發生出來一種很有勞力的思想，即像鐵道網那樣的龐大的國民的財產，與其歸諸國家管理不如由鐵道工人聯合團體來管理好得多。

在別一方面，我們看見全歐美所作出來的無數企圖，其主要的觀念，一在取回生產機關由工人管理，一在逐漸擴大各都市為居民的利益而行的職務。職工組合主義有一個向着團結全世界的各種職業之發展的趨勢，且不但是改良勞工情形的一個工具，還成了在一定時期中取回生產之管理的一個組織，生產的和分配的合作，在工業上和在農業上的合作，以及在實驗的殖民地地上把兩種合作聯成一起的企圖，和最後那所謂「都市社會主義」的擴大的複雜的領域，——這些便是近來最大的創造力已經發展的三個方向了。

自然，這些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代替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因為這兩者都含有生產工具公有的意義。但我們必定要把所有這些企圖都當作試驗。——像奧文、福立葉

和聖西門在他們的殖民地地上所做的試驗那樣，——這些試驗預備來使人類思慮明曉那共產社會將由此實現的實際的方式。所有這些部分的試驗，將有一天會由文明國的建設天才做出一種綜合來。但這大綜合的建築所用的磚石的樣式，甚至其中某一些房間的樣式，都要由人類的建設天才的絕大努力先預備出來的。

一九一三年一月於北靈頓 (Bridgton) 蕭甘譯

自序三（俄文本再版序）

本書動因是爲法國的社會改造，於二十五年前寫成。當時一般參加第一勞工國際與巴黎公社者，失敗後逃亡異國，目睹反動勢力的勝利，甚至不信社會主義的革命有實現的可能。

那時深信社會革命祇有兩派：一是勃朗克派，他們是中央集權與國家共產主義的信徒，其他是第一國際內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堅決主張無國家與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或者可稱是集產主義。其目的在廢棄資本與國家，我在本書想加以說明。

當然，我也不想描寫社會改造的正確圖案。但我以爲必需把他的大概寫出，使一般革命者對於社會革命時所發生的問題，能先思攷一下。

本書中所解說的思想，在西班牙文本出版以後，立刻得到工人們的同情。麵包略取（是當時本書的名稱）（註）成爲工人間的格言，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有一部分國家，認中央集權是絕大的罪惡，故對於自由公社實行社會革命，得到多數人的同情。

但歐洲的反動却仍加甚，所以各國社會民主派告訴工人說，現在國家權力發展極高，所以革命已不可能。且資本集中，尚未減少許多資本公司，消滅小工業與小商業。自這種學說得勢後，社會革命時期將近的信仰，漸漸地消滅了。甚至我們的友伴中也說，無用討論社會革命的形式，有的人說：「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達到，也許過二百年以後！」

其實這五年歐戰的結果，已證明這種思想的錯誤。一方聯盟國與德國等，在大戰裏面，沒有經過革命，便實行了國家社會主義。英國國家在戰爭的幾年內，國家是麵包，肉，糖與其他大小商業的供給者，牠管理鐵道與煤礦，又為經營糧食的主要人。在他方面法意的市自治會，開始自己製造與支配食品。

所以歐洲社會的不幸，即實行共產主義與各取所需，本書中的推測，竟然都證實了。其他的工人要求也被證實，即工人自己管理工廠與製造場，並參加生產的組織，在戰前認為空想的，現在已為英國所公認，即政府委員會也認為必須組織「工人議會」，以便代表全體產業工人的利益。

最後俄國想把一萬五千萬人民的生活，改造成爲共產主義，已有兩年多了。這次經驗的最大錯誤，是國家集權與官僚性的產物，所以這種試驗可以證明，必須研究生活條件，脫離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過渡到社會的公有制。

人類生活不因初次的失敗而停頓，如各國均在相同的方向上改造，（有許多已在各國開始了。）所以每個社會主義者的責任，是爲着人類與本人盡力，研究更善社會的條件，達到非資本制度，而避免我們現在所受的痛苦，如破壞，悲慘，疾病，浪費與發展惡劣的投機本能。

一八六四年法英工人所組織的第一國際，目的即在研究脫離資本主義，而達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但資產階級與內部的陰謀，致破壞這個國際，後來組織的第二國際，已不是工人的團體，却是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其目的即最初應「奪取政權」，所以社會革命須得政權的援助。至於我們提倡的自下的改造，不依賴中央政府，由人民自己建設，已被認爲玄想

丁。

我們從未做過執政者，所以擱置這些爭論的問題，僅請大家注意下列一點。即我們既重視未來，想目睹真的社會革命的實現，須誠意研究這種條件，使革命可以成功。科學供給我們的，是研究社會的現實力與可能的改造。但我們研究生活條件，並不得自書籍與小冊子，却應實際的參加，如到鄉村，製造場，工廠，鐵路與礦場去，我們須知舊社會的反抗力，明白了解其堅決性質，鼓勵起新社會的創造力。

本書中所指出的，是一種可能的改造傾向，而拉丁國家的公社生產與消費，必可更廣的應用牠，並有公社聯盟解決各州與全民族的問題。

其他一種可能的傾向，也是無政府主義的，即我們工團主義同志布蒞（Pouget）所著的我們怎樣完成革命。他在該書所敘述的，是許多工團主義者的意見，須有職工組織的工團，我希望早日出版俄文譯本。

同時我希望蒲魯東與其美國信徒倍拉米（Bellamy）的社會革命觀，即在平等一

書中所記敘者，也不久能翻成我文（基里渥姆（Gillioh）簡略紀述蒲氏學說的一書甚好。）又因現在俄國盲目崇拜德國社會民主派，所以希望一般人注意英國的市自治的趨勢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此外如拉丁國家的公社主義，即消費的公社化也須加以注意。能略了解上述問題，尙不足把土地，工業與商業等公有，因現在生活須有絕大的變更，所以我們若如從前一樣，毫無生活上的智識，則一切新嘗試必將失敗。

大家一定明白，我重讀這本書感想，牠將爲許多石頭之一，預備建築新社會的堅固房子。牠的基礎不是盲目服從政權，而是羣衆的自由合作。

（註）本書的俄文本爲「麵包與自由」

一九一九年六月於特米脫洛夫村。賈維譯

譯者序

這次費了三四個月的工夫，譯完了這部「麵包略取」後，所感覺到的只是慚愧。我之所以敢於把這拙劣的譯文，獻之讀者諸君，並非因為我的譯文是值得讀的，而是因為原著的偉大，便是極拙劣的譯文，也能表示出彼的好處來。至於我自己，學識既淺薄，對於主義的研究也不深刻，雖想盡力向好的方面做去，但為力量所限，只能產出這樣拙劣的譯文來。

這次翻譯所根據的本子，有三種：(1)一九一三年增訂的英文本，僅有克氏的自序；(2)一九二一年重印法文本，這大概是照一八九二年的原文重印的，僅有邵可侶的序；(3)一九〇九年平民社翻譯的日文本，據說是幸德秋水的譯筆。不過大概以英文本為主，有時英文本所沒有的地方，也根據法文本補入，有些地方也採用日文本的名詞或語句。同時我手邊還有一部人人會同志翻譯的中文全譯本，（未出版，我們最初本想即將

此書略加修改即付印，但一方面因人人會中某同志不願將此書出版，一方面我的意見與此書譯者不同，若加以修改，恐反將原譯者的意思失掉，故決定另起爐灶。翻譯時採取的地方也不少。至於第一章，則以自由月刊第三期上信愛同志的譯文爲根據，略加修改而已。此外同志自性君的第四章和第十三章的譯文，（未發表，）冰絃君前四章的譯文，凌霜君工錢制度和自序的譯文，以及全部的節譯，對於我都有很大的幫助，特別在這裏聲明一句，表示不敢掠美，總之，這部譯本，若有一點好處，都應歸功於原著者和以上的諸人；若有壞處，則應完全歸咎於我。

我自己所很感覺不安的，就是譯這書的時間太短促。我今年差不多沒有過着一刻安定的生活，有時一提起筆，又因爲其他的事不得不立刻把筆放下。雖說從第一頁翻譯起譯到末頁，中間經過了三四個月的時間，然而計算起來，真正安心翻譯的時間還不過一月呢。譯文如有疏漏和錯誤，這也許是一種原因吧。但我不敢以此自護其短，我只希望讀者加以合理的指正。

『原書凡表示主要意義，或當做固有名詞用的普通名詞，第一字母都用大寫，譯文於字傍加○。原書爲給讀者以特別印象用大寫的語句，譯文於字傍加○，原書用斜體字的字句，譯文於字句傍也加○。』

『本書的註分四種：一，著者自註；二，英文本註；三，日譯本註；四，譯者註。』
『本書是在十九世紀所著，所謂世紀是指十九世紀，譯者一仍其舊。』

以上三節是信愛同志翻譯第一章時立的譯例，因爲我仍循此譯例做去，故把彼錄在此。關於本書的譯名也應當說一說：「麵包略取」是日文本的譯名。有人以爲用「麵包之戰勝」好些，有人又把「略取」改爲「掠取」，不過我覺得「略取」要好一點，「略」是「攻城略地」之「略」，而非「掠奪」之「掠」。麵包本是人人應該有的，不幸一般貧民的麵包被人掠奪去了，現在應該略取回來，這個意思是容易明白的。假若讀者還覺得不好，那麼還有一個名稱：「麵包與自由」，這是克氏替俄文譯本所改的名稱。我想，「麵包與自由」倒要好一點，不過因爲「麵包略取」知道的太多了，不如照舊用去罷！

本想請賈維同志用俄文本替我校對一遍，因時間來不及，甚覺歉然，不過俄文本的兩序已由賈維君譯出，這也可爲讀者告慰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於上海。

EXIV

麵包略取

蒂甘譯

第一章 我們的財富

(一)

人類已經過長久的旅路了，在太古時代人類製造粗糙的石器，並且兼着不穩定的狩獵所得的東西來維繫自己的生命，他們所留給子孫的唯一遺產，只不過是避風露的巖窟和幾件粗劣的石製器具——以及那茫茫偉大的，不可思議的，可怖的「自然」，他們爲了他們微小的生存，不得和這自然爭鬥。

在此後物換星移的幾千年之間，人類已漸漸的積蓄了無量的財富。他們開墾了土地，排洩了沼澤，斬伐了森林，開闢了道路，貫通了山脈；他們又不斷地建築，發明，觀察，推理；他們創造出複雜的機械，啓發了自然的祕密，而且終於役使了蒸汽和電氣。其結果，現在文明人的小孩，在他出世的時候，便有前人所蓄積下來的真大資本，這都是預備着爲他

使用的。既有了這莫大的資本，只要再加以自己和他人勞動的聯合，那麼，財富的增多，一定比「天方夜談」所述東方人夢中的豪富還要多些。

土地被開墾的，已到異度寬廣的範圍了，並且適於上等種子的播種，如果再加以熟練和勤勉的工天，便可得到豐富的收穫——這收穫是足以供給全人類的一切需要而有餘的。合理的耕作方法已是知道的了。

在美國的大原野，每百個農夫借助於有力的機械，能夠於數月之內，生產出足以支持一萬人全年的小麥來。假若人們還想得到二倍，三倍，乃至百倍的生產物，只要他們去製造土地，好好地去培養各植物，便可得到這樣莫大的收穫。古代的獵人爲了一家的食物，不得不跑遍五六十方里去搜尋食物；現在文明人只在那地方的千分之一以內，便能更容易，更確實的來養活他的全家。氣候的寒暖也不會有什麼阻礙了。太陽光線不足的時候，可用人工的熱力來代替；用人工光以發育植物的時候也到來了。在同一個地方，用玻璃和熱水管，比較任其自然時，可以得到十倍乃至五十倍的生產。

工業的偉大的成就，更可驚異。靠着那些靈巧的東西（這便是近代的機械，彼等自身是許多無名的發明家三四代苦心的結果）的協力，現在，一百個工人能夠製造出一萬人在二年間所穿的織物；若經營完善的煤礦，一百名礦工的勞動能夠供給每年嚴寒的冬季一萬個家庭煖屋子的燃料。而且我們近時目擊着爲了萬國博覽會，而於一二月之間突然出現的可驚的都市的奇觀，而法國國民的日常工作却絲毫不因之而擾亂。

（註）此指一八八九年及一九〇〇年巴黎的萬國博覽會——資本譯註。

在製造工業中，與在農業中一樣，並且實在與普遍現社會制度全體一樣，我們祖先的勤勞，發見和發明，大抵都是被少數人利用了，然而人類全體只要靠已有的鋼鐵的機械幫助，那麼，社會的各分子都一定能得到餘裕安穩的生存。

的確，我們是富裕的——比我們所想到的更富裕得多；只就我們已有的而論，我們已經是富裕的了；我們現在機械的設備所能生產的，更是富裕的了；從我們的土地，從我們的工業，從我們的科學，從我們的專門智識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如果只爲萬人的安樂

而使用，那麼，我們便是世間最富裕的。

(一)

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我們是富裕的。然則爲什麼還有那許多的貧窮人呢？爲什麼多數民衆還不得不去從事於困苦的賤役呢？在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財富中，並且還有每日數小時的勞動便足以保證萬人安樂的生產機關，爲什麼便是那些得着上等工錢的工人，也還不能得到明日的安全的保證呢？

社會主義者反覆不倦地說及這個問題。他們天天重復的來討論這個問題，並且從科學上的學理來論證彼。這種現象是因爲在那強奪盜竊，被脅迫的遷移與戰爭，愚昧無知，以及壓制等等的長期歷史的歷程中，生產上所必需的什物，土地，礦山，道路，機械，食物，住居，教育，學識——盡被少數人強占去了。這一部掠奪史便是人類不知道征服自然，力以前的生活。這是因爲那少數人憑藉着過去所獲得的假定的權利，依然壟斷着現在人們的勞動產物的三分之二，於是更用極愚笨的，極可恥的方法來浪費這許多搶奪得來

的東西，這是因爲那些少數人使多數民衆陷於不能繼續一月甚至一星期間生活的地位，於是僅允許他們在少數人自己應收得生產物的大部份的這種條件之下而勞動。這是因爲少數人禁止其他的人生產他們的必需物品，而強迫他們去製造那些於大眾的生活不必要而於獨占者却有最大利益的東西。一切社會主義的要領就在這裏了。

試看一個文明的國家。那曾經遮蔽全土的森林已斬伐盡了，沼澤已排洩了，氣候已改良了。這已是適於住居的了。以前僅有下等雜草的土地，現在竟以豐饒的百穀掩蓋了。山谷間的巖壁，已填成平坦，而且還有金色菓實累累的青藤繁茂的掩蓋着。那些菓實苦辣，根不可食的野生植物，經過幾代的培養，也變成了多甘汁的蔬菜和有美菓的樹本了。數千條的通衢和鐵路通過了地面，貫穿了山脈，驚響的機械的響聲，便在阿爾布斯（Alps），高加索，喜馬拉亞的空曠的山谿中，也都能聽見了。河流可通行船隻；海岸經過了精密的測量，也容易泊近了；人造的港灣，經過極力的浚掘，並且防禦着海中的怒濤，已足以作船隻的避難所了。深的礦坑深入在石巖裡面；地底下坎道的螺旋已直達掘煤採礦的

地方。在通衢交叉的地方，大都市勃興了；而且在那裏工業、科學和藝術等的一切財富都積蓄起來了。

遺留給我們的時代以這莫大的遺產的，便是那子子孫孫生長死亡於貧苦之中，受主人的壓迫和虐待，爲勞役而衰殘的累世人民。

幾千年間來，數百萬人民爲斬伐森林，排洩沼澤，開通水陸道路而勞動。便是現在我們在歐洲所耕種的每一路特（Road，英畝四分之一）的土地，也沒有不是曾經遇各種民族的血汗灌溉來的。每一英畝的土地都有強迫的勞動，難堪的苦役和人民的艱苦的歷史。每一英里的鐵路，每一碼的隧道都會吸取過相當的人類的血液的。

礦山的豎坑至今還在石壁上留着那些用勞力開鑿彼的勞動者的鶴嘴斧所造成。的痕跡。地底下礦道的每支柱間，直可以看作礦工的墳墓。在這些墳墓中的勞動者都是因爲蒸氣爆發，巖石墜落，或坑內出水的緣故而短命的；誰能知道這些墳墓已犧牲了那倚靠着死者的微少工錢而活命的家族的若干眼淚，艱辛和說不盡的不幸呢！

以鐵路和水道聯結起來的各都市，都是保持了數百年壽命的有機體。若把彼等下面的地底掘開，你便可見層層疊疊的市街，房屋，劇場，門馬場，公共建築的基礎。你若去探索彼等的歷史，你將知道這都市的文明，其工業及其特質等，在沒有變成現在的樣子以前，還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居民的協力，慢慢地發育而成熟的呢。各種住宅，工場，倉庫，都是那已死了的，埋葬了的數百萬勞動者蓄積的勞力所創造的；便是在今日，彼等的價值也是僅僅靠着住在世界各種地方的民衆的勞力來維持的。那構成我們所謂「國富」(Wealth of Nations) 的分子，因為彼是偉大的全體的一部分，所以才有價值。倫敦的造船廠，巴黎的大倉庫，其位置如果不是在萬國商場的大中心，那麼，還有什麼價值呢？我們的礦山，我們的製造所，我們的工場，我們的鐵道，如果沒有每日從海陸運輸的無量貨物，彼等的價值又將怎樣？

幾百萬的人類不停地勞動着，創造出來我們現在所誇耀的文明。又有幾百萬的人類不停地勞動着來維持這文明。要是沒有了他們，不出五十年之間，我們的世界除了留

存一個荒墟而外，甚麼也都沒有了。

便是一種思想，一種發明，無一不是過去和現在所產生的共有物。那表現人間天才的各種機械的發明，也無一不是由知名的與不知名的，死於貧困之中的千萬發明家所協力而成的。

幾千的文士，詩人，學者，不停地勞動着來增進知識，消除謬誤，造成科學思想的空氣。要是沒有了他們的事業，絕對不會有我們今日這樣可驚的文明的進步。便是這幾千位哲學家，詩人，學者，發明家，他們自己也是靠着過去幾百年間的勞動的幫助，才總成就的。他們在一生中，身心兩方面都受着各種勞動者和工匠的支持與保育。他們的動力也是從環境中得來的。

如西觀 (Seguin) 馬搖 (Mayer) 格勞夫 (Grove) 那樣的天才，他們促進工業向新方面進展確是遠勝於全世界的資本家。但是天才自身還是科學的產兒，也是工業的產兒。直到有許多蒸汽機在萬人的眼前工作了多年，不斷地使熱變為動力，又使動力

變爲聲、光、電，於是天才的睿知，纔能說明機械力的原因，和物力的統一。如果我們十九世紀的產兒終於能了解這觀念，如果我們現在知道怎樣來應用彼，這也是每日的經驗所教我們的。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早已知道了這觀念，並且曾宣示過，然而當時這觀念不能有如何的發展，實在是因爲十八世紀不能像現代一樣，一天一天地伴隨蒸汽機的進步而發達至於長成。

(註) 西觀 (一七八六——一八七五) 法國工程師，最先測定熱之動力的代價說。格勞夫 (一八一——一八九六) 英國物理學家，一八五六年著一書論物力的統一。

試想，因爲瓦特在沙何 (Soho) 尋着熟練的工人把他的理想用金屬體現出來，以完成他的機械的各部分，於是那藏入機械中，比馴馬易馭，比水易制的蒸汽終於成了近代工業的真靈魂；如果瓦特做不到這樣，那麼，我們要經過幾十年間還不能知道近世工業革命的法則呢！

每一種機械都有同樣的歷史，——這長篇的紀錄中，有許多不成眠的長夜，有悲慘

的貧困，有恍然大悟，有無限歡喜，有無名工人世世代代所發見的部份的改良；那些無名工人對於最初的發明所增加的，幾乎少到沒有，然而如果沒有這極其微小的貢獻，許多豐富的理想是不會結果實的。不僅是這樣，無論任何一種新發明，都不過是在機械和工業的廣大世界中的從前無量發明的總合和結果而已。

科學與工業，智識與應用，發見與引入新的發見的實際應用，腦筋的聰明與手腕的機巧，心智和筋肉的勤勞——一切都應該是共同勞動的。無論任何一種發見，任何一種進步，任何一種在人類的財富額的增加，未有不出於過去與現在的心身兩方面的勤勞。然則誰人有什麼權利來專有這無量財富中的一小部份，而且這樣地說——「這是我，不是你的」呢？

(三)

然而在人類所經歷的許多時代的歷程中，那些使人們能生產使人們能增加生產力的一切必需的東西，都被少數人強占去了。將來我們再敘述這種情形是怎樣發生的。

現在，只詳說這件事實而且分析其結果便夠了。

現在的土地，其價值是由於繼續增加的人口之需要而生出來的，但是屬於少數人的了，他們阻止人民去耕種，——或者不許他們用近代的方法去耕種。

各地的礦坑便代表各時代的勞動的結果，其唯一價值是從一國家的工業之需要和人口的密度生出來的，但那些礦坑又是屬於少數人的；他們如果發見了別的，更有利益的投資事業，便要限制煤的採掘，或者甚至完全停止了掘煤。機械也成了少數人的獨占財產。機械本來是由三四代工人從最初的粗拙發明，逐漸加以改良才完成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然而機械仍然為少數人所有。如果百餘年前最初製造出那製花邊機器的發明家的子孫，現在跑到白耳（Bale）和納丁漢（Nottingham）的花邊工場去要求他們的權利，他們將被叱道：『出去！這機械不是你們所有的。』假若他們還想收管這工場，他們一定會被鎗斃的。

鐵路，倘若沒有歐洲那樣華盛的人口，歐洲的工商業及商場，那麼，無論怎樣長的鐵

路都不過是許多無用的廢鐵罷了；但鐵路也是屬於少數股東的，那種股東大概連路線經過什麼地方都弄不清楚；然而鐵路所供給他們的歲入，比較中古時代的王公的歲入還要多些。假若那些爲開掘鐵道的線路和隧道而死的千萬工人的小孩們，迫於飢寒，一日羣集起來，向股東要求麵包，他們便會受着鎗刺和葡萄彈；這樣，他們可以被驅散，『投資者的利益』便可以保護。

由於這種奇怪的制度，工人的小孩生在這世界中，假若他不承認把生產物的大部份貢獻給主人，便沒有他可以耕種的田地，他可以運轉的機械，他可以開掘的礦坑。他不得不爲着很少不確定的工錢，而把勞力售與他人。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曾不斷地勞苦來排洩這田野，來建築這製造場，來完成這機械，他們把全副氣力都用在這事業上面，再沒有餘力可用了。然而他們的子孫一進這世界，却比最下等的野蠻人還貧苦些。假若他要得着耕田的許可，一定是要在貢獻生產物四分之一與主人，又另外貢獻四分之一與政府和經紀人的這種條件之下，才能夠的。這種政府，資本家，地主，經紀人，向他徵的賦稅

是不斷的增加的，這使他沒有改良農事的餘力。假若他改業爲工人，也要在貢獻生產物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與那國家所承認的機械所有主，這種條件之下，才能得到工作；有時甚至到這種條件之下尋求工作，也得不到的。

在從前，假若農夫不將收穫的四分之一貢獻與地主，那麼封建的君主便連一塊土地都不許他去掘，我們不是叫這爲恥辱嗎？我們稱那個時代爲野蠻的時代，但形式雖已經改變了，而實際的關係，現在依然留存着；勞働者在自由契約名義之下，還是有不得不承認封建的義務。因爲無論他轉到什麼地方，總不會有較好的境遇的。萬物都成爲私有財產了，他也不能不承認；不然，只有餓死。

這樣情形的結果，便是我們一切的生產都向着錯誤的方向走去。企業也從不會想到社會全體的需要。彼的唯一目的在增加「投資者的利益」。因此，便發生了市場的不斷變動，定期的工業恐慌，每次總要使數百萬的勞働者迷了路頭。

勞働的人們不能利用他們所得的工錢去買他們所生產的財物。工業遂尋找外國的

市場，在他國的富裕階級中去尋求銷路。在東洋，非洲，埃及，東京（這是安南的東京）或剛果等處，歐洲人決計去促進農奴制的生長。而且他竟實行了。然而在各處他都遇着同樣的競爭者。一切的國家都是向着同一的路線上發展的。於是戰爭，永久的戰爭，爲着爭市場的優先權的緣故而爆發了。爲併吞東洋諸國的戰爭，爲爭海上霸權的戰爭，爲課輸入品稅，以條件要挾鄰國的戰爭，爲壓制叛逆的「黑人」的戰爭，都爆發了！大炮的怒號在世界中不曾停止過；許多種族盡被屠戮；歐洲諸國軍備的耗費，要占全預算的三分之一；我們知道這種賦稅壓在勞働者的頭上，是何等的難堪呵！

教育也是少數人的特權。工人的小孩僅僅在十三歲時，便不得不跑到礦坑中，或在田野幫助他的父親；這樣還說及教育，是徒然的。工人白晝在酷烈的天氣中，做了過度的工作，到晚才得歸家；這樣還向他們說起研究學問，也是徒然的！社會便這樣的分做了兩個敵對的營壘；在這種狀態之下，自由全是空話。那些急進派最初主張政治權利的擴張，但是他剛剛見到那足以引平民向上的自由之呼吸，他便轉換了方向，改變了意見，依然

回復到壓制的立法和殘暴的政府上去。

一大羣的法庭裁判官，執刑者，警察，獄吏等等都是爲着維持這種特權而設的；再由這一羣東西又生出偵探，偽證，間諜，威嚇和腐敗的全組織。

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組織還要阻碍社會感情的生長。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正直，沒有自尊，沒有同情和互助，人類必會滅亡，恰像以強奪爲生活的二三種動物，和蓄奴的蟻族的滅亡一樣。但是這種思想是不合權力階級的嗜好的，他們便苦心慘憺的造出虛偽科學以養成相反的思想來。

巧妙的說教，屢屢說到「有的人應該分給與沒有的人」這題目上面；但是假若有人把這條教義施諸實行，立刻便有人告訴他說，這種美麗的感情在詩歌中是很好的，但不便於實行。我們說：「欺騙是自卑，自悔，」然而一切文明的生活真是一大欺騙。我們使自已，並且還使我們的子孫習慣於那種兩面的道德，過那種虛偽的生活。然而我的腦筋本不安於虛偽，於是常以詭辯來自欺，自解。實在，虛偽和詭辯，已成爲文明人的第二天性了。

但是社會是不能這樣生存下去的，社會必須回復到真理的路上，不然，就會滅亡。

這樣從最初的獨占行爲生出來的結果，瀰蔓到社會生活的全部。人類社會與其坐待滅亡，不如回復到第一義：就是，生產的工具，既然是人類的協同工作，生產物就應爲種族全體的共同財產。個人的專有是不當的，而且有害的。萬物屬於萬人；萬物爲萬人所用。因爲萬人需用萬物，因爲萬人用全力來生產萬物，因爲在全世界的財富的生產中不能估計出各個人的一部份來，所以萬物是爲萬人所有的。

萬物爲萬人所有！這裏有無量的工具和器械，這裏有能聽我們使用的鐵的東西，這是我們稱爲機械的東西，彼能爲我們或鋸，或刨，或紡，或績，或破壞，或改造，用盡原料以生產現代的不可思議的東西。然而沒有一個人有權利去強占這些機械的一個，而且還說：『這是我；你要使用彼，必須就你的各種生產物，納租稅給我。』這又何異於中古時代的王公對農夫說：『這丘陵，這牧場，都是屬於我的。你必須就你收穫的每束穀穗，你所種的每個稻草堆，納租稅給我！』

萬物爲萬人所有！無論男女，只要能夠分担正當的工作，他們便有權利來正當的分配萬物；新生產的萬物，這種分配，足以担保萬人的安樂。什麼「工作的權利」，什麼「把各人的勞動結果的全部給與各人」，這種空泛的方式，早用不着了。我們所宣言的，是「安樂的權利爲萬人的安樂」。

第二章 萬人的安樂

(一)

萬人的安樂並不是夢想。我們的祖先爲着增加我們生產力的累世勞動，便證明出來這是可能的，實實在在做得到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實際從事於生產的人數雖僅有文明國家的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他們所生產的物品却是很多的。能夠使家家戶戶都得着相當的慰安。我們更知道假使現在那些以耗費他人勞動的結果爲生的人，一旦把他們的遊惰時間用來製造有用的物品，那麼，我們財富的增加，當然是以生產者的人數爲比例的，或者還有更多的增加。人類的生產力增加的速率是要超過他的生殖力，這恰和中產階級經濟學的教主（Pontife）馬爾薩斯（Malthus）的學說相反的一個地方的人口愈多，他們創造財富能力的生長便愈速。

因此，英國的人口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九〇年之間，僅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而其生產力的增加，就以最小的數目來計算，也是二倍於人口的增加率，即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法國的人口增加最遲緩，而其生產力的增加也是很快的。雖然農業遭了幾次恐慌，雖然國家常來干涉，還有什麼所謂「血稅」(L'impôt du Sang) (即徵兵) 以及投機商業和財政的拘束，然而過去八十年間法國小麥生產的增加，却有四倍之多，工業的生產更增加到十倍以上。至於美國生產的進步更是顯著。美國的財富並不因歐洲過剩的勞働者的移住而減少；反而因為這個緣故，增加了十倍。

但是這樣的計算，還不足指出在將來更完善的社會情形之下，我們的財富應該增加到怎樣的地步；現在的推算恐怕還不到將來的財富的百分之一。因為現在我們的生產力雖是增加得很快，然而一方面遊民和中間人（經紀）的數目的增加，也是很驚人。的一般社會主義者預料資本會漸漸地自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所以只要把幾個大富翁的財產充公便得了。然而這種預料不惟不能實現，且生出相反的事實，就是那些依靠

他人勞力而生活的寄生者，還是不斷地增加。

在法國每三十個居民中，實際生產者還不到十個人。統計全國的農產，不過是不滿七百萬人的勞力的結果。在礦業和紡織兩大工業中，工人的數目還不到二百五十萬；然而掠奪勞工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在不列顛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從事於紡織業的工人，合女工童工在內僅有一百萬人；從事鑛業的不到九十萬；耕田的不到二百萬。（註一）據最近工業調查的結果，在一切工業中被雇用的男女工及童工僅有四百餘萬。（註二）那些統計學家要於四千五百萬居民中算出八百萬生產者的最高額，便不得不誇大其說了。嚴格地說，從不列顛輸出於全球的貨物，也不過是六七百萬工人製造的。至於那些股東和中間人，他們直接間接斂取勞働者的精華，又插身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坐收厚利，這種人的數目究竟有多少呢？

（註一）法文某國紡織工的數目作「一百零三萬」；英文本及日文本均作「一百萬」；英文本似不應尤

十萬，法文米及日文米均作五十萬，有餘稻田，英文米作不滿二百萬，而法文米日文米均作不滿五十萬。「最近的工業調查」一節，法文米日文米均無。再日文米法文米中只有英格蘭一處略統計，愛爾蘭，蘇格蘭的除外。——譯者。

(註二)在五十三所不同的工業的分工場(內有兵工廠)中，雇有四〇一三七一一工人，在該等維持該道事業中有二四一五三〇個工人。他們的生產總數價值達到一〇四一〇三七〇〇〇磅，而他們的淨產額是四〇六七九九〇〇〇磅——英文本註。

不但這樣，並且那些擁有資本的人，還不斷的要限制生產，來減少貨物的種類。我們且不必說那專門供富人吃的牡蠣，甯可一車一車的被拋在海裏，為的是不拿與平民吃。我們更不必說那些像牡蠣那樣處置的千百種的奢侈品——家具，食物等等。我們只要記着他們怎樣限制生產人類最必需的物品的的方法便得了。那些礦工正預備來，並且也很願意來天天掘煤，送與那些冷得顫慄的人；然而通常他們中的三分之一，甚或三分之一在一星期內不能作工到三天以上，因為場主要維持煤炭的價格，不願因煤的出產加

多而使其價格減低。成千成萬的織工也同樣的被禁止使用紡織機，雖然他們的妻子，兒女只穿着破布，雖然全毆四分之三的人都穿着不像樣子的衣物。

時常有幾百個熔礦爐，幾千所工場休息着不開工，又有許多只作半天的工——然而在每一個文明國內，都有二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他們到處尋找工作，却始終得不到的。

假若叫這幾百萬人來開墾荒地，或把瘠地化為收成很好的沃地，他們將要何等的歡喜呵！一年的方法得宜的勞働，可以使英國內數百萬英畝（一英畝約六華畝——譯者）的荒地如現在所謂之「永久的牧場」生產出五倍多的東西來；更可以使現在一英畝只產出八英斗的小麥的法國南部的乾地，增加五倍多的生產。然而這些勤勉的願意去開拓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仍不得不閒遊。這實在是因為那些土地、礦山和工廠的主人喜歡把他們從公共社會掠奪來的資本，投到土耳其和埃及的公債裏，或投到巴達哥尼亞（Patagonia）的金礦，使埃及的農夫，意大利的流民，中國的苦力作他們的工錢奴隸。

這不過是直接的有意的限制生產；此外還有間接地，無意地限制生產的方法，這便是把人類的勞力耗費在製造絕對無用的，或僅能滿足富人的虛榮心的物品上面。

那富力受間接的限制到怎樣的程度呢？那應該用於生產上的精力，並且特別用於生產所必需的機械的設備上的精力，又被耗費到怎樣的程度呢？我們簡直不能用數目字算出來。我們但看歐洲每年耗費在軍備上的那筆大款，其目的不過是爲着攫取各國市場的霸權，使自己的貨物暢銷於鄰近的地方，俾國內的掠奪更見容易。又每年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供給各種官吏，但他們的職務却僅僅是來維持少數人的「權利」——就是幾個富豪的權利。少數人操縱國民經濟活動的權利，並且還得要耗費數百萬金錢來維持法官，監獄，警察，以及其他所謂正義的附屬物，這完全是耗費於無用之地了。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只要大都會中的貧乏稍微減輕一點，犯罪的事也會因之而減少的。最後我們還要說每年耗費在宣傳毒言邪說的印刷物上，以及爲黨派，一個政治家，和投機的公司等等的利益而出版之捏造事實的報紙上面的金錢，也是有數百萬的。

然而還有前面未舉出來的勞力的浪費。譬如要保持富人家裡馬廐，狗窩，奴僕等引誘交際社會的新奇流行和助長庸俗的大衆的惡趣味的事；又如強迫那些消費者購買他們所不需的物品，或利用誇大的廣告來把劣貨賣與他們這些事；此外還有製造者爲着圖厚利的緣故，去生產絕對有害的物品的^事。這樣的浪費是異常可驚的，假若把這種浪費全用來生產有益的物品，那麼，我們的財富又要增加一倍以上。假若把這種浪費來置備機械，放在工廠與製造所裡，那麼現在三分之二的國民所缺乏的物品，又會充滿於商店中了。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各國的生產者中差不多盤整有四分之一在一年之中有三四個月是得不到工作的。還有四分之一的勞力（其實甚至可說是二分之一的）的結果完全是造就了富人的娛樂和公衆的掠奪罷了。

（註三）四分之一勞力工作，法文本作「四分之一的勞力」——譯者

因此，假若我們考察一下現在的情形，看見一方面文明各國內生產的增加，異常之速，一方面又看見現在情形下直接或間接的限制生產，我們便自然而然的得到一個結

論就是假若把經濟制度改良一下，使得更要合理些，那麼，不到幾年的工夫，必要的生產物便會有很多的積蓄了。到了那個時候，人人都要說：「夠了！夠了！我們的煤炭，麵包，衣服等等都足夠了！我們且休息一下，再來考究怎麼樣纔能好好的利用我們的閒暇，發展我們的『能力』！」

從此，我們可相信萬人的安樂不是夢想了。誠然，在上古時代，人們用盡他一身的力量耕種一畝土地，只得着幾英斗的小麥，並且還要用手來製造農業上，工業上的器具時，這算是夢想的，然而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現在人們已經發明了發動機，只用少量的鐵和幾包煤炭，便能運轉複雜的機械如駕馭柔順的馬一般，在這時候，萬人的安樂不再是夢想了。

但是，要萬人的安樂至於實現，就不應該認這無限的資本——城市，房屋，耕地，工廠，交通的道路以及教育等——為一種可由少數壟斷者自由支配的私產。

這些由我們祖先在困苦艱難中所發明，創造，建築，以至獲得的極富的生產工具，應

該成爲一種公產，使衆人都爲衆人謀最大福利的精神。

應該要有充公的創舉，應該知道萬人的安樂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二)

充公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十九世紀末期的人的一個問題。一切能用於創造衆人幸福的東西統歸衆人所有，這就是近代人最大的要求。可是，這個問題却不能以合法的方法來解決的。現在好像還沒有人想到這裏。窮者如富者一樣，知道非但現在的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將來任何政治革命所能發生的政府也是不能解決牠的。人們已覺到革命之必要了，無論貧或富的人，大家都不掩飾的相信這種革命的日子已逼近了，牠是時時刻刻可以暴發的。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人們的精神思想中，有了一種進化，可惜這種進化全被少數人——換言之，即領有階級——箝制着，未能公然的成爲事實，所以我們須以強力剷除進化的障礙，暴烈的以革命完成進化。

革命從何發生呢？革命怎樣會暴發呢？這些問題都沒有有人敢回答的。這是在不可知之數的。但是這些能觀察而又能反省的人却不至於錯誤的。勞動者與壟斷者，革命黨人與保守黨人，思想家與實行家，大家都覺到牠（革命）已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末，當革命一暴發的時候，我們將做什麼呢？

我們大家都曾用心研究過革命的慘劇的一面，因過去的革命，很少有真正的革命事業，所以我們中有很多人只見到這些大運動的開場，起初幾日的爭鬥，以及爭鬥的寒暄。但是這種爭鬥，這種開始的衝突，不久就會終結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舊政府倒坍之後，才能開始進化，舊政府無力無能了，而又處於四面楚歌中，所以即刻會被暴動的烈燄疾捲而去。一八四八年有產階級的帝政只有幾天就消滅了；並且當法王路易非里勃（Louis Philippe）被載出國後，巴黎就不再顧慮他了。以後濟埃（Frateo）政府也只有幾天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就消滅了，一切都讓巴黎自立。然而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仍只是暴動而已。在平民的革命之前，治者遁匿之快，更有出人意料之外

的。他們逃了，或在別處躲藏再舉，總想另謀方法使自己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舊政府消滅了，軍隊也在平民舉事的潮湧之前狐疑胆怯了，再不服從他們的軍長了；其實，軍長也很聰明，很謹慎的避開戰地了。於是軍隊就交叉着兩手讓革命黨人自由行動了，或者槍托朝天，去與暴動者聯成一氣。至於警察也垂着雙手，不知道應該打革命黨人呢，還是應該喊「市府萬歲」！城內的逃兵也回家去了，「待着新政府之降臨。」有的人整理他們的行箱，逃到穩妥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裏——看哪，一種革命是怎樣暴發的！

在許多大城市中，市府制度也宣告了。幾千幾千人在街上遊行，夜間自己跑到各種臨時會裏去問：「做什麼呢？」並熱烈的討論公衆事務。一切都極關心社會的變動；昨日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日的最熱心的人。到處都有自願犧牲者，各人都有獲得勝利的渴望。偉大的爲人而不顧自己的精神也發生了。平民惟一的願望就是向前進。

這一切都是極美妙，極高尚的。但是這還不是革命。反之，革命的事業，就從此時起啊。

自然，這時不免有乘機復仇的事情。像瓦德林（Wartin）託馬士（Thomas）這類的人因為名聲太壞，不免要受着懲罰；但這不過是這門爭引起的偶然的舉，並不是革命。

社會黨的政治家，急進派，新聞界失意的才子，中產階級與平民的選舉演說家不免洋洋得意地跑到公會堂和政務廳去占一個位置。有些只要掛起金銀的絲帶，就心滿意足。他們還要對着事務所的鏡子，洋洋得意地去學習那種適合於他們新地位的發命令的態度。或者又掛起赤色的飾帶，戴上錦繡的制帽，裝起官僚的模樣以炫耀於從前在工場和事務所中的舊同事。又還有一些人却埋頭於官場文件之間，費盡全身氣力，想整理一點出來。他們要製造法律，還要發布誇大的告示，然而這時再沒有人來奉行這些了，因為革命已起了。

這些人要想使自己握着他們從來未有的強權，他們便依然去要求舊政府的形式來批准。他們便成立了如「臨時政府」，「公安委員」，「市長」，「縣知事」，「保安委員會」等

等的名目。有的是被選出的，有的是自薦的，他們都聚集在議會或公社的議事所裏。這一羣人共包含著一二十種意見不同的黨派，對於革命的意識、態度、目的等，均各有相異的概念。可能派（Possibilists）集產黨（Collectivists）急進派雅各賓黨（Jacobins）布朗基派（Blanquists）同聚於一室，虛耗時間於口舌的爭論中。誠實的人居然和那些正在做權力夢的野心家聚在一塊兒；當那些野心家得勢的時候，他們便要屏斥人民，蹂躪人民的。也們大家各懷着正相反對的意見聚集在一處，組織暫時的聯盟，爲着要造成多數來，然而這多數的壽命只有一天。他們彼此爭論，互相罵爲反動派，官僚，流氓等等，遇事不能有真誠措置的協定，只就極其微小的鎖事爭論；除了發出誇大的布告而外，甚麼事都做不出來。他們大家都以爲自己是占着重要的地位的，而其實，革命的真正力量却在巷衢之間。

這些事在那些平素喜歡看戲的人，倒覺得快意，但這決不是革命，甚麼事都還沒有辦到哩！

在這個時候只有人民受苦。製造所停辦了，工廠關門了，商業也全都停頓了。勞働者甚至不能再獲得他從前的那樣微少的工錢。食物的售價，却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了。但是民衆有英勇的獻身精神，這種精神每次臨到絕大危機，便愈見崇高。他們要堅忍的等待着。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他們曾這樣的說：「我們當忍耐這三個月的艱難困苦，以盡力於共和。」而同時「他們的代表」新政府的紳士諸君以及最卑劣的自負多能的小官僚，還是要按期支取薪俸。

民衆受着苦痛。他們有小孩子那樣的信仰。他們有那些迷信領袖的羣衆那樣的脾氣，他們還以爲在「那裏」——在議院，在公會堂，在保安委員會——有人在圖謀他們的權利。然而實際上在「那裏」所討論的，差不多包括着萬事萬物，獨於民衆的福利一層却並未提起。在一七八九年饑饉蹂躪了法國全境，又使革命中途遭挫折，當人民陷於貧困的深淵的時候；在香愛李塞（Champs Elysees）地方還是華麗的輕車相運，滿載着那些飾珠玉，競艷裝的美女麗人，羅伯司比爾（Robespierre）還催着雅各賓黨討論

他個人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當一八四八年勞働者因工商業總停頓而受苦的時候，臨時政府與國民議會却在討論軍人的餉銀和囚徒的工藝，反把那處在可怖的危機中的人民的生活，置之於不顧。又如那在普魯士砲彈之下而生出來的「巴黎公社」雖僅支持了七十日，也犯了這同樣的錯誤——這種失敗便證明出來：民衆若餓着肚子來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個人每日只得着十五個辨士（法文本作三十個蘇）要同時在陣地上作戰，並且要養活家族，是辦不到的事。

民衆受着苦，他們常自問：「有什麼方法能免除此種困難呢？」

(三)

在我們看來，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必須承認並且高聲宣言：每個人都有生活的權利，不管他在舊社會中的等級如何，不管他是強的，弱的，巧的，拙的；而社會中所有的衣食，應公諸萬人，平均分配。我們必須承認這個，要高聲宣傳這個，更要去實行這個。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置一切事務，使勞動者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在他們的眼前了。從此以後便再沒有人會在鄰近高樓大廈的橋下躺臥了；也沒有人在食物堆積的地方挨餓絕食了；更沒有人會在皮毛堆積如山的衣店旁邊凍死了。萬物爲萬人所有，理論上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最後，歷史上未曾有的真正革命終於來了。這革命却先考慮人民的需要，然後才來賣他們盡義務。

這決不是議會的、法律的、條例所能辦到的，我們必須立刻並且有效地把那保證萬人安樂的一切必要物品占有了，這才算開始我們事業的唯一真正科學的方法，這才是多數民衆所能了解並且希求的方法。我們必須以人民的名義去占領穀倉，衣店，住宅。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浪費的。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組織起來，拯救饑餓，填補缺乏，應付一切需要；不爲某個人的利益而生產，應爲保全社會全體的生活及其發展而從事生產。

『作工的權利』那一類的曖昧的語句，是在一八四八年的時候用來欺騙人民的，到現在還有人仍然用來想欺騙人民，然而這類的語句我們不要了。讓我們大膽來承認：

萬人的安樂既是今後可以實行的，我們必須使之實現。

當一八四八年勞働者要求作工的權利的時候，國有和市有的工場便設立起來了，勞働者被驅到那裏去作苦工，每人每日僅得着一先令八辨士（法文本作四十餘蘇）的工資。當他們要求『勞働的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註）時，政府便回答說：『朋友！忍耐着，政府正與你想好的方法呢！這裏有今天的一先令八辨士。現在且休息一下罷，勇敢的勞働者呵！終身為着餬口而苦鬥！』同時政府又操演大炮，招集預備兵，用盡中產階級所熟知的方法使勞働者自己分裂解體到底，在一個天氣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勞働者往非洲去殖民，要是不去，便處以槍斃的刑罰。這時是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離前政府推倒之期僅不過四個月罷了。

（註四）「勞働的組織」是路易布爾的一部書的名稱。布爾在一八四八年的臨時政府中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當時所組織的國家工場便是模仿布爾的計畫而組織的，但布爾所畫畫的計畫並沒有完全實行。——譯者。

反之，若勞働者去要求「安樂的權利」，其結果，必定是與前不同的。所謂要求安樂的權利，既是占領社會財富的權利——適應家家戶戶的需要去領取住宅，把食物的倉庫收歸社會公有，在熟知饑饉的苦况以後，再來認識富裕的意義。他們宜稱他們對於一切社會財富的權利，這社會財富是過去和現在世世代代人民勞働的結果；並且還要依此手段來享受那資產階級獨占了的科學、藝術的高等快樂。

他們主張那種營適意生活的權利，但他們還主張更重要的權利；這是要決定如何纔是適意的生活，要保證這種適意的生活須生產何物，何種東西是無用而應該排斥的。「安樂的權利」便是說要有過着人類的生活之可能，有養育子孫使之成爲比較我們更優美的社會分子之可能；而「作工的權利」的意思，不過是使勞働者永爲工錢奴隸和賤役者。他們的子孫將永受資產階級的掠奪和支配罷了。「安樂的權利」是社會革命，而「作工的權利」不過是工業制度的踏車而已。

現在是時候了。勞働者應該起來主張對於這公共遺產的權利，並且應該占有這遺

(註五)踏車是從前設在監獄內令囚犯踏磨的東西——譯者。

第三章 無政府共產主義

我們以為無論任何社會，只要廢止了私有財產後，便不得不依着共產的無政府的
方向而行。由無政府生出共產制；由共產制達到無政府。兩者都是風靡近代社會的趨向，
也是追求平等的表現。

在從前有個時候，農家把他們自己耕種出來的穀麥和在茅屋內織就的毛織物看
作自己勞動的生產物，與他人是無關的。但是這樣看法，也是不十分正確的。便在那時道
路，橋樑也是公共修建的；低濕地方的排水，也要靠着公衆的力量；公用的牧場，周圍有一
道籬笆，這也是要衆人共同修補的。一二個人把織布機和染料改良了，而萬人享其益。便
是在這樣的時期中，農家也不能孤立的生活着。萬事都要靠着一村鎮或一公社的人民
合力去做。

況且在今日的工業狀況中，萬物都是互相維繫的，生產的各部門都是和其他的一

切相聯屬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各種工業的生產品，要說是個人製造的結果，要主張一種個人主義的起源，這是不能成立的。文明各國內的紡織業，礦業達到了異常完美的地步，便是由於其他千百種大小工業同時發達所致；這也是由於鐵道路線的發展，大洋間的航行，勞働者的技能之熟練以及勞動階級全體的教育程度漸高等等所致；簡言之，這完全靠着全世界人類的勞働的力量。

開鑿蘇彝士運河，恩虎列拉梭，和造聖哥薩德 (St. Gotthard) 隧道處關節圖者病而死的意大利人，以及爲解放黑奴戰爭而死於槍林彈雨之下的美國人，對於英，法，德業的發達所盡的力量並不減於那些憔悴於滿其斯脫 (Manchester) 和綠昂 (Roubaix) 的工廠中的青年女工，和改良機械的發明家（他們也是依着其他工人的提示而成功的）。

然則，我們對於這萬人的力量所積蓄下來的財富怎樣能計算出來其中各個人所占的實額呢？

假若我們用一般的人的眼光去觀察生產，我們便不能不反對集產主義者的意見。他們以各個人對於財富之生產的勞動時間為比例，來分給報酬，並且以為這可以是一種理想的布置，甚或是向此理想的更進一步。在現社會中，物品的交換價值果能依着生產這件物品所必需的勞動額來計算麼？（如亞丹斯密，李加圖所提倡，而馬克斯所祖述的教義）這問題暫且不論，留在後章再來討論。這裏只說幾句話便夠了：在我們看來，集產主義者的理想決不能實現於以生產機關為公有財產的社會。若要根據這原理，那種社會第一便不得不澈底廢除工錢制度。

集產制度之緩和的個人主義，需不能和一部份的共產主義（生產機關與土地的共有）同時并存。財產的新形式也需要着報酬的新形式。生產的新方法不能與消費的舊形式並存，猶如彼不適合於政治組織的舊形式一樣。

工錢制度是由土地與生產機關的個人私有而生出來的。這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必要條件；即使工錢制度戴着「利益均分」的假面具來騙人，但也免不掉要

同資本制度一齊滅亡的。生產機關收歸公有以後，人人都可以享受共同勞動生出來的結果，這是必然的事實。

(註)「利益均分」(Profit-sharing) 法文本作「勞動券」(Bons de Travail)——譯者

我們更以為共產主義不僅是值得希望的，便是建設在個人主義上的現社會也是不可避免的。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進行的。最近三百年間個人主義的發達是由於個人爲着抵抗資本與國家的威權，保衛自身的努力。有一個時候，他（各國人）以爲自己能夠完全脫離國家與社會的羈絆，而那些代他表示出他的思想的人們也是這樣的宣稱。他說：「我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能用金錢購得。」但個人却走上了錯誤的路，近代歷史已教他承認假若沒有萬人萬物的幫助，便縱有金銀滿箱，也仍不會做出一件事來。

實在，在近代史中我們可看出隨着個人主義的潮流前進的有一種傾向，一方面保存着古代的共產主義的遺物，一方面在近代生活的一切事物中，建立起共產主義的原

當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紀的「公社」脫離了宗教的和習俗的君主的羈絆時，他們的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便立刻很快的發展擴張起來。都市（不是私人）裝置了船舶，準備了遠征貿易隊，把他們的製造品輸到他處，由這外國貿易得來的利益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全體。並且由都市購買糧食以供市民的需用。到了十九世紀這種制度的遺跡還存留着，平民便把彼等的紀念傳爲口碑，異常讚歎，景仰。

可惜現在都不見了。但是在鄉鎮中，仍竭力保存着這共產主義的最後遺跡——其結果是很好的，——只要國家不來害妨。

同時，那些建設在這同樣的原則——各取所需——上面的新組織，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勃興起來了；要是多少沒有共產主義的酵母，現社會便不能夠存在。雖然現在的商業制度足以使狹隘的利己思想深入人心，但這共產主義的傾向，仍不斷的發現，並且還以各種方法影響吾人的活動。

在從前，橋梁是要徵稅的，現在却成了共有財產，任人通行了；從前要向旅行者徵收

通行稅的道路，現在也是任人通行，只有偶爾在少數東方諸國中還要徵收這樣的稅。博物院，自由圖書館，免費學校，兒童的無費食堂是很多的；公園，花園都開放了，任何人都可以去遊玩，鋪石燃燈的街衢，萬人都可自由往來了；水也無限制的供給萬家取用了。——這樣的一切設備都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原則上面。

電車與鐵道已經發售一月或一年的長期券了，乘車的次數是不限制的。俄羅斯和匈牙利兩國的鐵道已通用帶域制度（Zone System）的車票了，這種車票可使乘客以同樣的車費行五百哩或八百哩的路程。（註）這與郵政所採用的票價均一制相差不遠。在一切革新事業中都有一種傾向，就是不計較消費量之多寡。一個人要走八百哩，另一個人要走五百哩。這是各個人的需要。為什麼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二倍於他人的需要，他便應該付出二倍的價值來，這是沒有充足的理由的。就便是在我們現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其朕兆已這樣的顯現出來了。

（註）法文本僅有匈牙利一國，無俄羅斯；八百哩及五百哩。法文本作「五百及一千哩乘乘。」

此外尚有一種趨勢，雖然這還是極其細微的；這便是對於各個人的需要並不較量其過去和現在對於社會所盡的力如何。我們既把社會看作一體，各部分互相密切的結合着，所以盡力於一人，便是盡力於全體。

假若你們走進一個公共圖書館——例如不是巴黎國民圖書館，而是倫敦博物院，或柏林圖書館——那館員並不問你們在社會上所盡的勤勞如何，只要你們要看書，一本或五十本他都會立刻給你們；假若你們不會檢尋目錄，他還要來幫助你們。若有會員證書，（有許多以勤勞來代替）還可以到各學術協會的陳列所，花園，藏書室，實驗室和每年的講演會，不管你們是達爾文或平常的人。

在聖彼得堡（後來改名彼得格勒最近又改爲列甫格勒）假若你們從事於某一種發明，你們可以到特別實驗室裏去，在那裏你們可握着坐位，一個木匠用的凳子，一個旋轉的車床，其他一切必需的工具，以及科學的器械，只要你們會使用，你們便可取用。

的；至於在裏面時間的長短也是隨你自己的意思。那裡有的是工具，又有各種技巧的職工同伴，你要使他人感興趣於你們的思想，便與他們合作也可以，或獨自工作也可以，都隨自己方便。將來發明出一架飛行機或什麼都不能發明——那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你們從事於實現你們的理想——那就夠了。

同樣，那些駕駛生船的人也不會去求破船水手的身價保證，他們立刻開船，冒着怒濤狂瀾的危險，有時甚至有滅頂喪身之禍；他們犧牲一已的生命去救那些不知名的人。何必定要知道他們呢？「他們是人類，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只這兩句便夠了，他們的權利由此便可成立了。）快去救他們！」

這樣看來，可見便在我們於假定的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共產的傾向已向各方面勃興起來了。

假設我們大都市中的一個在平常是自私自利的，一旦遭了禍患——譬如說是被圍攻了——這自私自利的都市也要最先安置城內的老人和小孩，並不問這些人平日

對於社會會盡力與否，也不問他們將來能否盡力於社會；却先去養活他們，然後才來照顧戰士。域內的男女都爭先恐後的來看護那些負傷者，並不以他們所表示出來的勇氣和才能來分別待遇的優劣。

這種傾向存在着。當我們各人的迫切需要滿足後，我們便會覺察出這種傾向，彼的發達是與人類的生產力成正比例。每每到日常生活的淺陋的成見被一個偉大思想驅逐去了的時候，這種傾向便成爲一活潑的勢力。

然則，到了生產機關收歸萬人使用，一切事務均依共產主義而行，勞働在社會中占着最尊貴的地位，生產出超過萬人所需要的物品的時候，我們還疑惑什麼呢？——這種已經如此有力的勢力，要擴張彼的活動範圍，直到彼成爲社會生活之主宰的原理爲止，我們還疑惑什麼呢？

由這些徵候推來，我們更考究後章所論的充公的實際方面，我們可決定當革命破壞了保持現在制度的權力的時候，我們的第一責任便是不猶豫的去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我們的共產主義並不是福利業 (Welfare) 及其同住居論者 (註) 的共產主義，也不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共產主義。這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共產主義，即是說沒有政府的共產主義——自由的共產主義。這是我們人類經年累月所追求的二大理想之總合。這二大理想是什麼呢？——經濟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註) 福利業是著名法國社會主義者。法文本無福利業，只有共同居住論者。共同居住論者係依日爾曼文

爲 (Phalanstions) 即指福利業。派倍德。福氏的理想社會組織是該國府 (Phalange or

Phalanx) 由四百個家庭約千八百人成的團體生活，住在叫做法蘭司維爾 (Phalanstère) 的

共同建築中，故福氏一派倍德又稱 Phalanstérien —— 譯者。

(11)

我們把「無政府」當作我們的政治組織之理想，不過表示出人類進步的另一個顯著的傾向。當歐洲各社會每發達到某一點的時候，彼等便打破了強權的束縛，而代替以一種多少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原理上的制度。並且在歷史上我們也可看出在每一部分

或全體的革命的時代，舊政府已推翻了，經濟和智慧的地位必定要突然進步的。在中世紀的公社自由獨立後的情形是這樣，公社的紀念物，（由各基爾特的自由勞動產生出來的），其技巧真是千古無比；在農民大暴動發生，隨後便引起宗教改革，動搖了教皇的權勢，那時的情形是這樣；舊世界（指歐洲——譯者）的不平者在大西洋對岸所創設的，僅有暫時自由的社會（指美國——譯者）也是這樣。（都逃不了歷史的公例的。）

假若我們更來觀察文明各國現時的發達，我們可很明確的看出一種更顯著的傾向，就是逐漸限制政府的活動範圍，而增加個人的自由。這種進化雖不免為舊制度和舊迷信的斷片碎瓦所阻礙，但仍不斷的進行於我們的眼前。這也是和其他的進化一樣，只待着革命的爆發來掃去阻塞進路的舊障礙。那麼，進化便可在再造的社會中尋着自由活動的範圍了。

人們費了許多力要想解決那不可解的問題——建設一個一面說是社會的公僕，一面又壓迫個人使之服從的政府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直到後來才想到從一切

形式的政府下解放出來，只以那些由具着同一目的之團體和個人間的自由契約而成立的組織來滿足他們的欲求。於是各小地區的單位，便成了迫切的需要了，以互相意來代替法律；脫離現在國家的界限，以共同的目的和見地來處置個人的利害。

從前人們所目爲政府的功用的一切，現在都成了問題了。事物的處置無須乎國家的干涉，已經是更容易更滿足的了。我們考察向着這方面的進步，便一定要得着下面的結論：人類的傾向是減少政府的干涉，以至於零；實在就是要消滅那不公平、壓制、獨占三者的化身——國家。

我們已能夠大略的看出將來的世界了。在將來世界中維繫個人間結合的，不是法律，而是社會習慣——我們各個人所感覺到要求鄰人的扶助，合作與同情的這種需要的結果。

不消說，這種無國家的社會的思想，是有許多反對論的；至少那種廢棄私人資本的社會的經濟論是一定有人反對的，我們大家從小所受的教育都以爲國家之建立是出

于神意。我們在學校中所學的羅馬史，後來我們習羅馬法時所研究的東羅馬法典（註）以及在大學中所習的各種科學無一樣不使我們迷信政府和神意的國家的德行。

（註）東羅馬法典（Byzantium Code）康士坦丁大帝於紀元前三二六年移羅馬都於（Byzantium）（即現今之君士坦丁堡）是為東羅馬。故東羅馬法典作（Byzantium Code）——譯者

要保持這種迷信，哲學的全系統便造好了，並且輾轉的教授。一切的政治都基礎在此種原理上面。無論何種色彩的政治家都來向人民說道：「給我的黨以權力；我們願意並且也能夠使你們脫離壓在你們身上了多年的困苦。」

我們從搖籃裏到墳墓之間的一切行動，都是受着此種原理的支配的。試翻開本社會學或法理學的書，我們便可看出政府及其組織，其行為等等占去了一大部分，因此使我們不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治社會外甚麼都沒有似的。

（註）政治社會係依日譯法文本作（hommes et États）英文本作（the world of statesman）

——譯者。

報紙也同樣的使我們相信這些。全篇都是討論國會的辯論和政治的陰謀的；至於人民的日常生活，僅僅在經濟問題，法律案件或警察文告的欄裏說到一點。當我們讀報紙時，很難使我們想起那些生的，死的，知道悲傷的，勞動的，消費的，有思想的，創造的無數的生物（即全人類）；我們只看到那些「偉大的」少數人，他們乘着我們的愚昧無知，擴大了他們的陰翳，把全人類都遮掩了。

我們再來觀察生活的本身，看看實際的社會，我們便知道在其中，政府的事業是異常微小的，這是令人驚奇的事。巴爾扎克（Balzac）（註）曾描寫過幾百萬的農民一生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只知道繳納國家，強迫他們納的重稅。每天都有幾百萬件的事進行了，並不要政府的干涉。其中最大的事，如商業貿易之類，縱使訂契約者的一方面有不履行契約的意思，也不必訴於政府了，假若你一個熟悉商業情形的人談話，他便會告訴你，商人間每日的貿易要不是以互相信用為基礎，便是絕對不行的。凡賤賈的習慣和保全信用的存心，皆足以維持此種交際上的信用。便是那種人他們把有害的藥，包扎

得很精緻，來買與他人，甚至來買藥者，審害了還不悔恨；然而爲名譽起見，他們還是要能守着他們的信約。在現在以賺錢爲唯一目的和唯一誘因的社會情形之下，實際上的道德居然也還能發達，那麼，到了社會不基礎在壟斷他人勞動的結果上面的時候，那種急遽的進步，我們還可以疑惑麼？

還有另一個顯著的事實，這可以作現代的特質，且更足以證明我們的思想的正當。私人創意的事業不斷的擴充下去；一切種類的自由組織也異常發達。在後面「自由合意」一章內我們要詳細的討論一下。在這裏我們只說明這種事實是很多而很普遍的，已成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精神。雖然那些政論家和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把這種事實全然漠視不顧，只向我們說起政府的職務，但這類事實仍是一樣的發展的。

這些自由的，各種不同的組織都是我們的文明的自然結果。彼等發展得很快，並且很容易的團結起來；彼等是文明人的需要繼續增進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彼等代替了政府的干涉，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們必定要承認彼等是社會生命的一個重大要素。假若

彼等不能蔓延到生活現象的全部，這實在是受了工人的貧困，現社會中的階級，資本之私人壟斷以及國家等等的絕大阻礙。要是把這些阻礙物除去了，我們便可見着文明人活動的無邊田野都會被彼等所掩蓋了呢！

近五十年的歷史便足以證明代議政體，完全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所希望彼做的，彼定全做不到。在將來，必有人引起十九世紀來作爲目擊着議會政治失敗的證人。

議會政治的無能，衆人都明白了；議會政治的缺點和代議主義的固有弊害是異常明顯的，那些研究彼等的少數思想家如彌爾（G. S. Mill）奈渥爾德（Leverdavs）等不過以文字來表示一般人民的不平罷了。實在要指名少數人並向他們說：「請製造法律來規定我們一切活動的範圍，縱然你們一點都不知道，也不要緊。」這樣的荒謬，也是很容易知道的。

我們漸漸知道了多數政治不過是把國內的一切事務委之於一般毫無定見，只在議會和選舉會中占大多數的人們的手中罷了。人類不得不去尋求新的方法，而且現在

已經得着了。

萬國郵政聯合，鐵道聯合，以及各種學術協會已把自由合意足以代替法律這好例子指示與我們了。

到了現在，凡散處在各地的團體，爲着某一件事情要聯絡起來，也用不着選出幾個「萬能的人」組織一個國際會議來處置一切了。（註）他們採用另一種辦法。假若不能直接集合，通信又不能彼此合意的時候，便遣派熟悉這問題委員赴會討論，並且向他們說：「如此這般的問題，務必要勉力達到合意的地步；我們希望你們帶回來的不是法規，而是合意的提案；至於提案之承認與否，却由我們自己決定。」

（註）法文本，在這句下面還有一句：「並向他們說：你們管我們議決法規罷，我們是要服從的。」——譯者

這便是全歐、美的大實業公司，學術團體及其他各種協會所採取的方法。便是將來的自由社會也應採用這方法。既要實行充公，而一面又要保存國會代議主義的原理是絕對不可能的。（註）建築在農奴制度上面的社會必不能脫離絕對君主專制政體；建築

在工錢制度和資本家掠奪羣衆上面的社會必不能脫離議會政治。然而自由社會（恢復了共同的財產的自由社會）必定要在自由的團體和各團體的自由聯合中，尋出和歷史的新經濟現象調和的新組織來。

（註）這一包英文本沒有——譯者。

每一個經濟現象必有一個政治現象與彼相合的。要想推翻私有財產制，同時不去尋求一個政治生活的新方法，到底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 充公

據說大富豪羅斯柴爾特 (Rothschild) 在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發生的時候，看見他的財產有點危險，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說：「我十分承認我的財產是受了其他無數的人的餘蔭積蓄下來的；然而要是把我的財產分配與無數的歐州人，那麼，每個人僅能得着四先令。好，無論誰要向我討還這四先令的，隨時我都可以拿給他。」

這個大富豪把這約言公布後，他依然逍遙自在地在弗蘭克福 (Frankfort) 大街上散步。偶爾有三四個過路的人向他要他們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錢給了他們。他的奸計果然成功了。這大富豪的家族至今仍保有着他的財產。

有些狡猾的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想法，他們說：「呵！充公！我也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把所有的大衣推在一處讓各人來自由取用，並且爭奪那些最好的去。」

這種取笑的話，是毫無根據的，並且也看錯了，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把大衣拿來這

樣的分配，雖然我們可以說便是這樣的辦法，對於那些凍着的人也是有益的，我們也不想把羅斯柴爾特的財產拿來這樣的分配了。我們所要做的是要把社會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很合宜的，使凡是生在這世界中的人第一有學得一種有用的職業機關；並且能熟習這種職業的機會，其次應該由他自由地作事，不必要得什麼主人的允許，也不必把他的生產物的大部分送與地主和資本家。至於羅斯柴爾特或范德白爾特（Vanderbilt）諸人的財產，只合供我們組織這種共同生產制度的需用罷了。

在將來農人耕田不必拿他的出產品的一半獻給地主的時候，在那改良土地使收穫豐饒所必需的器械可以由耕田者自由使用的時候，在工場內的工人不為獨占者所利用，而得盡力為社會製造物品的時候，——那時我們可以看見勞動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充足的飲食吃了；而羅斯柴爾特及其他的掠奪者却早已沒有了。

在那時候也沒有人為着那只值得他的生產的小部分的工錢，而賣他的勞力了。

非難我們這種說法的人會說：「這固然很好，然而羅斯柴爾特這類的人也可以從

外國進來的。譬如一個人在中國蓄積了億萬的財富然後才跑到你們中間來，你們又有什麼法子阻止他呢？你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雇用僕人和工錢勞動者——不許他掠奪他們，利用他們的勞力以自富呢？

「你們不能使全世界同時發生革命。那麼，你們不是要在邊境上設立稅關，檢查一切行人，並且沒收他身邊所帶的金錢麼？——無政府主義的警察向着旅客放槍——這真是奇觀咧！」

這種議論根本就有一個大錯誤。發這種議論的人們完全不考究富人們的財產是從何處來的。要是他們稍稍想一下，他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財產是從貧民的窮苦中來的。沒有窮人的地方，也就沒有掠奪窮人以自肥的富翁了。

我們且看看中世紀，那是大富豪最初勃興的時期。

一個封建的領主占領了一塊肥沃的土地。然而當這土地沒有居民的時候，這領主仍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對於他也沒有什麼貢獻；好像他領有月球裏的一個地方一樣。

我們這個領主怎樣去致富呢？他便去尋找農夫——找那貧窮的農夫！

假若每一個農夫都有一塊土地，不必納什麼租稅，並且還有耕種上所必需的器具和資本——那麼，還有誰肯去耕種領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顧他自己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却還有許多貧窮的人。他們是受了戰爭、洪水和瘟疫的摧殘以至於貧困的。他們既沒有耕田的牛馬，也沒有鋤頭。（在中世紀鐵價異常昂貴，而馱馬更值價。）

那些貧民無日不想努力改善他們的情形。不用說有一天他們在路上，在領主的地方看見了一塊牌告，用他們所能了解的符號寫着：那些願意在這境內居住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來建造房屋，耕種田地，並且一部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內，得免納租稅。這年限是用許許多多的十字架表示出來的，那些農夫能夠了解這種意思。

這樣，那許多的貧民便在領主的土地上居住了。他們修道路，排沼澤，建村落。過了九年或十年，領主便開始向他們徵稅了。再過了五年，他又要增加他們的租稅了。隨後領主又把地租增加到兩倍了，那些農夫只有服從，因為到處都是一樣，他們不能在外面尋到

較好的地方。後來領主們又製造出法律來。靠着這法律的力量，農夫的貧困就漸漸地變成了領主們的財源了。掠奪農民的不僅是領主。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掠奪者也跑到鄉村裏來了。農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們的數目也增加一倍。這便是中世紀內富豪勃興情形。我們再看現在的情形還不是和從前同樣麼？假若農夫們都領有可以自由耕種不納租稅的土地，誰還願意出五十磅的金錢去哀求「大人老爺們」^(註)賞給一小塊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占了他的出產的三分之一，他們還肯擔負麼？難道他們還願意實行那折半制度 (Metayer System) 把他的收穫的一半獻與地主麼？

〔註〕「大人老爺們」法文本作 (Monsieur le Vicomte) 英文本作 (Shahble of a Duke)

因一時想不出適當譯名，故依日譯本「御殿様」譯作「大人老爺」——譯者。

然而他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只要他們能夠靠着耕種土地肥飽地主來維持自己的身體和精神，那麼，無論何種條件，他們都要承認的。

十九世紀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紀的情形一樣，農夫的貧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財富

的泉源。

(二)

地主的財富是從農夫的貧困得來的，資本家的財富也何嘗不是從這同樣的財源得來的！

例如有一個中等階級的紳士，他有了二萬磅的財產。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千磅，這在現在那樣奢侈的社會中並算不得什麼。然而在第十年末他便一錢莫名了。所以他若是一個注重實際利益的人，他便把他的財產放着不用，同時另去謀一點小小的常年進款。

這在現社會中是很容易的事，因為在城市裏或村鎮裏，都住滿了那些連一個月甚或兩星期間的生活都不能維持的勞動者。於是我們這位紳士便開辦了一所工廠。假若他在外面有一種「辦事有手腕」的聲譽，那麼銀行又會另外借二萬磅與他；他有了這四萬磅，便可雇用二百五十個工人了。

(註)四萬磅法文本作五十萬佛郎；二百五十個工人法文本作五百個。——譯者。

假若這附近的男人和女人的每日生活不成問題，既不必憂麵包缺乏，而日常所必需的物品又已滿足，那麼，誰還願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產值一克郎（法文本作五六佛郎）以上的物品的時間用來替資本家作工去得每日半個克郎（法文本作三佛郎）的工錢呢？

不幸，（我們曉得很清楚的）我們都市的貧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鎮內都住滿了極可憐的貧民；他們的小孩終日叫喊要吃麵包。所以在工廠還未設備完善的時候，他們便急忙去報名去了。只要雇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也有三百人圍在工廠門前。要見廠主有普通的辦事的能力，在他的機械動轉了以後，一年之間可以從他所雇用的每個工人身上獲得四千磅的淨利。

這樣，他便可以積蓄起小小的財產了，要是他選擇了一種更有利的事業，並且自己又有辦事的才能，他便會把他所掠奪的人的數目竟加一倍，同時他的收入也會增加一

倍的。

於是他便成了重要的人物了。他便可以請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的貴人以及府廳、官衙、警察署的官僚先生們，——來赴他的宴會了。他用他所有的金錢，又可以和別人的金錢結婚，「騙更多的金錢進來，漸漸又可以為他的兒孫取得有利的地位。後來又得着國家的保護和允許，但要他出錢供給軍隊或警察，他的金錢又生出金錢；到後來遇着戰爭，甚或戰爭的謠言，或者股票交易所的投機事業的時候，都是他搶錢的大機會。

美國大財產的十分之九都是那得着國家幫助的大規模的欺騙的結果。（如亨利喬治在他的「社會問題」一書中所說的）在歐洲各國（無論是君主國或民主國）中的財產的十分之九，也是由這同樣的原因生出來的。要成一個大富豪，只有一條路可走。

致富的祕訣是這樣：去找飢餓窮苦的人，每天給他們半克郎，叫他們做出值五先令

的物品；用這種方法積蓄起來的錢，由於得着國家幫助的幸運和投機事業的成功，便會增加起來了。

我們也不必來說那些小的財產，經濟學家以為這是由於先見之明和節儉之力得來的；然而實際上我們知道積蓄起來的金錢若不用來掠奪貧民，這樣的積蓄絕對不會生利的。

例如有一個鞋匠。他的工作所獲得的錢很多，又有許多顧客；由於他拚命地節省，每天便可存十八辨士乃至二先令；一月可存二鎊。

假若這個鞋匠既不患病，雖然拚命節省，但每天却不肯餓着肚皮；又不結婚，也沒有兒女；也不會患肺病死；假定一切情形都與你們所想的一樣！

好，就這樣，他到了五十歲也不能存到八百鎊；在他不能工作的時候，要想靠這筆款來支持他的殘年，也是不能夠的。這確實不是積蓄財產的方法。然而假使這個鞋匠每次存了幾個辨士時，便立刻拿去存在儲蓄銀行。儲蓄銀行又把這筆款借與資本家，那些資

「他家恰恰要『雇用勞動者』，這就是說掠奪貧民。一面這鞋匠又取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兒做徒弟，這窮人若是在五年後他的孩兒學成了手藝能夠自謀生活，他自己也會以為他是很幸福的。」

同時這鞋匠也不會因為雇了徒弟，便受着損失的。假若他的生意忙，他便要置第二個徒弟，後來又置第三個。漸漸地他還要雇二三個工人——這自然也是貧民，他們每天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六佛郎）的東西，然而只得到半克郎（法文本作三佛郎）的工錢，便千恩萬謝了。若這鞋匠是一個「運氣好」的人，就是說他是一個很機敏又很卑鄙的人，他每天便可從工人和徒弟身上掠取得一鎊的錢，這還要超過他自己生產的東西的價值。他便能夠擴充他的事業。漸漸地他就成了富翁了。他不感着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了，也不必為日用的衣食而勞動了。他還要把他的小小的財產留與他的子孫。

這便是人們所常說的「經濟致富，勤儉持家」。其實不過是掠奪貧民罷了。

至於商業，似乎是在這規則以外的。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人從中國買了茶，運

到法國，在他的本錢之外，獲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他並沒有掠奪了誰的。」

這種情形仍然是一樣的。要是這商人把茶包放在背上自己運過來，倒很好。在中世紀初葉通行的外國貿易方法確實是這樣的，所以在那時富人的財產是沒有現在這樣多的。中世紀的商人冒了長遠航海的危險，所得到的金錢是很少的，並且這微小的金錢也是很容易得到的；他們的事業並不是爲着愛金錢的緣故才來做的；他們愛旅行愛冒險的心還要勝過他們愛金錢的心。

到了現在，方法更簡單了。只要有點資本的商人，他想致富，也不必離開他的棹子。他只向代理人打個電報說要買一百噸茶葉，便行了。貨物裝上了船，在幾星期內便可運到了，要這是帆船，在三個月以內也可運到的。他的茶葉和船都是保了險的，所以在途中也不怕發生危險事情；他費去了四千鎊的資本，可以得到五六千鎊以上的錢；要是他不去販賣新奇貨物做投機事業，（成功時可得兩倍的利，失敗時一文也沒有剩的）他那五六千鎊是靠得住的了。

然而，他怎樣能看見那些甘願飄洋過海，往來中國，耐苦痛的賤役，爲着微小的工錢置生活於不顧的水手呢？他又怎樣能看見那些爲饑寒所迫，圖少許工資，來替他上貨卸貨的力夫呢？因爲他們是貧民，他們又餓又寒。試走到海港地方去。並且走進碼頭上的飯館酒店去看看那些往來求糊口的人。他們在天一明便雲霞般的羣集在船塢的入口，希望能夠在船上得點工作做。再看那些水手有時幾星期或幾個月都不得不着工作做，一旦被雇去航行遠洋，他們還以爲是異常幸福的。他們一生大概以船爲家，長久在海上生活着，他們住的船也是常換的，到後來終於葬身於渺渺波濤之中。

你們再到他們的家裏，就可看見他們的妻子兒女穿着襤褸的衣服，他們不知道怎樣生活下去，只有盼望着他們的丈夫，父親歸來。你們看見這種情形，那麼，你們的疑問總可以得到解答罷。

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們隨意去選擇罷；你們去考察一切財產的起源，不問大小，不問是由商業，理財，工業，土地得來的。你們一定會發見，富豪的財富是從貧民的窮困

中湧出來的。這便是無政府的社會不必怕羅斯柴爾特搬進來居住的理由了。假若社會中的各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時的生產勞動以後，誰也有權利來享受文明所帶來的一切快樂，並且還有權利來享受科學藝術所貢獻於人類的娛樂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學和藝術），他們絕對不會爲着微小的工錢，去出賣他們的體力了。那時絕對沒有人肯願意爲着增加羅斯柴爾特的財富，去替他作工了。他的金幣只不過是許多金片罷了，可以做別的用，然而要用彼來增加他的財富，却斷斷不行了。

這樣答覆了上面的反對論，同時也把充公的範圍表示出來了。凡是能夠使人（不管是理財家，或是工業主，或地主）壟斷他人勞動的產物的一切東西都應該充公。我們的方式是簡單而易了解的。

我們並不想剝取任何人的大衣，我們只想給勞動者以他們所必需的東西，他們常因缺乏這些東西的緣故，便不得不墜入掠奪者的陷阱中；我們還要盡我們的全力來使任何人都感到缺乏什麼，使任何人都不會爲着養活他自身以及他的兒女的緣故，以

致不得不賣去他的手腕的力。總之，這樣的事，在將來是不會再發生的了。

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充公的意義；這也就是在革命時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們知道這革命的到來，並不是一二百年後的事，在最近的將來，革命便要來了。就是在即刻呀！

(三)

無政府主義的大體觀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獨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遊惰當作最上理想的人們中，得到了很多的同情，還要超過我們所想像得到的。我們的朋友們，常常警告我們說：『你們也不可太走極端了！人類不能在一日間便改變過來的。你們所說的充公和無政府的計畫不可很急的做去，否則，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險。』

然而我們對於充公的憂慮正與這個意見相反。我們是恐怕充公不能盡量的做去；恐怕實行的規模太小，以致不能繼續長久。我們怕的是把革命的意氣半途抑制下去了，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澈底做去；這樣的辦法，既不能討好於任何人並且還生出可

怕的社會混亂，阻止了社會的常例的活動，完全把生氣喪失了——這種不澈底的辦法，只足以散布一般人的不平，並且一定的反會幫助反動勢力的復興。

實在，在我們現在社會中，已經建立了許久的各種關係是不能部分地改革的。現在的經濟組織好像許多車輪之中又包含有車輪似的——這種機關是異常複雜並且互相綜錯的，假若不擾亂全體，只求一部分的改良，這是一定做不到的。當我們著手把一些東西充公的時候，我們便可立刻了解這種道理的。

我們且假定在某一國已經實行了一都分的限制的充公。例如，像從來已有人提倡過許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財產收歸社會所有，工廠完全不管，如亨利喬治所主張的，或是在某一個城內房屋的財產已歸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歸私人所有；又或在一個工業中心地，工廠已收歸公有，但土地仍讓私人管有着。

這些情形會得着同樣的結果——這便是工業組織之可怕的瓦解，不能依着新方針來改進工業組織。工業和財政完全阻滯了；甚至要回復到正義的第一義也不能夠；而

社會也不能保持其全體的和諧。

假若農業脫離了大地主的束縛，而工業仍然是資本家，商人，銀行家的奴隸，那麼，什麼事都不會成就的。現在的農夫所苦的，不僅是要納地租與地主，而且還要受着那四方八面來的社會狀態的壓迫。他也要被商人來掠奪，那商人拿了一把鋤頭要他出半克郎（法文本作三佛郎）其實就造成這鋤頭所費的勞力算來，這鋤頭的價值還不到六辨士（法文本作十五個蘇）呢。國家也向他徵稅了；國家沒有那一羣可怖的官僚階級是不能存在的，而且還要維持那耗費很大的軍隊，因為各國的商人不斷的在競爭市場，有一天會因亞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之掠奪事件起了一點小糾葛，便引起大戰的。

而且農夫因鄉村人口的減少，也要受苦的；鄉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製造奢侈品的資本家之暫時的很高的工錢的誘惑，或者受着都市生活之活潑的引力的引誘，羣集到大都市來。還有工業之人爲的保護，外國之工業的掠奪，股票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產機械的困難等等，——這一切的動作在今日都是不利於農業的。簡言之，農夫所苦的，

不僅是地租，而且是那基礎在掠奪上面的今日之社會狀態全體。因此縱使土地的充公實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種田地，使土壤得盡量發展，而且又不納地租，然而農業也只能享着一時的繁盛（其實這是極不可靠的，沒有這樣的事），便一定要退到現在的那樣慘狀。而全體的事物非從新開始不可；並且困難又增加了許多。

就工業而論，這道理也是一樣的。把工廠交與工人，如前面所說把土地收歸農夫共有一樣。工廠主雖廢除了，然而却仍讓地主私有着土地，銀行家私有着金錢，商人私有着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羣依靠工人的勢力而生活的遊民和幾千百個中間人以及那有無數官吏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這樣一來，工業自然會陷於停頓之中。在多數貧苦農民中間，實在是找不出工業製造品的顧客來的。工人自己沒有原料；又因為通商的阻止和工業遍於世界的緣故，他們的製造品不能輸出；他們製造者便感覺得不能競爭下去了。於是無數的勞動者又被驅逐到街上來。這迫於饑寒的羣衆便不得不在幾個正要來掠奪他們的陰謀家之前俯首了。他們只要得着允許他們作工的保證，甚至恢復了舊

的奴隸制，他們也承認的。

或者，更進一步，把地主也驅逐了，工廠與製造所自然仍歸工人管理；可是經手買賣的中間人依然存在；他們便要來搾取製造者的生產物，並且還要在大的商業中心地做穀類，麵包粉，肉類，雜貨等等的投機事業。一旦生產物的交易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麵包，而同時大的製造業中心地所出的奢侈品又得不着買主（如里昂的絲沒有人要了）——這時反革命會立刻發生的。於是殺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會被槍林彈雨掃蕩淨盡。而政敵的處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斷的發生，恰如一八一五年，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法國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樣。

文明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綜錯的；不去變更全體只來改良一部分，是不能的事。所以我們攻擊私有財產的時候，不論是工業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們應該攻擊到全體。革命的眞個成功便要求這一點。

而且，縱然我們自己希望只實現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時我們會到了欲

罷不能的地步。「神聖的財產權」的真理動搖了以後，無論什麼理論學說都不能救彼了。這一個地方的田間奴隸，那一個地方工業奴隸，都要起來推翻私有財產，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個大都市（如巴黎）單把家屋工廠充公了，彼同時對於銀行家以從前公債的利息之名義向公社徵收二百萬鎊的稅的這件事，勢必要拒絕的。這大都市又不得不和農業地方接觸，其感化力便一定會使農夫脫去地主的束縛的。並且爲着使市民容易得着食物和工作的緣故，特別爲着防止糧食糜費的緣故，鐵道也應該收歸公有。還要防備那些收買穀糧的投機者，不可像一七九三年巴黎公社。（注意：並非一八一七年的巴黎公社）那樣受了他們的利用，所以貨物的貯藏和生產的分配這些事務，非由都市自己辦理不可。

然而有一些社會主義者還要想建立一種區別出來。他們說：「自然，土地，礦山，製造所非充公不可；這些東西是生產機關，看做公共財產是正當的。但是消費品（食物，衣服，

家屋等）則應該視作私有財產。」

這個小聰明的區別還不及一般人的常識。我們不是那住在森林中以樹枝爲避蔭的野蠻人。文明人是離不開屋頂，居室，火爐，臥床的。不錯，臥床，居室，房屋確實是不生產者的怠惰之家庭。至於勞動者，這溫暖而又明亮的居室只不過是他的生產器械恰與其他器具機械一樣。這居室便是他積蓄起明日工作所需要的神經肌肉力的地方。勞動者的休息，好像機械之每日修繕一樣。

這樣的議論，應用到食物上去更是明顯。那些建立了上面所述之充公的區別的所謂經濟學家想來也不得不承認機械中燃燒的煤與原材本身一樣，皆是生產上的必需。同樣，沒有了食物，人的機械也是不能動作的；然則，我們怎樣能把食物一項從生產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了呢？這是宗教的玄學之遺物嗎？富豪的盛饌誠然是過於奢侈的東西；然而勞動者的食物不過是生產的一部分，恰與蒸汽機所燒的煤一樣。

說到衣服，這種道理仍是一樣的。我們並不是紐金尼（New Guinea）的野蠻人。

要是那些在生產品與消費品之間立下了區別的經濟學家自己奉行着紐金尼野蠻人的風俗習慣，那麼，他們的反對論我們還可以了解。那些一個字都不會寫，身上也不穿襯衫的人，便沒有資格來判別襯衫與筆二者的區別。假若我們現在，社會中的太太們所穿的美麗的衣服應該列入奢侈品中，然而許多麻織的，棉織的，毛織的衣服却是生產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們作工時穿的襯衫和褲子以及工作完畢後穿的短衣，戴的帽子，都是他們所不能離開的東西，恰如鐵鏈之於鐵砧一樣。

不管是我们所喜歡或不喜歡的，然而這是平民革命的意義。當他們把政府推倒了以後，他們最先便要找尋他們的相當的住居，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確實保證，——並不必付什麼租稅與資本家。

平民將不會錯的。平民的手段還要比那些在生產機關與消費品之間劃出許多區別的經濟學家的手段更合於科學的。平民知道這是革命的出發點。他們要建立名實相符真正合於科學的唯一經濟科學的基礎，使經濟學值得稱為「人類欲求及其滿足的

經○濟○方○法○之○研○究○的○科○學○。

第五章 食物

假若將來的革命是社會革命，則不僅彼的目的，而且彼的方法也是和從前的一切暴動不同的。要達到新的目的，便需要着新的方法。

近百年來法國的三大平民運動，雖然在許多地方互相差異，却也有一個共通現象。每次平民都努力來顛覆舊的制度，爲着這個主張，他們濺了他們的心血。然而在擔負了猛烈的戰爭之後，便歸於湮沒了。那些多少有點誠實的人又聚集起來成立了一個政府，想建設新的制度：如一七九三年的共和國，一八四八年的勞働者一八七一年的自由公社。這個政府浸染着雅各賓派的思想，故以討論政治問題爲第一要務，像政治機關的改造，行政的刷新，國家與教會之分離（即政教分離）以及公民自由權等等都是彼極重視的問題。誠然，當時工人俱樂部會監視新政府人員的行動，並常以工人的意見來督責他們。然而便是在這些俱樂部中，不問他們的首領屬於中產階級或勞働階級的，中

產階級的思想却總是占着最大的勢力。他們長久地討論政治問題，反把麵包問題忘記討論了。

在那樣的時候，偉大的思想，震動全世界的思想發生了。許多動人的話語說了出來，經過了一世紀以上的時間，還激動着我們的心。然而平民仍倦伏在陋巷之中挨餓。

以革命開始的時候，工業不免要停頓——生產物的流通受着阻礙了，資本自身也隱藏起來了。那主人（雇主）在此時並無所恐懼，縱然他不做投機事業來掠奪他周圍的貧苦的人，但他却也要靠着賺取利息金來生活。至於工錢勞動者，他們簡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窮乏不時在敲着他的房門。

饑饉遍於國內——這樣的飢饉便在舊制度之下也是少見的。

『吉隆特黨（Girondists）使我們饑餓呀！這是一七九三年勞動者方面的叫聲，因此吉隆特黨人便被送上斷頭台去了，政權完全落在『山嶽黨』和公社的手中。公社實在熱心研究麵包問題，爲着想養活全巴黎的人，曾勇敢地努力過。在里昂，福雪（Bon

-che) 柯羅德爾布瓦 (Collot d'Herbois) 曾建立了城市的穀倉然而要充實這些穀倉所費去的款項常常不夠。市議會會努力想得點穀物；私藏麵粉的烘麵包者也有處死刑了，可是平民仍然缺乏麵包。

於是他們轉而攻擊王黨的謀叛人，歸咎於他們。一天殺了十五個或十二個，——奴婢和公爵夫人都一樣地被殺了，特別奴婢被殺的很多，因為公爵夫人們都已逃到柯布朗茲 (Coblentz) 去了。然而縱使每天殺却一百個公爵子爵，形勢還是同樣地無望的。窮困只有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了。工錢勞動者沒有工錢是不能生活的，而偏偏又得不到工錢。縱然橫屍千萬，對於他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因而人民漸漸覺得疲倦了。反動派向勞動者說：「你們所誇張的革命，不過如斯而已。你們不是比以前更窮困麼？」富豪漸漸鼓起勇氣，反從隱匿的地方現出來了。在飢餓的羣衆之前，誇耀他們的奢侈。他們穿得像花花公子一樣，向勞動者說道：「來！這蠢笨的把戲已經夠了！你們從革命究竟得到些什麼？」

革命黨人心氣沮喪，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到後來不得不承認他的主張又歸於失敗了。他於是退到陋室之中去等待滅亡的到來。

反動又得着勝利了。彼完成了反革命的政變。革命死了，所剩下的只有被踐踏了的屍骸而已。

白色恐怖（註）開始了。血像河一般地流着，斷頭機沒有一刻休息的時候，牢獄裏囚滿了人；同時一方面官爵位階仍恢復其舊制，像從前一樣地誇耀於世。

（註）俄國及西歐革命黨所用的恐怖手段，即暗殺手段，謂之赤色恐怖，而政府官吏的殺戮或監禁之白色恐怖——日譯本。

這樣的景象是我們一切革命的標本。在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勞動者爲着共和政體，忍受了「三個月的飢餓」到了他們力竭的時候，他們還在六月裏作最後一次不顧危險的努力——這努力是浸在血潮之中的。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因爲缺乏戰士而消滅了。公社徒然空講國家與教會分離的方法，而把供給人民的麵包的問題忽略了，到了

後來，便太遲了。所以後來在巴黎風流都雅的士女和闊氣的紳士居然散散了同盟的軍民，叫他們爲着微少的工資賣去他們的生命，而他們「上流社會」這時却在時髦的酒店茶館中飽食逸居的過日子。

到後來公社知道了彼的錯誤，開放了公共食堂。可惜又太遲了。日子已經過去了。凡爾賽的軍隊已佔領了城堡。

「麵包，革命所需要的是麵包！」

別人要發誇大的宣言，穿金色衣邊的制服，喋喋於政治的自由……讓他們去罷！而我們自己要努力，使從革命的開始到最後的一日，在爭自由的各地方內沒有一個男子會缺乏麵包；沒有一個女子會同她的饑餓的同伴羣集在麵包店的門前，希望遇着偶然的慈善，得到一小片粗惡的麵包；沒有一個小孩子會因食物的缺乏而瘦弱的。

中產階級的思想常常演說那些「偉大的原理」——其實不如說是大謊話。

至於人民的思想，却是使萬人都得着麵包。當那些中產階級以及染受了中產階級

思想的工人們在「談天處」讚美他們的修辭學，「實際家」正在無限制地討論政府的形式的時候，我們，（所謂「烏托邦的夢想者」）——不得不考慮每日麵包問題。

我們可以大膽宣言說：每人都有取得麵包的權利，社會裏的麵包已很多了，足以供給萬人取用了；我們的革命要以「萬人的麵包」作口號，才能得着勝利的。

(二)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夢想者。誠然，正因為我們是夢想者，所以我們相信革命應該，並且也能夠確實保證萬人的衣食，住的，——這種思想是中產階級的市民（不論他屬於何黨派）所極不喜歡的。因為他們十分知道要是平民的飢餓得到滿足的時候，便不容易來使他服從了。

我們始終堅持着我們的主張：從事於革命的平民應該得着麵包；麵包問題應該放在其他一切問題之前討論的。假若革命是為着平民的利益的，那麼，彼便會走上正路，得着好的結果。因為要解決麵包問題，我們必定要被據平等的原理，除此而外更無其他路。

解決法。

將來的革命——恰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樣——一定會在大工業的危機中爆發的。近五十年來沸騰着的世事唯日趨險惡。萬事都向着這方面進行——新的國家加入了國際通商之列來競爭世界市場，戰爭和租稅便不斷地增加了。國債，明日之不安，以及遍世界的大規模的殖民計畫，條件都是向着那條路進行的。

現在歐洲有數百萬的失業工人。一旦革命爆發了，像火藥點上火一般蔓延地燃燒起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更要加多。歐洲與美國的交際一旦斷絕了，失業工人的數目立刻便要加到兩倍之多。我們究竟怎樣來供給他們的麵包呢？

那些自稱爲「實際家」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有無切實的具體研究，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曉得他們要維持工錢制度，所以我們對於他們所可期待的，不過是組織「國民工場」和「官營事業」，把彼等當作供給失業者的食物的一個方法而已。

國民工場開設於一七八九年及一七九三年，一八四八年也用過同樣的手段，拿破

嘗第三以官營事業來使巴黎無產階級滿足了十八年——使巴黎至今還負債八千萬鎊和每人名下平均三四鎊的市政稅（註）；這種「馴野獸」的絕妙方法，在羅馬以及四千年前的埃及都是慣用的；古代的專制君主帝王常把他食餘的東西給一小塊與平民，因而乘機提起鞭子來敲打他們——因為這些緣故，自然那些「實際的」人物要襲用這種手段來維持工錢制度至於永久。當我們能夠使用有名的古埃及法王（Pharaoh 古埃及國王之稱）的方法的時候，為什麼還要費我們的腦筋呢？

（註）一九〇四巴黎之市債共二二六、五七九、一〇〇佛郎；對這個的負擔是一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英文本註。

假若革命被誤引到這條路上去，那麼，一定會得着失敗的結果。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巴黎國民工場開辦時，巴黎的失業者僅有八千人，兩星期後竟增加到四萬九千人。不多時還要增加到十萬人，並且從各地方來的人還不算在內。

但在當時法國的工商業所雇用的人數僅及今日人數的一半。我們還知道革命時工業與貿易最感苦痛的便是一般的騷動。我們只就那些直接或間接依賴輸出業的勞働者，以及從事於生產少數中產階級消費的奢侈品的勞働者的數量上想一想，即可理解的。

在歐洲起了一次革命時，至少大半的製造所工場都要停頓的。於是幾百萬的勞働者和他們的家族便被逐到街上來了。我們的「實際家」要用國家的救濟事業來免除這種慘狀；這就是說創設新工業拿工作與失業者做。

蒲魯東在五十餘年前便已指出，來對於財產的最小的攻擊也可以使那基礎在私人企業和工錢制度上面的社會組織完全的瓦解了，這是很明顯的。社會自身握着生產的全部，並且不得不把彼改造過來，使之適應人民全體的需要。然而這不是一天兩天甚或一月所能完成的事；要改造生產組織，當然要費去許多日子；而在此時期中，幾百萬的人將失去了生活方法。那麼，怎樣辦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實際的」解決只有一個——即是向着那期待着我們的大事業大膽的前進；我們且不去彌縫那個被我們自身弄得要潰滅的時勢，只去把生產改轉在新的原理上面就得了。

因此，真正實際行動的次序，據我們看來，應該是平民直接起來把叛亂地方的食物收歸自己管理；對於一切物品加以精密的計算，一點東西也不要浪費，那麼，靠着此等積蓄起來的財源的幫助，所有的人都能安然地渡過難關了。在這時期中，應該一方面與工場勞動者約定供給他們以原料，保障他們的衣食住，要他們作工來供給人民的需要。我們不要忘記當法國織出絲綢來裝飾德國銀行家的夫人，俄國的皇后及布哇的女王的時候，當巴黎製造出絕妙的裝飾品和玩具來供給全世界富豪的使用的時候，三分之二的法國農民甚至沒有明亮的洋燈和近代農業上必需的器械。像現在許多不毛的土地都應該竭力的利用使之盡量地發展；瘠土使之肥，便是肥土，在現在的制度下尚不能發揮其本有生產力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將來也應該用集約農法（Intensiv）

Culture) 來耕種培養，如對於菜園和花園的辦法一樣。除此而外，再無其他的實際解決方法了；不問我們對此的好惡如何，時勢所趨是要使之實現的。

(三)

現代資本制度的最顯著的特質便是工錢制度，這制度略說如左：

某人，或某團體，有了必要的資本開設某項工業；他設法供給原料喚他的工傭或製造所，設定生產的方法，給規定的工錢與雇工而掠取其剩餘價值（或利益）；他說，這種利益是用來報酬他們經營事業的勞力，和所犯的危險，並且準備補償對於貨物市價的變動的。借着這種口實，他便占有了這種利益。

現在獨占着資本的人們爲着維持這種制度起見，多少也應該有些讓步；例如，要分配一部分的利益與工人，或甯創一種計算工錢的尺度，使物價漲高時，工錢也隨之漲高。簡言之，他們爲着要依舊指揮工業而且獲得其最先的效果起見，便不得不承受一點犧牲。

據我們所知，集產主義雖主張把現在事物的組織大大的變革一下，然而却是並不廢除工錢制度的。對於勞動者，只不過拿國家（這即是說全國的或一地方的代議政府）來代替個人的雇主罷了。在集產制度之下，國家的或地方的議員，以及委員官吏等支配着工業。他們手裏握着使用生產的剩餘——爲着萬人的利益——的權利。並且集產主義又在通常的體力勞動者和熟悉一種技術的人二者之間劃出一細巧而有力的區別。非熟練的勞動在集產主義者的眼中看來，不過是簡單的勞動，而職工、機器師、工程師、科學者等的工作，便是馬克思所說的複雜的勞動，而且可以得着高的工錢。然而無論體力勞動者也好，職工也好，織物工人也好，科學家也好，都是國家的工錢奴隸——至於說「一切官吏」不過是說來敷衍面子罷了。

那麼，將來的革命對於人類的大貢獻只是使任何形式的工錢制度不能繼續存在，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便是消滅工錢奴隸制的利器，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縱使我們承認在繁盛平和的時代漸次實施的集產主義的改革是可能的，（實則

在這樣情形之下究竟能實現與否還是疑問。然而在革命的時期，當數百萬饑餓者的需要同着第一次占取武器的舉動一齊發生的時候，這却是不可能的了。政治革命不必動搖工業的基礎，而平民占取財產的革命必然會使生產和交易麻痺停滯。國庫裏的數百萬公金還不足支付幾百失業者工錢。

我們也不能固執着此點。新基礎上工業的改造（我們要指出此問題是異常重大的）不是在幾日之內便能成就的。而另一方面平民也不能忍受數年間的饑餓去爲那些維持工錢制度的理論家盡力。爲着渡過這種危急時期起見，他們便會要求他們平常在那樣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的共有——即糧食的給與。

空講忍耐是無益的，平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歸共有，那麼，他們便要
去搶掠麵包店。

假若此時平民還沒有充分的能力去對付在他們面前的一切，他們會被槍斃，與集
產主義以實行的機會。要達到這個目的，無論付何種代價，都要把「秩序」維持起來的。

——秩序呵，訓練呵，服從呵。資本家不久會知道當平民被那些自稱為革命家的人槍斃的時候，革命本身會漸漸成了羣衆的眼中釘，於是他們資本家便要來援助那些秩序的防衛者，——縱然這些人是集產主義者，也不要緊。依這樣的運動方針，資本家後來又會想出撲滅集產主義者的方法。假若依此種方法「秩序便恢復了」，其結果也是容易預知的。那些「秩序」的黨徒不以槍斃「兇徒」爲滿足，還要找出「亂民的巨魁」。他們重新設立裁判所，任用劊子手，把最熱心的革命黨人送上斷頭台。一七九三年的事情又要演出來了。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世紀反動是這樣的得着勝利的。最初愛白爾黨 (Hobbes) 和「瘋狂者」被殺了——米匿 (Mignet) (註) 記着當時的爭鬥還稱這些人爲「無政府主義者」。隨後丹東派 (Dantonists) 也上了斷頭台，當羅伯司比爾一派把這些革命黨人殺死了後，他們自己也被逼走上了斷頭台。因此平民漸漸憎厭流血之慘，又看見革命已歸失敗，便灰心短氣，低頭束手任反動派作惡。

(註)米隆是法國政論作家、歷史家，曾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1824)——譯者。

所以我們說，假若是「秩序恢復了」，社會民主黨便要殺無政府黨人了；費邊派(Fabians)也要殺戮社會民主黨人了，再等到費邊派被反動派殺戮的時候，革命便歸於消滅了。

然而事實使我們確信平民的精力是足以十分成就事業的，並且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會得着強固的根底。這不是人造的理想，這是平民自己吹到我們耳裏來的，當人們漸漸地明白了其他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時候，共產主義者的數目便愈見加多。

假若平民的勢焰是十分強烈的，則一切事情會向着不同的方向進行。暴動的各都市的平民不再採用第一天搶劫麵包店，第二天便受餓的方法了，他們要占領倉庫和家畜市場——其實，還要占領一切的糧食貯藏所和食物。真正有好意的男女市民都會自

動地團結起來組織志願隊，把各倉庫各店鋪內的物品統計起來，作一個大概的目錄。

假若這樣的革命在法國，即是說在巴黎爆發了，那麼，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公社便應該知道巴黎現在還不會知道的一切（不管那地方的統計委員），並且在一八七一年的圍城中所不會知道的——巴黎所有的糧食的數量。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便應該有數百萬冊的計算表印刷出來，把有用的食物的數量計算得十分精密，還把貯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記載得異常清楚。

各巷，各街，各區都組織了志願隊，各隊的委員互相聯絡協同勞動，進行得很有順序的。只要雖各資黨的槍刺不在半途來妨害他們，只要那些自命為「科學的」理論家不衝進來胡鬧，結果總是很好的。那些理論家只要他們沒有威權，沒有勢力，便讓他們隨便表示他們的糊塗的理論也是無妨的。那種可讚嘆的團結心是民衆固有的，特別在法國國民的各社會階級中此種團結尤其發達，然而少有機會來發揮實行；即如在像巴黎那樣的大都市，在革命的中間，便會發起自由勞動者的大行會，預備來供給必需的食物於

一切的人。

讓平民去自由行動罷，在十天以內供給食物的方法一定會整頓到很可讚嘆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見着勤苦工作的平民的人，只有那些終生埋沒在文書堆裏的人們，才會疑惑這種說法。說起那『偉大的被誤解者』（Great Misunderstood）（即平民）的團結的才能，在巴黎的街巷防禦戰時代，或在倫敦船塢大罷工的時候（當時還要養活五十萬的饑餓者）已表現出來了；凡當時在巴黎或倫敦會身歷其境的人，會告訴諸君說，他們的團結心是如何的崇高，決非官吏的愚妄無能可比。

縱使我們覺得會因此感受着兩星期或一個月的不便和混亂，也沒有甚麼要緊。因為對於大多數的平民，和他們從前的情形比較起來，總算有一點改善的地方。並且在革命時期，一面熱心討論時事，一面吃東西，雖一片麵包，一點乳酪，吃起來却分外味美。

無論什麼時候，在眼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發生出來的制度，比較那些占幾個委員議席的頑冥的理論家在屋子裏所發明出來的東西總是好得多的。

(四)

大都市的平民爲時勢所迫，便要起來占領一切的糧食，最初占領目前最急需的東西，然後漸次把其他的物品收歸公有，使全體市民的需要得以滿足。這件事的實行愈快愈好。實行愈快，悲慘愈少，紛爭也愈少。

然而社會應該基礎在什麼東西上面，才能夠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們對於食物應有的部分呢？這是我們最先遇着的問題。

我們答覆說，解決這問題只有一個方法。要公平地建設共產制度。只有一個方法：只有一個方法能滿足我們的正義的本能，同時又是實際的。這就是歐洲農民公社所實行的制度。

例如一個農民公社，不論彼在什麼地方，甚至在法國，雖然那裏的雅各賓黨曾用全力來摧殘公社的習俗也不要緊。假若公社有森林和雜木，那麼，只要在樹木很多的時候，任何人都可以隨他自己的需要來取用，要是他的隣人們不來干涉他，便不會有什麼妨

礙的。至於時常缺乏的喬木，他們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場的情形也是一樣的；在十分充足而且有餘的時候，無論各戶家畜在牧場上的消費量若干，無論在牧場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頭，都是毫不加以限制的。只要東西不告缺乏，則飼養地面並不分開，芻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兩國的大多數，只要有共有牧場草地，必定實行這種制度。

在東歐諸國凡有大樹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農夫們可以隨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種各人必需的土地，各人對於樹木及土地應有的部分，可以無限制地取用的。但是當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時候，像現在俄國所發生的事一樣，那麼，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戶的需要而分配。

總之，這制度是這樣的：若社會所有的物品是很豐富的，則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沒有定額，也沒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歐洲的三萬五千萬居民中，至今還有二萬萬人仍然實行這種自然的共產制度。

還有一件我們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這種制度來分配的，這種物品一定是很豐富的。例如自來水供給與各用戶取用，並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給不會有缺乏之虞，自來水公司便決不限制各用戶的消費量。隨你自由取用好了。然而當天旱，水的供給有不足之虞，那時自來水公司便會在報紙上登一段短廣告，使市民週知此事，市民也就會減少水的消費量，注意不要胡亂耗費。

但是假若真正缺乏水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除了定量地供給而外，更無其他的方。這種方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識來說，也是很正當的。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城受着兩次包圍的時候，都是實行這種辦法。

要指出這種定量分配制度怎樣實行，要證明這種辦法是很公平的並且還要比現在事物的狀態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許多表來，也用不着詳細說出什麼表，什麼詳細的敘述，既不能說服中產階級的人，也不能誘惑那些感染了中產階級的偏見的某一些勞

動者，他們把平民看作暴徒，以爲一旦政府沒有了，不來指揮了，那麼，那些野蠻的暴徒立刻就會互相吞噬了。現在只有那些不會看見平民依自己的發意而決斷而行動的人也許會暫時懷疑一旦平民支配了時勢，究竟他們能否依據極嚴正的公道與平等來把物品定量地分配與一切的人。

假若你去參加平民的集會，發表意見，說凡是美味（野鳥等）都只是貯藏起來爲貴族的遊民取用的可口的東西，黑麵包應該拿與醫院裏的病人吃，那麼，你一定會被叱罵的。然而你只管在這平民的集會或在十字街頭和市場等地方去演說：極精美的食品應該留與病人和弱者——特別是病人——取用；假若全城內只有五隻鷓鴣和一箱西班牙產的葡萄酒，那麼，便應該完全拿與病人和病後未復元的人取用，病人之次還有小孩，假若牛乳，山羊乳不夠全市民取用，則應該爲小孩們留起來；假若社會陷於非常窮困的時候，所有的一些肉都拿與小孩和老年人吃，壯年人吃的只有黑麵包。

總之，你再說假若某種消費的物品缺乏了，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時候，那麼，感着最大

需要的人，便可得着最多的量。你要是這樣的說了，一定會得着大眾的同意。

平生飽食的人決不能了解這個道理，但平民却能了解，並且也常常了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若被拋在街頭，日與民衆接觸，他也會漸漸了解的。

那些理論家——他們把兵士的制服和兵營的會食堂當作文明的東西——自然要開設國立食堂和斯巴達式的公共食堂這類的東西。他們說要是這類的大食堂設立起來了，各人無論何時，都可到那裡去得着定量的湯、麵包和野菜。因此得着的利益，以及燃料和食物之經濟，是很顯然的。

我們並不疑惑此等利益。我們深知人類已經實現了燃料與勞動之經濟，他們依這種重要的經濟方針（如廢除各家戶的手磨搗臼、鍋灶等）已得到了很好的結果。我們很能清楚，與其一百家人各自燒火，不如同時一起煮好一百家的肉汁更要經濟些。此外我們也知道馬鈴薯的煮法有許多種。然而用一口大鍋同時把一百家人需用的馬鈴薯煮起來，也是很好的。

其實菜蔬的烹調法隨各個廚子和管家婦的手藝而差異，這也是我們知道的；然而把一百家人的馬鈴薯放在一處煮，然後各人再依自己喜歡的方法來烹調，也沒有什麼抵觸。而且以同樣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種不同的肉羹，求適合一百家人的嗜好。

凡此等事實，我們都知道的，然而我們却仍主張對於那個願意自己燒火，自己做菜的管家婦，誰都沒有權利來強迫她到公共食堂去拿已經做好了馬鈴薯。特別我們希望各個人或是同他的家族用餐，或是和他的友人聚餐，或者甚至跑到餐館裏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食堂會自然的發達起來代替那些現在毒害世人的餐館。現在巴黎的管家婦已經可以從屠戶那裏取得作羹的材料，隨自己的主意來烹調了。倫敦的持家者們也知道把肉、蘋果、饅頭等食品放在麵包店裏去燒，只須付很少的錢便可節省時間與燃料了。並且在公共食堂——將來的麵包店——設立起來的時候，人民得以烹調食物，並無受騙和食毒的危險，那時各人從公共食堂裡取到灶上已經作好了的食品，再依自己

的嗜好烹調起來：這會成爲大衆的習慣。

然而如果要造出一個嚴重的規則，說各人都應該帶着已經作的食品回家，這樣思想一定會被近代的人嫌厭的，他們會把這個思想當作和那寺院兵營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壓制與迷信）造成的偏曲的頭腦所生出來的不健全的思想——一樣的東西。

怎樣的人才可以從公社取得食物的權利呢？這是我們必須自問的問題。各都市會自己答覆這問題，並且我們相信，這解答是受着正義的感情指導的。要一直到勞動組織改造過了，混亂的時期也終止了，而古代傳染來的懶惰者和純正的勞動者區別不出來的時候，必需的食物才應該無差別的分配與所有的人。那些和新秩序爲敵的人依他們的情形當然要設法消滅公社。然而那豁達大度而且根性中沒有復仇心的民衆對於共同生存於新社會的人不問他們是勝者，敗者，一樣地把他們的麵包分給與這些人。這種思想的默然，對於革命，也不會有什麼害處的；並且當工作回復，事業重興的時候，昨天

的敵人今天會在同一工廠裏接膝工作。在勞動自由的社會中，懶惰者是不足爲害的。

批評家立刻會說：「然而糧食在一個月內便要告缺乏的。」

「那就更好，」這便是我們的回答。其實，我們會證明出來自有史以來平民能夠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這是第一次。至於怎樣才能得到新的供給，這個方法我們且在下面來討論。

(五)

在革命時代的城市能夠以何種方法供給食物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但我們很明白所採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區及隣近各國的革命性來決定的。假若全國或者全歐洲的人民一齊起來完成社會革命，開始實行完全的共產主義，那麼，我們的處置便是很簡單的了。但若只是歐洲的三兩個地方試行社會革命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另採取一種方法。那時候的情形會把方法指示與我們。

這樣，我們在取何種措置以前便應該先看歐洲的形勢如何。我們並不想來預言什

麼，但我們可以預料革命所取的方針如何；至少革命的特點是什麼，也應該預先知道的。

假若全歐洲同時起了革命，到處都實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產主義的原理激動了，這自然是我們很希望的事。像這種普遍的大暴動一定會使我們現世紀的事業變為異常簡單的。

然徵諸一切的預兆，都足以使我們相信這樣的大暴動是不會實現的。革命將要波及於全歐洲，這件事是無可疑的。假若歐洲大陸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維也納（奧京）、布魯塞（比京）、柏林（德京）——中的一個起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個都將在幾星期之內便要起來做傲的，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半島各國，甚至倫敦和彼得堡在最短期間也會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處所表現出來的是否同一性質，這確實還是疑問。

誠然，將來無論何處都要實行大規模的充公，而且若是歐洲的某一個大國實行了這種政策，其他各國一定會受其影響，這是確實的；然而革命的開始當依地方而差異，革

命的進行在各國也是不同的。在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之間，法國農民費了四年之力，才得脫離對於封建領主的權利的賠償的負擔，中產階級，了四年之力，才得顛覆了王權。我們須把這個記在心裏，再來觀察革命漸漸地自然發展。假若我們看見革命的進行有時不免遲緩一些的時候，我們也不必垂頭喪氣。無論如何，在最初歐洲各國的革命，是否都有顯明的社會主義的性質，這還是疑問。我們要記着德國至今還是在做實現合衆帝國（United Empire）的夢。德國的進步的各黨派還在夢想像一八四八年的雅各賓黨的共和政體和路易布朗的「勞動組織」同時，在另一方面，法國平民却很熱烈地要求一個自由的公社；無論共產主義的公社也好，其他的公社也好，但總要是自由的。

當將來的革命發生的時候，便是德國也要比一七九三年法國的行動更要進步些，這在道理上也可以相信得過的。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比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更進一步的；法國人民一擊之下，便把王室，地主，貴族等的權力消滅了，而英國尚保留着此等權力以至於今日。然而德國將來雖比較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更進一步，而且會做出更大

的事業，但我們仍不得不承認此次革命發生的思想却是一八四八年的思想；而鼓動俄國革命的思想也是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思想的結合。

雖然，我們不把這種預想看得過分的重要，我們也可得着下面的結論：歐洲各國的革命各有一個不同的性質；便是關於財富之共有一點，也不是到處都一樣的。

難道是如人們常常說的，做運動的先鋒的國民有和在後方躊躇不前的國民並足前進的必要麼？我們必須等着一切文明國內共產主義革命的時機成熟麼？當然不能這樣做！縱然我們願意這樣做，也是不能夠的。歷史不能等待立在後面的人們。

並且，我們還不相信在任何國家內，革命是一舉或一瞬間所能成功的，如某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夢想的一般。（註）假若法國的六個大都市——巴黎，里昂，馬賽，里耶（Lyon），聖埃丁尼（Saint-Etienne），波爾多（Bordeaux）——中之一個宣布成立了公社。其他的五個皆會四起而做做的，還有許多小都市也會照這樣做的。這是靠得住的。於是各種礦山和工業中心地也必急速和『所有主』『雇主』脫離，由勞動者自身組織成自

由團體。

(註)最有名的說莫過於論及柏林三月十八日革命之膚淺的社會主義小冊子中所宣傳的「二日的革命」以爲這「二日的革命」已使普魯士成立了代議制的政府(這是極錯誤的)。我們已看見

這說就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間在俄國所造成的弊害了。事實是這樣：普魯士直到一八七一年才和現在的俄羅斯一樣有一些叫做「憲法」那樣的紙片，然而並沒有代議制的政府。——英文本註。

然而許多鄉村地方還沒有進步到那一點。公社一面起了革命，而鄉村却依舊保持着兩可的態度，還在個人主義的組織之下過活。可是農民因爲沒有公差和稅官來攪擾他們，他們對革命黨也不懷着敵意，甯肯利用這新時勢來拖延償付地方上掠奪者的債款。然而他們以農民暴動的特質——實行的熱心(見一七九二年的熱烈行動)竭力來耕種土地；既不納租稅，又不付押款，他們對於土地便自然更有愛惜了。

說到其他的國家，革命雖到處爆發，而革命的面目却是不同的；這一個國家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那一個國家又實行聯合制，其細目則雖不一致，但大體上各處多少都採取

社·會·主·義·的·

(六)

現在我們再說到那叛亂的都市，看看那裏的市民怎樣才能夠為他們自己備辦食料。假若國民全體還沒有採行共產主義，又怎樣能得着必需的食品呢？這是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且拿法國的一個大都市——就拿首都巴黎來說也可以——來說。巴黎每年要消費幾千噸的穀類，四十萬頭牛，三十萬頭犢牛，四十萬頭豬，二百萬餘頭羊，此外還有許多獵鳥。這個大都會還要用去二千萬磅以上的乳油，二萬萬個雞蛋，其餘的物品也是依着這樣的比例的。

巴黎消費的麥糧和穀物都是從美國，俄國，匈牙利，意大利，埃及，印度等處輸入；畜類是從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羅馬尼亞和俄國等處輸入的；至於雜貨，都是從世界各國來的。

我們現在且來考究看巴黎或其他的大都市怎樣能夠僅僅用自己出產的東西來

支持下去，怎樣能使各地方喜歡送東西進來。

在那些信賴「強權」的人看來，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們起先會建設強固的中央集權的政府，設置一切壓迫的機械——警察、軍隊、斷頭機等。這政府會作出法國所有的物產的記錄。然後彼把法國區劃成各種供給地方，命令把指定量的某種食料於某月某日送到某個地方，在某個車站交付，在那裏又在一定的日期由一個特別的職員領收，放在倉庫裡去。

現在我們可以確信地宣言這樣的解決不僅是我們不願意的，而且到底完全不能實行。這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呵！

一個人手裏拿着一管筆坐在書齋裏可以做這樣的夢，然而要是他和實際生活接觸一下，那麼，便會證明出來這種理想是不可能的了。——一七九三年的事便是一個證據；因為這一類的理論太輕視了人類的獨立精神。這種舉動會引起普遍的暴動的，會使再有三四個凡德省（Vendée）出現，並且會引起村落對於都市的叛亂；要是某一

種城市要把這樣的制度強迫施行於全國，那麼，全法蘭西皆會武裝起來反抗這城市的。

(註) 凡德省的農夫在一七九三——九四年曾激烈的反對法國大革命——譯者註。

雅各賓黨的烏託邦我們已看得太多了！我們再看另外有無適當的組織方法呢？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鄉村地方使大都市受着饑餓，殺死了革命。並且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間法國穀物的生產並未減少，反而增加，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然而農民把地主的土地收歸己有而且得了收穫後，却不肯賣與那些使用紙幣的人。他們把產物藏起來等待價格增高，或者等別人用金幣來買。國民議會雖曾用最嚴厲的手段，也沒有什麼功效，雖以死刑來恐嚇農民，也不能解散其黨徒，使他們出售其穀物。國民議會的委員曾毫無顧忌地把那些不肯拿穀物到市場去賣的人捉來斬首，又把做食料投機事業的人無容赦地處以死刑。但無論如何，總得不到穀物，使都市的人苦於飢餓。

那麼，用什麼東西來報酬農夫的辛苦呢？土地債券 (Assignats) 麼？那是市價天天跌落，又不能履行償還之約的紙片。一張四十鎊的券不能買一雙長靴，農夫終年勞苦

得到一張紙券連一件襯衣也買不到。

當這沒有價值的紙片——或叫做土地債券，或叫做勞動券——依然拿與農業生產者作報酬的時候，情形常常都是一樣的。鄉村地方便把生產物藏起使都市苦於窮乏，雖像前次那樣把反抗的農夫殺死了幾個，也是不行的。

我們不用無價值的紙幣來和農夫的勤勞交易了，我們要拿農夫眼前需要的製品來和他們交換。他們沒有耕田的適當器具，沒有避寒暑的適當衣服，沒有可以代替燈心或蠟燭的微光的洋燈，也沒有鋤和草鎌。在現社會情形之下農夫連什麼東西都沒有，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他們在苦鬥和艱難的生活之中，一切有用的東西都不能到他們的身邊；因為他們沒有錢來買這些東西。

都市革命後，應該立即着手製造農夫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不再去造那些富豪的太太小姐們的裝飾物了。巴黎的縫紉機也應該製造鄉下人的衣服；作工的衣服和星期日穿的衣服，而不造那些英俄貴族和非洲富豪的太太們穿的高價的衣服了。各工場各製

造所也應該立刻從事製造耕作器械，鋤頭，草鎌等，不再等英國送這些東西來換法國的葡萄酒了！

都市也不應該再遣派什麼掛着紅的，青的，虹色的肩章的監察員到鄉下去命令農夫，把生產物拿到這裏或那裏了，只是派幾個很親切的代表到鄉裏以親睦的樣子對鄉下人民說：『我們要你們的產物，可是你們也可以隨便在我們的倉庫和店鋪裏取你們所需要的東西。』於是糧食便從各地方送來了。農夫只要把自己要用的食物留起，其餘的全送到城市裏來，這是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次，他們覺得都市的勞動者是他們的同志——他們的弟兄而決不是掠奪者了。

也許有人要告訴我們說這同時需要着工業的全部改造。當然，在某一部分這是一定的，然而其他的各部分是可以很快地改造過來，使衣服，鐘錶，家具，以及其他現在都市以額外價值售與農夫的簡單器械都由農夫自由取用。織工，裁縫，鞋匠，洋鐵匠，木匠以及其他許多工匠技術家等不再製造奢侈品了，把他們的力量用在有用品和必需品

的製造上面，這是很容易的事。最急需的是一般人的心理應該完全相信這種改造，並且把彼視作正義和進步的行動；而一般人也不要再被某一些理論家的得意的夢想所欺騙了——革命只是占取工業的利潤，而讓生產和商業仍照現在的樣子存在，這樣的革命的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對於這問題的全部，我們的意見便是如此。不用什麼紙片去欺騙農夫了——縱然那上面記着莫大的金額，也是無用的；我們要用他們土地耕作者必需的物品去交換他們的生產品。於是土地的產物便可輸入到都市裏來。假若不曾做到這樣，我們的都市便受着飢餓，反動與失望亦將接踵而至。

(七)

我們已說過，大都市需用的穀物，麥粉，肉類等不僅是從國內各地方購來的，而且還有些是從國外買來的。各國輸到巴黎的物品雖有很多的香料魚類以及各種美味，但穀物和肉類也是大宗。

然而當革命發生的時候，這些城市應該盡力量所能做到的不去依賴外國。俄國的小麥，意大利或印度的米，西班牙或匈牙利的葡萄酒等，雖有很多的出現於西歐市場上，然而並不是因為輸出這些物品的各國便已經十分有餘了，也不是因為這些東西像牧場上生的蒲公英一樣是自然生長的。例如在俄國，農民每日作十二小時的工，然而因為要把生產的穀物納與地主和國家的緣故，每年竟要挨餓三個月乃至六個月之久，這些穀物便被地主和國家輸到外國去了。現在當俄國村落收割好了的時候，警察便立刻出現了，要是農夫遲納租稅或未把地主的租錢付清，就隨便把他們的牛或馬拿去公賣；要免掉這個辦法，農夫只有含着眼淚來承認把穀物賣與經營輸出事業的商人。通常農夫們都願意只留下九個月的糧食，把其餘的都賣去，免得別人把他們的牲畜拿去賤價出賣，這樣，因為要維持生活到第二次收穫的時候，他們便不得不把樹皮和草葉混合在麥粉中吃，在豐年只吃三個月的樹皮和草葉就夠了，遇着凶年便要吃到六個月之久，爾同時在倫敦的人，却用他們（俄國農夫）的小麥，做成餅乾來吃着玩。

然而革命一發生，俄國農夫便會留着很充足的麵包預備他和他的小孩取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農夫也要照這樣做；我們希望印度人照這樣的好例做去，也可得着利益；美國的農夫要補足歐洲穀物的不足，究竟也困難。所以要靠他們供給小麥和玉蜀黍來滿足一切的缺乏，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資產階級的文明是基礎在劣等種族和工業組織未進步國家的掠奪上面的，那麼，革命的第一個恩惠便是，威脅這『文明』，使所謂劣等種族把自己解放出來。

然而這個大恩惠會使輸入西歐各大都市的食物供給，現出顯著的減少現象。要預言各地方的事務進行的狀況是很困難的。一方面土地的奴隸將乘着革命伸直了他的屈背。他們不再像現在那樣。每天做十四五小時的工作了，他們只作工七八小時，其結果自然要減少重要的消費品——穀物與其他食品——的生產。

而在他方面，當農夫知道他們的勤勞不會再拿去幫助懶惰的富人的時候，生產額

立刻就會增加起來。新區域的土地要開拓出來了，改良的新器械也要使用了。

米塞勒 (Michellet) (註) 論及法國大革命時曾告訴我們說：「當一七九二年法國農夫從地主手中取回他們垂涎已久的土地時，他們耕種土地的熱心和勤懇是從來所不會有過的。」

(註) 米塞勒是法國的史學家，著有「法國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 等書——譯者。

自然，在短期間內集約農法可得衆人的採用。改良的機械，化學肥料以及其他的這一類的物件都成了社會的共有財富，由公社來供給。然而事實指示出來在法國及其他各國，最初也會有農產物減少的現象。

無論如何，從外國輸入的以及從內地送來的東西都是一樣地減少的。——有什麼方法來補救這樣的減少呢？

沒有別的，只有我們自己開始來勞動救濟的方法近在我們的身邊，我們不必徒費

騰力去求遠方的仙丹了。

大都市和鄉村一樣，都應該着手於土地的耕種。我們必定要恢復生物學上所說的『各機能的總合』(Th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s)——就是說，在分工之後，又實行「全工」。這是遍於全自然界的進程。

此外，且不管哲理如何，環境的力量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巴黎若知道在八個月後，麵包便要缺乏，彼便要立即開始來種小麥。

土地是不會缺乏的，因為在大都市的周圍，特別在巴黎的周圍，大地主的花園和娛樂場是很多的。這幾千英畝的地面，只須加以熟練農夫的勞動，立刻比那被日光晒乾的南俄羅斯的草原更要肥腴，出產更多的田野，便會出現於巴黎的四周了。勞動是不會缺乏的。假若巴黎二百萬的居民一旦停止供給俄國王公、羅馬尼亞貴族以及柏林富豪的妻子等的豪華娛樂物品，那麼，他們注目到什麼地方呢？

有了現世紀的一切機械的發明；有了習於管理複雜機械的勞動者的智慧和技能；

有了發明家，化學家植物學教授，以及像金內威黎（Gennevilliers）的市場園藝家那樣的實地植物學家；有了這些人用來增加和改良他們的器械的一切工具；更加上巴黎人的團結精神，他們的勇氣和精力——無政府主義的巴黎公社有了上述的一切在彼的指揮之下，當然和亞爾丁來（Ardennes）的粗樸農業大不相同。

蒸汽，電氣，日光，風力，都可以隨人取用了。蒸汽力，蒸汽犁可以很快地做準備的粗工作；地面因為犁來犁去，已成了肥沃的土壤；只需要人們的注意——女子是要比男子更注意得周到些——而地面即為葱葱鬱鬱的植物所掩蓋了——而且一年不僅一次，竟會有三四次之多。

從有經驗的專門家學習了園藝耕作的方法；又用小小的土地來做各種不同栽培法的試驗；互相比賽看誰能得最好的結果；因為不做過度的工作，由於身體的運動便恢復了在都市裏所缺乏的健康體力——這樣，男子，婦女，和小孩都喜歡到田間去勞動；這不再是奴隸的賤役了，這是一種快樂，一種喜慶，一種使身體健康的娛樂。

『世界上無不毛之地，土地的價值因人而定。』——這便是近世農業的歸結。去向土地要求麵包，假若你的要求得當，她一定要給與你的。

就像在西萊河 (Seine) 及西萊愛俄斯 (Seine-et-Oise) 那樣小的地方雖供養像巴黎那樣大的都市，實際上也會產出充分的一切食料。除此以外，並無別法。

農業和工業的聯合，一個人同時做農夫又做工人——無政府共產主義若起初以充公作出發點，便會引我們向着這方面走去的。

讓革命一直向前猛進，飢饉並不是革命的可怕的仇敵。可怕的危險是在中途停頓，在怯懦，在頑迷。這危險丹東已經看破了，他即向法國叫道：『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先有大膽的思想，然後才有大膽的行爲。

第六章 住居

凡會精密地注視過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勞動者間發達的人，必定會覺得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平民的住房問題——應該得着一定的結論。在法國各大都市以及許多小都市中的勞動者們，已漸漸地斷定住房無論如何都不是國家所承認爲房主的人的私有財產：這是確實的事實。

這種思想在平民的心中自然地發展起來。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所有權」應該擴張到房屋上面去的。

房屋並不是房主建築起來的。這是由那些求最低的工錢來活命在木場、磚瓦製造所和工場裏作工的無數的勞動者建築、裝飾、整理出來的。

至於房主所費用的金錢，也不是他自己的勤勞所生產出來的。這與所有其他的財富一樣，也是由於那隻付給勞動者所應得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而掠奪了其他

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方法積蓄起來的。

而且此等手續不費的事，人皆知道了，——房屋的實際價格是從房主所收得的利益得來的。這種利益又是由於那房屋建築在都市裏的事實的結果。——即是說因為這房屋建築在一個有石子砌的街道，有橋梁，有碼頭，有美麗的公共建築物的大都市中。一個能夠供給居民以鄉村間所不知道的無數的安慰和快樂的大都市中；一個常與其他都市交通而且自身又是工業，商業，科學，藝術的中心的大都市中；一個由二三十代居民的勞力造成的這樣又美麗，又衛生，又宜於居住的大都市中；所以這房屋才有很高的價格。

譬如說在巴黎某處有一所房屋，其價格是幾千鎊，並不是因為造這所房屋所費的勞力值得幾千鎊，不過是因為這所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罷了；由於幾百年間的無數勞動者，藝術家，思想家的供獻，方便巴黎成了工業，商業，政治，藝術與科學的中心；又靠着文學的力量，巴黎各街市的名稱才得遍傳於國內和國外；又因為這是五十代的法國國民在

一千八百多年間的勤勞的結果；——這樣才使巴黎的房屋能有很高的價格。

然則，要不是去作那不義的事，誰還敢把在巴黎這樣的都市中的一小塊土地一所小建築物占據在自己的手中壟斷呢？誰又有權利來出賣這共同遺產中的最小部分呢？

在這一點上，勞動者的意見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圍困，無產階級已高唱拒絕房主的
要求條件時，這不納租錢居住的觀念已經很明顯的存在了。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時代，巴黎勞動者已期待着公·社·會·議·來·決·然·地·把·房·租·廢·除·了。在未來的新·革·命·發·生·的
時候，這便是貧民利害休戚相關的第一着問題。

無論在革命的時候或在和平的時候，勞動者必須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頭上不能
不有屋頂來遮蓋烈日和暴雨。但是，縱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樣的壞，怎樣的污穢，而房主在
任何時期都可以將他逐出的。實在，在革命的時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來把勞動者
的襤褸的衣服及其他的東西拿出來拋到街上去，然而誰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樣·做
呢？誰又能斷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來逼迫勞動者搬出他所居住的破屋呢？我們難

道不會看見巴黎公社免除四月一日以前——只是四月一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嗎？（註）但在四月一日以後，依然必須繳納房租，那時尚在混亂時代，工業也完全停滯了；至於那些武裝起來防衛巴黎獨立的革命家除了每日十五辨士的薪金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來養活他和他的家族了！

（註）三月三十日的布告：此布告廢除一八七〇年十月，一八七一年一月與四月的房租——原註。

那麼，勞動者必須明白地知道在拒絕付給租錢與地主和房主時並不僅是乘着強權瓦解的利益。他應該知道租錢的廢除是一般人已經承認的一個原則；不納租錢而居住是平民高聲宣言的一種權利了。

這種辦法實在是能夠調和各個誠實的人中間的正義的感情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等着那些組織成臨時政府的中產階級之中的幾個社會黨人來採用這種辦法呢？假若要那樣做，我們便必須長久的等待着——其實，要等到守舊的反動重來呢！

因此，那些熱誠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東西——這是強權與奴隸的表

面招牌——他們以平民的地位生活於平民之中，與民衆共同工作；這樣，便使租錢的廢止和房屋的充公成了事實。他們要培養思想的土地，使思想向着這方向發展；當他們工作的結果成熟的時候，平民便進而着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總有些妨礙這個理論——即是說要賠償地主或房主的損失，必先有必要的財源，可是這是不足慮的。

在房屋實行充公的那一天，從來被掠奪的勞動者將知道新的時代來了，勞動不再受富貴權勢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的宣布了，革命已成了真實的事實，並不是像從來那樣的戲臺上的假東西了。

(二)

假若充公的觀念一經平民採用，那麼雖有許多來恐嚇我們的障礙也不足慮，充公是會漸次實行的。

自然那些穿着新制服坐在市政廳 (Hotel de Ville) 的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着來堆積障礙物的。他們要談論怎樣賠償房主地主的損失，製出統計表，做長的

報告書等等的事件。他們的報告書是極長的，一直會做到平民在這失業的狀態中不能再等待了，不能挨餓了，可是總不會見着此等職員的調查得到何種效果。後來便灰心短氣，喪失了對於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動派方面去了。於是新官僚政治的充公便成了被萬人疾視憎惡的東西了。

這裏實在有一個巖礁，會使我們的希望撞沈的。然而假若平民用耳來聽聽那些迷惑他們的似是而非的議論，知道新的生活需要着新的社會狀態，假若他們自己起來擔任這事業，那麼，充公便可很容易地實行了，不會遇着什麼大困難的。

你們要問：「然而怎樣呢？要怎樣才能夠呢？」我們要試試來答覆這問題，不過要審慎一下。我們並不想把充公的計畫極詳細地描寫出來。我們早就知道凡是任何個人或任何團體所能夠提示的，總不及實際出現的時候好得多。人們靠着簡單的方法，會成就更大的事業，並且還比較用別人預先想定的方法所得着的結果更要好些。我們現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能夠成就充公的方法。我們對於那些斷言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人們，也不想用別的方法來回答。我們只要答覆說，我們並不絕對地主張何種特別的組織方法。我們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夠由人民的發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有效的。

事實看來似乎是這樣，當充公實現的時候，各區，各街，各巷都有志願隊組織起來並且着手調查住宅〔註〕和房屋的數目，何處是空着的，何處是住滿了人擁擠不堪的，何處是污穢的陋巷，何處是住的人數少而地方寬，應該把那些擁擠於一間小房子內的許多人移些過去，——這些都應該調查得清清楚楚。在幾天之內這些志願隊要把所屬各街，各巷，各區的一切住宅，租屋，府第，別墅等等的房間和附屬室究竟是衛生或不衛生，大小，寬狹，臭穢，奢侈等等調查得極清楚。製出全部的目錄來。

〔註〕住宅 (Housing) 即是把一大家房屋區劃成幾間，一所住宅有數間房屋，頗適於一家庭居住的。——
譯本註。

這些志願隊自由地互相通聲氣，所以他們的統計，於極短期間便可完成。若說虛偽

的統計，這是在什麼局裏或事務室裏製造出來的；然而正確而精密的統計却非由個人着手擔任不可，而且要由簡單到複雜。

於是，那些市民並不等待什麼人的允許，就快快地跑去尋找那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屋中的同志們，並且向他們說：『同志們，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沒有什麼錯的。今晚在某處集會；所有的鄰居都會來的。我們要把住房重新分配過。如果你們嫌那污穢狹小的房子不好，那麼，請來選擇一所有五間屋子的住宅，只要你遷移進去以後，什麼都由你自己處理，無論住到什麼時候都可以，不必畏懼。因為平民已經武裝起來了，縱有人敢來驅逐你們，平民也是不答應的。』

有人說：『任何人都願意住美麗的房子，寬大的住宅。』其實不然，這是錯誤的見解。平民從不會有把月亮取來放在桶裡的妄想。反之，他們每每着手來矯正某種弊害；羣衆的好意和正義之心常使我們感動。我們幾時會看見他們要求過不能做到的事呢？在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四年的恐怖時代的時候，或者在巴黎兩次被圍攻的時候，巴黎的平民

等候着麵包和燃料的分配，然而他們中間何嘗起了什麼爭奪的事呢？他們忍耐力量又能放棄權利，在一八七一年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並且常常受着外國新聞通信員的讚賞。然而這些忍耐的等待者，也完全知道最後來的人是得不着食物與燃料過日的。

若把現在社會中的各個人分開來看，自然，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們很知道這個。但我們以為若要把平民居住的問題拿與什麼局，什麼委員來解決，其實就是依賴着任何形式的官府的恩惠，其結果便要使這種利己的本能復活，而且還要培養彼，使之發展。於是一切惡念都起來了，而且誰是局中最有勢力的人物也成了問題了。稍微有一點不平等的事便會引起爭論和訴訟的。假若某一個人得到了一點極小的利益，這件事便會成爲怒罵叫喚的根源，——而且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然而假若依各街，各區，各部分而團結起來的平民，依着自已的計劃來把住在污穢狹小的房子裏的居民移到中產階級的沒有人住的房屋裏去，那麼，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們不常求助於民衆的良善的本能，——這是救助革命時

代的沉沒船隻的急救法——然而這樣的求助，決不是無效的；勞動者每次都以義勇和獻身的精神來回答我們的求助聲。將來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一切雖都處置過去了，但仍會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存在的。在我們的社會中還有這樣的人，他們久沉淪於利己主義的泥沼中，雖遇着絕大的危機，也不能自拔出來的。現在不是將來有沒有不公道的問題，却是怎樣可以減少不公道的問題了。

一切的歷史，一切的人類經驗，以及一切的社會心理學都指示出來，凡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於信任那些與這件事最有密切關係的人們的決定。只有這些人才會注意到那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地忽略了無數的細小事情。

(三)

並且一切居住的分配也沒有立刻就要得着絕對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許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實行了充公的社會中，不久便可以矯正的。

當石匠，木匠及其他與房屋的建造有關係的人得着了每天的麵包不會欠缺的保

證時，他們除了每天作幾小時他們原來的職業的工作而外，再也不想別的了。他們要把那會耗費了無數奴僕的時間建築起來只供給幾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樓改造過，在二三十個月之中便要造出來比現在的更合於衛生更輕便的房屋了。無政府公社向着那些還沒有得安適的住居的人，便說：「同志們，請忍耐一下罷！在我們獨立自治的都市中不久會有此任何資本家爲他們自己建造出來的房屋更壯觀更美麗的宮殿出現的。這房屋是屬於那些需要最切的人們的。無政府公社並不是爲着想增加歲入方來建造房屋的。這些爲着市民而建立的紀念物，這些共同心的結果，要表示出來爲全人類的模範的；這些都是你們的東西。」

假若革命的平民把房屋充公了，並且宣布房屋不收租稅——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着適當的居住的權利——那麼，革命在開始的時候，便有了共產主義的性質，方針一定，便向着那方面進行，不容易再動搖。這對於個人私有財產當然會給與一致命的打擊。

其實社會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裡面了。只看充公的成就狀態如何，所生出的事實的一切性質也就不同。或者我們能一直向着無政府共產制度的道途上進行，否則便要陷於專制的個人主義的泥土之中。

由此，我們所一定要遇着的許多的反對論——一方面是理論上的，一方面是實際上的——都是很容易明白的。反對我們的人多少總要保持一點公平，所以他們自然也要『藉着正義的名義』來反對。他們說：『這不是異常可恥的事嗎？鄉間的農夫所住的只是快要倒了的茅屋，而巴黎的平民獨把這些美麗的房屋都占據了去。』然而我們是不錯的。這些熱心正義的人，因為健忘的緣故，却忘記了他們自己也在暗中防護着這種『異常可恥的事』。他們忘記了便在巴黎也有無數的勞動者窒息于污穢狹小的房屋中，然而從窗子裡面却可看見富豪們的高樓大廈。他們忘記了世世代代的平民都在連空氣與日光都享不到的貧民窟裡悶死了。革命的第一着事業便是矯正這種不公平的事實。

我們不要被這種愚劣的反對論所迷惑而停止前進了。我們知道在革命開始的時候，都市與鄉村間雖不能平等，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經過一些時日就會自然改正的。何以呢？因為如果農夫不再作大農（有錢的農人），商人，放債的人，和國家的牛馬，那時，村落便要立刻着手於居住的改良。難道爲着要避免偶然的暫時的平等，我們便應該停止了從前錯誤的矯正麼？

所謂實際上的反對論也是不凶的。他們說，有一個貧窮的人盡力勞動受了無數的困苦，買到了一所房屋，恰恰夠他的全家居住。然而我們要把他這樣辛苦得來的幸福剝奪了，反把他驅逐到街上去！這是合於道理的嗎？其實我們決不會這樣做的。假若他的房屋果然足夠他的全家居住，那麼，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叫他搬出去的。讓他培植他的小小的花園，我們的人是不會來妨害他的工作的，——而且只要用得着幫助的時候，他們也會幫助他的。然而假設他有多餘的空屋租與別人，那麼，平民便要去向那租屋的人說：『同志！你要知道你以後不應該再付租錢與從前的房主了。你就在這裡住下去罷，可是

不要再付什麼租錢。從前那樣的收租人和徵稅人都沒有了；社會主義把那一切都廢止了。

我們再想想看房主一個人占據了一二十間的屋子，而住在附近的貧窮婦女同着她的四五個小孩都擠在一間小屋子裏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平民自然要設法使那些空屋變做那貧窮婦女和她的四五個小孩的安舒的家庭了。這與一方面使那貧窮的婦女和她的小孩住在破屋裏受苦，一方面却讓麥達斯先生 (Sir Gorgonius Midas) 坐在高樓大廈裏作樂的事比較起來却是公平多了。而且那良善的麥達斯先生也許會自動地來實行這件事的；他的夫人因為沒有了從前驅使的奴婢，覺得這樣大的房子難得收拾，也會願意讓出一半來。

那些擁護法律和秩序的人會說：『你們要把什麼東西都推翻了。什麼驅逐呀，遷移呀，都不會有停止的時候。其實不如把大家都叫到門外去用拈鬮的方法來重新分配，這豈不更好？』他們的批評是如此。然而我們却堅定的相信假若沒有了政府的干涉，而一

切的改變的事都委託與那些特別組織起來擔任這種工作的自由團體去做，那麼，驅逐和遷移的事一定會比較在現社會制度之下一年中因房主的貪慾而起的這一類的事實少得多。

第一，在所有的大都市內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空屋和住宅足以供所有住在污穢狹小的屋子裏的居民的居住的。至於廣大的宮殿和美麗的房屋，許多的工人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去住的。假若沒有了許多的奴婢，一個人也難得『保持』着這樣大的房屋。便是現在住在這些房屋裡的人們不久也會覺得有另找較簡樸的居住的必要了。假若那些美麗的貴婦人自己到廚房去烹調，她們便會覺得這樣大的房屋是不十分適宜的了。平民會漸漸地安定了。平民不必用槍刺來把狄衛士 (Dives：富豪) 逐到小屋子裏去，也不必用武裝來護衛拉沙魯斯 (Icarus：一個乞丐的名字) 到狄衛士的大廈裏去了，他們沒有遇着什麼阻力，也沒有感着什麼不便，就會和平地把適當的住居分配妥定了。現在的村落公社分配田地，並不攪擾土地的所有者，這樣有智慮有好意的方法，

誰能不佩服呢？在俄國公社的管理之下的田野與常常到法庭去起訴訟的在私有財產權名義之下的田野比較起來，前者改換主人的時候是更要少些。難道我們會相信歐洲大都市的居民的智慧和團結力還不及俄國、印度的農民嗎？

而且我們不要忘記所有的革命，多少總含着一點擾亂日常生活的意義；那些希望從舊社會跑到新社會時，甚至於連資產階級的食桌上的器皿都不會震動的人，不久會覺悟他們這種見解是謬誤的了。誠然，改換政府的時候，可以不必去攪擾那些正在吃午飯的堂堂的紳士，然而社會對於其維持者的平民所犯的罪惡，決不是任何政黨的狡計所能報償的。

紛擾是免不掉的；這不能完全消滅，只能逐漸減少。而且——這也不可看得太重要——我們要減除各人的不便利，只有和那些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的朋友們商量，決不能委諸官廳和委員會；這樣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

平民用投票法選舉出輕浮的候補者，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了。這個候補者爲着要求

得代表他們的榮譽，所以裝出什麼事都知道，什麼事都能夠做的樣子。然而當平民自己去做他們所知道而且和他們有直接關係的事時，總要比讓什麼官僚什麼代表去做時所得到的結果更要好些。巴黎公社不就是一个適合的例子麼？船塢的大罷工不也是這樣麼？而且我們還常常在村落公社中得着這樣事實的證據呢！

第七章 衣服

當房屋已經成了市民的公共財產，而且每人每日的食物也不缺乏，那時便要更進一步了。這次要討論的，自然是衣服問題；而這個問題的唯一的可能的解決，也不外乎以人民的名義把一切出賣和貯藏衣服的店鋪倉庫占領了。開放門戶與一切的人，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取用他所需要的東西。衣服的共有（每人都有在公共倉庫中取去他所需要的東西和在成衣店裏製衣服的權利）是由房屋和食物的共有所得來的必然的推論。

顯然的，我們並不必把一切市民的大衣脫去，把所有的衣服堆在一塊兒，叫各人來拈圖均分，如那些機智利巧的批評家所說的。有一件大衣穿在身上的人，讓他穿着好了，——縱然他一個人有十件大衣，也沒有取去的必要；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喜歡穿新的大衣，誰還願去穿那已經被肥大紳士的肩頭磨擦舊了的大衣呢？並且那時新的衣服已很

夠了，也用不着奮的了。

假若我們把大都市的店鋪和倉庫內放着的一切衣服統計一下，作一個目錄，我們便會發現在巴黎，里昂，馬賽，波爾多等處已有很夠的衣服，使公社可以供給全市民男女的需要了。縱然一時有所不足，公共的成衣所也可以立刻補其缺數。我們都知道要是現在的成衣店有了適用於大規模生產的機械，那麼彼等的工作便會進行得異常迅速的。

反對論者又會說：「然而每個男子都想穿黑貂皮裏的大衣，每個婦女都想穿天鵝絨的外衣呢！」

明白地說，我們全不相信這樣的話。婦女們不見得都喜歡天鵝絨，便是男子們也不見得全喜歡黑貂皮。就在現社會，假若我們要婦女們選擇她們的外衣，其中定有不少的人愛樸素適用的衣服勝於交際社會中流行的華美的服裝。

趣味是隨時代而變遷的。在革命時候流行的，一定是樸質的東西。社會與個人一樣，有怯懦的時候，也有大胆的時候。雖然今日之社會沉淪在狹隘的個人利益之追求和卑

鄙淺薄的思想之中，然而一旦大危機到來時，彼の風氣和態度便要變換了。社會便有偉大和熱誠的時候。現在市利之徒所握着的勢力將要移到高德之人的手中去了。獻身的精神勃興，崇高的行爲更如風起雲湧般發生着；便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到了那時也覺得徘徊不前是可恥的事了，縱令自己不做做那樣高貴的和勇敢的舉動，至少也要贊款彼等的。

一七九三年的大革命，便充滿了這類的例子。在這樣精神復活（在個人如此，在社會亦如此）的時候，熱誠的潮流使人類向前猛進。

我們不必過於誇張這種崇高的感情的效力，也不想把我們的理想社會建設在這種感情上面。然而我們想着彼等的幫助來通過第一着的難關，這並不算是過分的希望。誠然，我們不能希望我們的日常生活會不斷的爲此種高調的熱誠所鼓動着，然而我們可以期望第一着得到彼等的幫助，我們聽需要的，如是而已。

無政府的新社會要把幾百年來奴隸制與壓制所堆積起的污物渣滓掃蕩淨盡，把

地面洗滌一下，這非用博愛的波浪不可。到了後來，這新社會不必再有這種自己犧牲的精神，也能存在了，因為壓制既絕了跡，並且這社會已經成了一個充滿協同感情 (Les sentiments de solidarité) 的新社會了。

革命的性質要是果如我們所說的，要消滅利己主義者的行爲，那麼，非讓個人的自由創意得着廣大的活動範圍不可。各街，各區的居民都應該組織團體，擔負供給衣服的責任，他們把這城市所有的一切物品的目錄做出來，由此可知他們可以處分的財富額究竟能有多少。市民對於衣服也採取對於食物的同一原理，這是確實的。——這便是說，「數量很豐富的東西，可任人自由取用；數量很有限的物品，則平均分配。」

要每個男子都得着黑貂皮裏的大衣，每個婦女都得着天鵝絨的外衣，是不能夠的事，社會要把必需品和多餘品分別得很清楚的。至少黑貂皮和天鵝絨都應列在生活不必需的多餘品之類；今日的奢侈品到了明天不見得就成了萬人普遍的東西，這還讓時間來證明。至於必需的衣服，則無政府城市的市民都應得着可以自由取用的保證。我

們所視為奢侈品的東西，可以拿來供給病人和老幼使用，還有一般市民每日消費所不需用之特別物品也可以拿來供給身體軟弱的人使用，這些事都任私人行動，不加干涉的。

會有人說：「這是毫無趣味的劃一，並且還要消滅人生和藝術上的一切的美，」我們便回答說：「決不是這樣。」便縱然把我們的意見基礎在現時事物上，我們也會指出無政府的社會能夠滿足人民的最高的藝術趣味，並不使他們去替富豪作牛馬，增加富豪們的財產的。

第八章 財源

假若一社會，一都市，一地方要向其居民保證生活必需品不會缺乏，（我們要知道此種生活必需品的範圍還能擴大，也得包含着許多奢侈品）那麼，無論如何必定要把生產所絕對必需的東西——土地，機械，工廠，運輸機關等占據在手裏。在私人手中的資本也應該充公，歸還與社會全體。

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大害處不僅是資本家壟斷了各種商業的大部分利益，因此他們得以不工而食，而且是一切生產皆向着錯誤的方針進行，並不想保證萬人的安樂。這就是我們攻擊現社會的理由。

要使現在商業的生產依着爲萬人的利益的方針進行，實際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做到這個直無異乎希望資本家離開他的職分去履行資本公司——一個想自己發財的私人製造者——所不能夠盡的義務。資本家的組織是基礎在每個企業主自身的利

益上面的；彼已經把可望得到的一切供給與社會了，這就是增加了勞動的生產力。資本家乘着因用蒸汽而起的工業革命，化學和器械的突然發達以及現代的各種發明等等機會，爲着自己的利益盡力來增加人類勞動的產物，在大體上已經得着很大的成功了。例如要期望着資本家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使用他的巨額的勞動產物直無異乎哀求他的仁惠慈善，然而資本家的企業是不能基礎在慈善上面的。

現在，社會的最重要的任務便是把今日限於某種工業的這種巨大生產力擴充起來，並且應用彼來謀全體的福利。然而社會爲着利用此種勞動的生產力來保證萬人的安樂計，非占有一切的生產機關不可：這是很顯然的。

經濟學家常常說，那些熟習一種特別技術的某一種類的少壯勞動者，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可得着比較的安樂生活。誠然，他們常帶着驕傲的樣子把這少數人指示於我們看看。然而這少數人所享有的特權——安樂便是安全的嗎？或者到了明天因爲那雇主的貪慾，淺慮，和怠慢的緣故，這些享受着特權的人便要失業了；現在所享受到的快樂便

成了將來幾個月或幾年的貧困艱難的根源。許多大工業——織物、鐵、砂糖等，其他的短命小工業且不說——或因受着投機影響，或因事業自然變更的結果，或因資本家自身之間競爭的影響，遂至凋零或陷於停頓；難道我們不曾看見嗎？假若主要的織物和機械工業等再經過像一八八六年所遭遇的那樣恐慌，那麼，所有其他的小工業一時會完全停頓，這也是不用多說的。

而且我們再看爲着要使某一種類的勞動者得到比較的安樂的緣故所付的代價究竟有多少？不幸，這實在是以農業的零落和對農民之無恥的掠奪，以及民衆的悲慘買來的。我們且拿那些度日艱難，糧無隔宿，無一定工資，無一定工作地方的千百萬人以及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活命的農夫來和這多少享受着一點快樂的少數特殊勞動者比較着！資本減少了鄉村的人口，掠奪了殖民地 and 工業未發達的各國，使大多數的勞動者不得受着專門的教育，便是對於自身的職業，他們的智識也只是很平常的。

這不僅是偶然的事，而且是資本制度的必然的結果。因爲要報酬某一部分的勞動

者，便使農民不得。不成了負着現社會重擔的牛馬；鄉村不得。不爲都市之故而荒廢；小工業也不得不聚集在大都市附近的污穢地方去製造許多極其廉價的物品而使大工業的出品得達到那些收入甚少的購買者的身邊。因爲要把粗惡的衣服買與收入很少的勞動者，成衣匠便不得不作衣服來求甚至不夠吃飯的工錢。因爲要在資本制度之下使二三種特殊工業的勞動者得着有限的快樂生活的緣故，東方進步較遲的國家常爲西歐所掠奪。

因此現在制度的弊害並不是如羅德伯爾都斯 (Rodbertus) 與馬克斯所說，生產的「剩餘價值」歸到資本家手中這件事，這樣簡直把社會主義的概念和資本制度的「一般的見解弄狹小了」；「剩餘價值」本身是由一種深刻的原因生出的結果。真正的弊害與其說是一般人民沒有消費着剩餘，不如說是使剩餘價值有存在的可能；因爲剩餘價值的存在即是一般男女和兒童爲飢寒所迫，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求他們勞力的產物的一小部分，尤其是他們的勞力所能夠生產的物的一小部分。當生產機關仍

被擱在少數人的手裏的時候，這種弊害是不會消滅的。當人們爲着要求得耕種土地運用機械的權利，便不得不納重稅與所有主的時候，當土地與機械的所有主可以隨意生產有利於他們的物品——並不就是有用的物品——的時候，只有少數人纔能得着安樂的保證；這是以社會上大部分人的貧困購買來的。實在，要是一方面許多其他的工人被掠奪的時候，僅把由職業所得的利益平均分配與少數特殊的勞動者，這是不夠的。這問題是在於費去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小的人類的精力，生產出最大量的保證萬人安樂的必需品。

這一般人的目的決不能是私人資本家的目的；這便是爲什麼社會全體既以生產上的意見爲理想創造財富時，便不得不把一切可以增進安樂的物品實行充公的理由。社會應該占領土地，工廠，生產機關等，而且還應研究生產財源以及什麼樣的生產物才能增進一般的安樂的問題。

一個人爲着生產他一家的營養的食物，舒服的住居，必需的衣服等，一天究竟應該勞動幾小時呢？這是社會主義者間常常討論的問題，他們大概都得着下面的結論：假若全人類都來勞動，那麼，每天只要勞動四五小時便夠了。富蘭克林（Franklin）在十八世紀之末便決定這勞動時間爲五小時；雖說安樂的欲求增加了，但生產力也同時增加了，而且更要快些。

更就農業來說，我們也可看出，若是人們依合理的科學方法來耕種，而不再像今日那樣隨意散播種子於那些以笨拙的方法耕種的田地中，那麼，土地所能貢獻於我們的產物一定是很多的。在美洲西部的田地，有些有三十方哩的面積，然而與文明國家的施過肥料的土地比起來總算是瘠弱的，每一英畝只能產出十英斗乃至十五英斗；這就是說比較歐洲以及美洲東部的田地所出產的要少一半。（註）而且靠着機械的力量，兩個人一天可以耕種四英畝的田地，一百個人在一年之中，可以產出坐在他們家裏的一萬人全年的食品了。

(註)這是從前的情形，現在不同了。——譯者。

因此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一個人只要作了三十小時（每天五點鐘，共要六天）的工，便可得到他所需要的全年的麵包而有餘了；要是作三十天的工便可以養活五口的家族了。

假若我們採用集約農法一個人還要不到六個半天的勞動便可獲得他的全家所需要的麵包，肉，蔬菜以及奢侈的果物：這是依今日所得到的結果可以證明的。

我們再來考察在今日的大都市中建築的勞動者住所的代價，我們便可確信在英國大都市中建一所勞動者居住的小房子一天作五小時的工，只要一千四百天乃至一千八百天就夠了。這種房子至少可以保持五十年；一個人一年念八天乃至三十六天的半日勞動就可以得着他的全家的家具齊備，又合衛生而且極其舒服的住居了。但若要從房主那裏去租這樣的房子，那麼，勞動者每年便要作七十五天乃至一百天的全日的工作才夠支付房租。

這個計算表示出來今日英國的一所房屋的最高價格，我們要注意這是在現社會的缺陷組織中得到的計算，在將來良好的社會中當然更要廉價得多。在比利時勞動者的街市（Cites Ouvrières 勞動者共住的大長屋）中的工人住房的建造，更要價廉得多。所以我們若把一切的事都拿來考慮一下，便可斷言在良好的社會中一年間三十日乃至四半日的半日勞動便足以得到一個極舒服的家庭。

現在再說到衣服一層，衣服的精確價值是很難定的，因為經紀人（中間人）等所占的利益是不能算出的。例如說呢，把從地主、蓄綿羊的人、羊毛商人以及其他一切中間人起一直到鐵路公司、紡績廠、織物工人、成衣店和販賣衣服的經手人等等，對於每碼的呢的貢獻合起計算起來，我們便可想像得到我們爲着每件衣服所付與一羣資本家的代價是怎樣的。因此，那些在倫敦大商店中賣三四鎊的大衣要說是值得幾天的勞動是絕對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所能斷定的便是靠着現在的機械的力量，我們能夠製造出幾乎不可相

信的那樣多的物品，價值既廉而且又快。

只舉兩三個例便夠了。因此在美國七百五十一個綿紗工廠（紡績和織物）中，七萬五千個男女工人除製造出許多的綿絲而外，還造出二十億三千三百萬碼的綿布。平均算來，每日工作九小時半，一共作了三百天的工，便可生產出一萬二千碼以上的綿布，即是每十小時生產四十碼。就說一個家庭每年至多不過需要二百碼，這等於五十小時的勞動。即是每日五小時共作十天的工。此外我們還有綿絲；這就是說織的綿布和織布的絲，以便來製造毛綿混合物。

〔註〕這是三十餘年前的統計表，現在的生產率比以前更高了許多。——譯者。

至於單獨紡織所得的成績，依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一八七〇年勞動者每天作十三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工，在一年之中製造出一萬碼的白布；過了十六年後（一八八六年）只要每週作五十五小時的工，便可織出三萬碼了。到了現在，生產率更很快地增高起來。

便說到花洋布，（紡織和印花的時間在內）每年二千六百七十小時的勞動——

每小時造出十二碼內外——也可以生產出三萬二千碼來。那麼，要得二百碼的白地印花的綿布，只要每年作十七小時的工便夠了。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原料從耕作地方送到工場去，而漸漸變形一直到造成了綿布，這其間所費去的時間都是在這十七小時以內。然而若要從商人那裏去買這二百碼的綿布，一個收入較多的工人，至少也必須付出十天或十五天（每天十小時）勞動的代價，這即是說要付出一百小時或一百五十小時的勞動的代價。要是一個英國的農夫想得到這種奢侈品，他便要去作一月或一月以上的工才能付出這奢侈品的代價。

由此例看來，我們可知道在良好社會組織之下，只要每年五十天的半日勞動，我們便可得着比現在小資產階級所穿着的更要華美的衣服了。

如以上所述，我們爲着要得到土地的產物，只要每天作五小時的工，共作工六十天便夠了；爲着要得到房屋居住，只須作工四十天便夠了；爲着要得衣服穿着，只須作工五

十天便夠了；假若我們把休息日除開，每年的勞動日子算成三百天，那麼這不過是半年的勞動罷了。

因此，還要剩餘下一百五十天的勞動可以用來製造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葡萄酒，砂糖，咖啡，家具，運輸等。

固然，這些計算只不過是近似的，並不是極正確的，然而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證明。我們看：在現在所謂文明國家中有許多的人徒手遊蕩，不作一事；有許多的人終日從事於應該消滅的，有害的職業，還有許多無用的經紀人；這樣我們可知無論在任何國家中，實際生產者只有其國民的半數。假若從前十個人作的工，現在由二十個人來作，製造有用的物品，假若社會盡力來節省人類的精力，那麼，這二十個人每天只要作五小時的工便夠了，生產也並不會減少的。現在，每個富豪的家裏養起了許多無用的奴隸；而且在有十個居民或甚至於只有六個居民的地方，便要設一個官吏，這樣的行政，都是無益的浪費；假若我們盡量地減少了人類精力的這種浪費而且利用此等力量來參加國民

的生產力，這是很夠的。實在，我們能夠把工作的時間減少到每日四小時或三小時，而同時物品生產的數量並不比現在所產出的爲少。

倘若我們把這些事實合起來研究。我們便可得到下面的結論：假定現在有一個社會，居民不過數百萬，從事於農業及種種的工業——例如，巴黎同着西來愛俄斯。假定這社會裏的兒童所學習不僅是腦勞動，而且還是手勞動。除開那些從事教育兒童的婦人而外，凡是成年的人，從二十歲或二十二歲起，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止，每天都應該勞動五小時。而且還要從事於這城裏所認爲必需的一種職業，但任其選擇任何部門。這樣的社會才能夠保證其中一切人的安樂，比今日中產階級所享受到的安樂還要實在些。並且這社會的各工人至少每天有五小時的時間用在科學、藝術，以及那些不便歸在必需品的項下的個人慾求上面，然而在人類生產力增加的時候，這些東西也成爲必需品，不再是奢侈難得的東西了。

第九章 奢侈的欲求

人類不是僅以衣食住爲其一生之目的的東西。他的物質的缺乏一經滿足，立刻其他的有技巧性質的欲求，便突然熱烈地發生出來。這樣的欲求有很多的種類，因人而異的；社會愈文明，個性愈發達，而慾望之種類亦愈多。

便是在現在，還有人否認獲得這樣無味的東西或求得特殊的快樂以及精神上物質上的娛樂的必要。一個基督教徒或禁慾主義者自然要排斥這些奢侈的慾望；可是正要靠著這些無味的東西，才能破人生的單調，而使其成爲有趣味的呵！若人不能於其每日工作之外，得一種適合他個人嗜好的快樂，那麼，這悲哀與勞苦的人生，果有生活下去的價值麼？

我們希望的社會革命，不待言第一着就要把麵包分給與一切的人把這可詛咒的社會改造過——在這社會中許多強壯的工人因爲找不到一個掠奪他的雇主，以致失

業終日向人搖尾乞憐；許多的婦人和小孩晚間在街中漂蕩，沒有宿處；全家族僅以乾麵包來維繫生命；男人、婦女和小孩因為看護不足或甚至食物缺乏而餓死；這都是我們每日所常見的。我們起來暴動，便是爲着想禁絕這些不公道的緣故。

我們所期望於革命的，不僅如是而已。我們見着勞働者爲苦痛的生存競爭所迫，甚至到了完全不知道人類所能得到的高尙的娛樂——科學（特別是科學的發現）的娛樂和藝術（特別是藝術的創造）的娛樂。爲着要把今日少數所佔有的娛樂供給與一切的人；爲着要使一切的人都有發展他們精神的才能的餘暇和能力，那麼，社會革命必須保證每人每日的麵包。麵包得着保證以後，至上的目的便是閒暇了。

自然，在現在無數的人缺乏着麵包、煤炭、衣服、住所的時候，奢侈是一種罪惡；要滿足奢侈，便要使勞働者的小孩沒有麵包吃！然而在將來人人都得到了必需的衣食住的社會中，今日視爲奢侈的東西，到那時都會感覺得是必要的了。因爲所有的人都不是一樣的，而且也不能都是一樣的，（嗜好與欲求之不同，正是人類進步的主要保證。）所以便

常有，而且應該常有許多的男女，他們的慾望是趨於特殊的方面，和平常人的慾望是不同的。

並不是任何人都需要一個望遠鏡的，因為縱然學問是如何普及，仍有許多人喜歡用顯微鏡來檢查物體，而不願研究天的星塵。有些人喜歡彫刻，有的人喜歡繪畫。有的人什麼都不想，只想要一架上等的鋼琴，而別的人又只喜歡手風琴。趣味雖各異，可是人人都有藝術的欲求。在現今可憐的資本制度的社會中，一個人若不是大財產的承繼者，或者不會千辛萬苦地求得那能使他從事安樂的職業的「智慧的資本」，則他縱有藝術的欲求也不能滿足的。他們仍懷着他日可以多少滿足其嗜好的希望，因此他便輕視理想家的共產社會，這是以各個人的物質生活為其唯一目的的。他說：「在你們的公共倉庫中，你們有很充足的麵包，可以供給萬人取用，然而却沒有美麗的圖畫，光學上的器械，美麗的家具和美術的寶玉細工等等；——總之，凡是與人類的各種趣味嗜好相應的東西，你們都沒有。公社所能供給與各人的只有麵包和牛乳，此外獲得其他物品的

可能性都被你們壓抑住了，所有的婦女也不得不穿褐色的麻布衣服。」

這種反對論是各種共產制度應該攻究的，而且又是那些在美洲荒野的地方建立新社會的人所不了解的（註）。他們以為只要社會能夠得着充足的衣服，供各分子使用，並且有一間音樂室，「同胞們」可以常常在裏面胡亂彈奏數曲樂調，或演一幕戲劇，便夠了。他們忘記了藝術心是人人都有的，不管是農夫也好，紳士也好，他們一樣的都有藝術心，不過因其修養不同，故藝術心之表現也不同，而在大體上還是相同的。社會只供給普通生活的必需品與各分子，而且還壓制有發展個性的趨向的教育，除聖經以外的書都不許讀。——這些都是無用的。個人的嗜好紛出，一般人的不平時起，或者因為有人提議要買鋼琴或科學的器械時引起的爭吵，進步的諸要素遂歸於衰滅。這個社會僅能在破壞一切個性的感情，一切藝術的傾向以及一切的發達之狀態下存在着。

（註）這是指奧文（Owen）及其信徒。奧文曾在美國的印第安那州建設「新和諧的平等村」後又在

墨西哥從事於建設同樣的共產公社，但都歸於失敗——譯者註。

難道無政府的公社也要照着這同樣的方針進行麼？——不決不是這樣。假若彼知道要生產物質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必同時努力滿足人類心靈之一切表現，彼絕對不會照着這樣的方針進行的。

(11)

我們明白地承認：當我們想及我們四周的貧困苦痛的無底深淵時，當我們聽見那些求工作而徜徉街頭的勞動者的哀告時，我們實在不忍來討論下面的問題：在各分子的衣食住得到了相當滿足的社會中，人們要怎樣來使那些想要塞涅爾(Sénès)（法國地方）的磁器或天鵝絨衣服的个人滿足呢？

我們對此問題的答覆是：「我們最先確要得着麵包，然後才說到磁器和天鵝絨上面。」

然而我們不可不承認人類於食物之外尚有其他的需求，而且無政府的力量在於彼能了解一切人類的才能，一切感情，什麼也不會忽略過去，因此我們要簡單地說明一

個人怎樣才可以使他所有的智慧與藝術的欲求得到滿足。

我們已經說過，一個人每日勞動四五小時，一直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他便能很容易的生產出保證社會的安樂的一切必需品了。

然而那些慣於勤勞的人也不必限於每日勞動五小時；他可以每日作十小時的工，一年勞動三百天，終生繼續勞動下去也無妨。自然若是一個人永遠羈於機械，他的健康不久就會損壞的，他的才智也要變成愚鈍；可是當一個人可以隨時變更職業，特別時常使手工作與腦工作互相替換的時候，那麼，雖每天勞動十小時或十二時，也不會感着疲倦，反而覺得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每天作了四五小時的工以後，已足維持他的生活了；還有五六小時，他可以利用來滿足自己的趣味嗜好。假若他與別人合作，這五六小時的時間，除了產出一切的人的必需品而外，還能夠充分地產出他所希望的一切物品。

他要先在田野，工廠以及其他地方勞動，這是他對於社會上一切的生產所應盡的義務。其次則用他的其餘的時間來滿足他的藝術的和科學的欲求和嗜好。

爲着要滿足各種趣味，各種嗜好，便有無數的團體勃興起來。

例如有些人想用他們的餘暇來研究文學。於是他們組織起團體，包含着著作家，排字人，印刷人，彫刻家，畫家，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即是他們所愛好的思想之廣布。

在今日著作家知道有一種叫做「職工」的牛馬，只要每天給幾個先令與他們，他們便會印刷他的書；然而印刷所的內容如何，他便不得而知了。假若排字的工人染鉛毒而受苦，管理機械的徒弟得着貧血病而死，難道還愁沒有貧窮的奴隸來代替他們嗎？

然而在那些爲着微少的工錢而甘心出賣他們的勞動的饑餓者沒有了的時候，而且現在被掠奪的職工都受了教育，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印出，使別人知道的時候，則著作家和學者們爲着要把他們的散文和詩歌公布於世界，便不得不和印刷工人聯合了。

只要人們把單純的手工作視爲下等的事的時候，他們看見著作家自己排字來印刷他的著作，便會覺得這是異常奇怪的，難道他沒有體育場或其他的遊戲來振刷他的精神嗎？然而當人們不以手工作爲恥辱，而且所有的人都不能不作手工作的時候，再沒

有人來替那些著作家勞動了，於是他們以及愛讀他們的著作的人都要來學習處理排字架和鉛字的技術了；這時候，大家——著作家和一切愛好那些在印刷中的著作的讀者們——合作來拾起鉛字排成一頁一頁的，又上了版，運轉機械，最後印成了一種極精美的書——這種快樂，他們已經知道了。這些精美的機械，在現在那些從早到晚管理着彼等的徒弟們看來，固然是虐待的器具，而在那些要利用彼等來發表自己或自己平日所愛好的著作家的思想的人們看來，却實在是娛樂的源泉了。

難道文學會因此受損害麼？難道詩人在戶外勞動或幫助來印刷他的著作過後，他的詩人的價值便低賤了麼？難道小說家在林野或工廠中或道路工作鐵道工作等等和他人共同勞動之後，便失去了對於人類天性的智識麼？對於這個問題，難道還有兩種回答嗎？

也許書籍的篇幅要少，然而所說的事一定會多。也許有一二冊無味的書出版，然而却是很不常見的事了，大概印刷出來的書都是值得精讀，值得吟味的。因為讀者皆受了

良好的教育，更富於判斷力，書籍的價值讀者自己會判定，無味的書也不會出版了。

並且印刷術自加頓堡（Gutenberg）以來，沒有什麼進步，現在還是在幼稚的時期。現在用十分鐘寫出來的東西，要費二小時的時期才能用鉛字排好，不過現在正講求傳播思想更便利的方法，而且不久便會發現了。（註）

（註）自這篇文字發表以後，現在此種方法已發覺了。——英文本註。

著作家對於他的著作的印刷居然毫無關係，這實在是異常可笑的事！否則，印刷術會早有了很大的進步了，我們也不會再使用十七世紀式的鉛字了。

難道我們是在做夢麼？——自然在那些曾經放蕩和熟思過的人們看來，這並不是夢。便是在現在，生活已驅使我們向着這方面進行了。

（註）這一節，英文本和日文本都沒有。——譯者。

(三)

在某一個社會中，人人皆為生產者，人人皆受着講究科學與藝術的教育，而且有開

暇來做這樣的事，那時人們爲着要印刷他們所選擇好了的著作而聯合起來，各自貢獻他對於手工作應盡的部分責任——這果然是夢想嗎？現在我們已經有無數的藝術文學及其他學術團體；這些團體都是許多對於某部門的學問感着興趣的人們，爲着刊布他們的著作的目的而聯合起來，自動地組織成功的。在這些團體的會報上發表文章的著作者並得不着報酬，會報大概都是非賣品，無費的送與世界各地的研究同樣部門的學術的團體。此團體的甲會員可以把他的觀察概括地寫成一頁發表於雜誌；乙會員也可以把他窮年累月研究的結果著成長篇論著刊布出來；而其他的會員又將以此雜誌所刊載的東西爲起點，而從事於更進一步的研究。總之，這些著作家和讀者都是爲着要出版他們所感着興趣的著作的緣故，而聯合起來的。

實際，學術團體和個人的著作家一樣，也要到現在工人在那裏勞働的印刷所裏去從事印刷。現在學術團體的會員們都輕視手工作。誠然，現在手工作的進行狀態是異常惡劣的；然而在將來的社會裏，各分子都受着了廣大的哲學與科學的教育，自然會知道

改善手工作的方法，使之成爲人類所誇耀的事業。那時的學術團體會成爲科學的愛好者，探險者和職工等的聯合，大家都知道一種手工作的技術，大家都有科學的興趣。

例如，這團體是研究地質學的，各會員都應盡力於地層的探險，都要作實驗觀察，在今日的觀察者不過一百人，到那時便有一萬人了。因此他們一年間所作的事，還要多於現在我們在二十年中所能作出的。當他們的著作要刊行的時候，便有熟習各種技術的一萬多人來盡力幫忙，或繪圖，或彫刻，或排字，或印刷。他們很快樂地來利用他們的閒暇——在夏天去探險，在冬天去作屋內工作。而且當此等書籍出版的時候，對於這共同事業感着興趣的讀者也不僅有一百人，大概有一萬人之多。

進步是向着這方面進行的。便是在今日若是英國需要一種完全的英語字典，也不必等待着以畢生精力從事於這種工作的利德勒 (Liddell) (註) 降生了，此種工作應該靠着志願的人們。還有一千餘人自然地而且無須報酬地來爲此盡力，或則涉獵圖書，或則記錄註釋，在數年之內能完成一個人畢生所不能完成的事業。在其他一切人類

智慧的各部門中，也同樣的湧現出此種精神，若我們看見了這樣實驗的合作漸漸代替個人事業，還不能預料將來如何，那麼，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於人類的智識，是異常缺乏的。

(註)利維勒 (一八零一—一八八二) 法國哲學家。他的大著「法文字典」是費了許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譯者。

若這字典果然是真正的共同事業，那麼，許多志願的著作家，印刷者，校對者，都應該來共同勞動；然而社會主義的報紙已經實行了這方針的一部分，把手工作與精神的工作聯合的例子指示於我們看了。現今社會主義的著作家有時也親手排印他自己的論文。實在，這樣的事是不常見的，然而因此也可看出進化是向着何種方向進行的。

(註)中國無政府主義刊物「民聲」，他是師復，佩爾諸人自己排字，校對，印刷的。——譯者。

這把到自由之路指示於我們了。在將來，一個人若要發有益的言論——超於他所處的時代的言論，他不必去找可以供給必要的資本的出版家了。他只知道印刷術並且贊成他的新著作中的理想的人來與他合作，他們就可共同來出版新著作或雜誌。

文學與新聞事業不再是賺錢的利器和掠奪他人的工具了。難道真正能了解文學和新聞事業的人會不熱烈地希望文學終於會從以前的保護者和現在的掠奪者手中逃出來嗎？不希望文學從那愛好庸俗以及投合大多數的惡趣味的世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嗎？

當文章與科學脫離了金錢的束縛，專爲着那些愛好彼等的人而且由這些人來培植的時候，彼等才能在人類發達的事業中占一個適當的位置。

(四)

文學、科學、藝術，不可不由自由人來培植的。只有在此種條件之下，彼等才能從阻礙彼等的國家、資本以及資產階級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現在的科學家要以什麼方法來從事於自己所感着興趣的研究呢？懇求國家的幫助嗎？國家只能於一百個候補者中助幫一個，而且祇要那個明白承認不致逸出前人的軌外的人，才能夠得這種幫助。我們不要忘記法國學士會會怎樣非難過達爾文，報得優

學士會會怎樣侮慢門得列夫 (Mendeleef)，倫敦皇家協會會把助勞 (Joules) 決定「熱之動力等價」的著作認為「非科學的」而不肯公布的事實。(註)

(註)英國化學家普來非爾 (Playfair 1818-1898) 於助勞死後，曾言及此事，因此我們才知道——

原註。

門得列夫俄國化學家 (一八三四—一九零七)；助勞英國物理學家 (一八一八—一八八九)；熱之動力等價之發明為近世科學之一大勝利。可參看「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卷末的人名小傳及術語註解。——譯者。

因此，從來一切的大研究，一切使科學革命的大發見，都是在學士會和大學校之外完成的，這樣的成功都是靠着像達爾文、利愛爾 (Lyell) 那樣有充分的家產可以獨立研究的人，或者那些在貧困中勞苦工作致損壞其健康，且久苦於沒有實驗室，不能得着必要的書籍和器具以繼續其研究，而仍不屈不撓地保持其希望的人們的力量。有的甚至目的未達到的時候就死了。他們的姓名竟不遑枚舉。

概括地說，國家補助制度的弊害，使科學不得不努力想從彼解放出來。因此在歐美便有許多志願者組織的學術團體成立起來了——其中有幾個尤其發達，彼等有的貴重品，甚至那些得着國家補助的團體的一切財富和大富豪的一切資財都買不到的一切政府的學術機關的富足總不及倫敦動物學會，而這個團體却是靠隨意捐助來維持的。

這個動物學會的動物園裏所養的無數動物都不是買來的，而是其他的團體和全世界的採集者的寄贈品。有時孟買動物學會送一隻象來，有時埃及的博物學家送一匹河馬或犀牛來。每天都從世界各地送來這些偉大的贈品——禽鳥，爬蟲，昆蟲等等。其中常有賺用全世界的黃金也買不到的動物。例如，某一個旅行家冒着生命的危險，獲得一個動物，便像愛兒子一般地愛他；他也會把彼送到動物協會來，因為他知道動物協會會小心看護這個動物的。這動物園也是要收門票的，每日無數的參觀人所付的門票費已足以維持這個大的機關了。

倫敦動物學協會以及其他同類的團體的缺點，在於會員不能繳納會費時，不得以勞働來代替；而且不以這個大機關的管理人和許多的雇員為協會的會員，但以那些除了想在名片上寫着 F. N. S. (Fellow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動物學協會會員之略寫) 外，並無其他目的的人們為會員。總之，所需要的是更完滿的合作。

我們所說關於科學家的事實也能適於發明家。誰不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大發明都是用多大的辛苦買來的；常常夜裏不能睡眠，一家人沒有麵包吃又缺乏實驗的材料和器具——這便是幾乎所有那些使工業發達的發明家的歷史，他們的發明真是現代文明的籠子。

然而我們應當怎樣把這衆人所認為不良的情形改善呢？已經試用過專利權了，其結果是我們所知道的。發明家得了幾鎊的金錢，便把專利權賣了，而此種發明所生出的莫大利益却歸於那些借給資本的人們的懷中。而且專利權還要使發明家陷於孤立的地位，使他隱秘他的研究，常因此得到失敗的結果；但實際從那不深恩的頭腦中想出來

的極單純的暗示往往足以成就發明，使之成爲實際的。專利權和一切國家的支配一樣，的阻礙着工業的進步。原來思想是不能夠專利的東西，利權在理論上是一件大不公道的事。在實際上成了對於發明的急速發達的大障礙。

增進發明精神所必需的：第一便是思想之覺醒，想像之大胆，這是現代的全部教育所正在摧殘的；第二是科學教育的普及，因而研究者的數目增加了百倍；第三是對於人類繼續不斷地進步之信仰，因爲從來鼓舞着一切大發明家的便是熱誠，也就是作著的希望。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夠生出這種思想之激動，這種大胆，這種智識，這種爲萬人而勞動的信念。

這時候，我們將有具備各種原動力和器具的大機關，還有爲所有的研究者開放的廣大工業試驗場。當人們盡了對於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以後，便可到這裏來工作以求他的夢想實現；在這裏他們可以費五六小時的閒暇作他們的實驗，在這裏還可遇着熟習某部門的工業的人們來此研究艱難的問題，因此他們可以互相幫助，交換知識，——各

人的思想與經驗之接合，便會發現出來久未能解決的方法。而且這決不是夢想。彼保堡的散勞諾高羅道克 (Solano Gorodok) 關於工藝的一方面已經實行了一部分。這是一個器械具備而且爲萬人開放的工場；器具與原動力都是無費供給的；僅有金屬和木材才要代價。不幸勞働者沒有空暇的時間，在工廠裏勞働了十小時，弄得精力疲倦後，只能於夜間跑到那裏去。而且他們互相隱祕着他們的發明，因爲他們被專利權和資本制度所束縛着了。這兩種東西實在是現社會的大患，也是道德與智識的進步路上的陷阱。

(五)

關於藝術又怎樣呢？到處我們都聽見在嘆息藝術衰落之聲。實際我們遠不如文藝復興期的諸大家。藝術的學問近時已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有無數賦有多少天才的人在分類研究，然而藝術却似乎離開文明了。學問漸漸進步，但靈感却不常來到藝術家的畫室了。

這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僅有偉大的觀念才能夠鼓舞着藝術。依我們的理想，藝術直與創造同義，不可不着眼於前人未發之處；然而職業的藝術家很少有能脫離卑俗之境域，而看破新地平線的。

此種靈感決不是能夠從書籍中得來的；這只能由人生得來，然而現社會却不能鼓舞起這種靈感。

拉斐耳 (Raphael) 和萊利諾 (Murillo) 在那新理想的研究還能夠適應於宗教的舊傳說的時代中作出他的名畫。他們作畫來裝飾大寺院，這些寺院自身便足以代表這都市世世代代之敬虔的事業。那帶有神祕景象與莊嚴偉大的殿堂直與都市的生活相結合，而且能鼓舞起畫家的靈感。那麼，他是在為人民的紀念物而勞働，向着他的同胞發言，因此他自己也得着了靈感；他向着民衆發言猶如寺院的正殿，圓柱，染色的窗，彫像以及彫刻的門等自身向民衆發言一樣。今日的藝術家所能希望到的最大榮譽不過是把他的畫布張於鍍金的木架子上掛在博物館，一種骨董店裏，在那裏猶在布拉

多 (Prado) 一樣，我們可看見萊利諾的「昇天」(Ascension) (畫名) 懸於威拉斯開士 (Velazquez) 的「乞丐」和斐利蒲 (J. Philip) 的「狗」等畫的旁邊。可憐的威拱斯開士，可憐的萊利諾！可憐那些曾在都市的城樓上活現的希臘形像，現今皆屏息於盧佛爾 (Louvre) 美術館的赤色墜簾之下了。

(註) 拉斐耳 (一四八三——一五二〇) 意大利畫家，文藝復興時期三大人物之一。萊利諾 (一四一七

一六八二) 西班牙畫家，他善畫宗教畫及街市景象。乞兒和賣花女。威拉斯開士 (一五九九—

一六六〇) 西班牙畫家。斐利蒲 (一八一七——一八六七) 蘇格蘭畫家。他的作品現尚在愛丁堡

及倫敦兩處的国家美術館——譯者。

當希臘的雕刻家雕刻大理石的時候，他實際在努力表現其都市的精神與心情。彼的一切感情，一切光榮的傳說都再活現於他的作品之中。然而在今日團結的都市已不存在，早已沒有思想的交通了。都會是人民的偶然聚合，這些人彼此不相知，即無其同利害，唯有損害他人以利自己而已。所謂祖國也不存在……難道國際的銀行家和拾破布

的乞丐會有一個共同的祖國麼？只有當都市、州郡、國民或國民的聯合重新開始過和陸的生活的時候，藝術始能從這都市或聯合所共有的理想中得着靈感。這時候建築家也不再以為都市的紀念物是什麼寺院、監獄或炮台了；畫家、鑄像家、雕刻師、裝飾師等也知道應該把他們的畫布、雕像、裝飾放在什麼地方了；他們從同一活潑的泉源得到了創作力，欣欣然共同向着將來前進。

然而到了那時，藝術僅能說是存在而已。近代藝術家的最好的繪畫大抵在描寫自然，村落、溪谷、危險的大海及莊嚴的高山。但若一個畫家從來不會享受過田野勞動的樂趣，只憑思索，只憑想像，他如何能夠描寫出這種詩趣呢？假若他不知道田野，不過像時鳥之知道田舍那樣，僅在遷移的時候從上飛過罷了；假若他在青春之晨，血氣方剛的時期，早晨並不去耕種田地，也不去伴隨勤苦的刈草人用鐮刀割草，和那些歌聲響於空際的少女們競爭，他怎麼能夠描畫出田野勞動的詩趣呢？愛土地和愛生在土地上面的東西的心，就不能從畫筆的揮酒中得來——畫筆唯供其使役而已；然而要是不愛彼又怎能

把彼描畫出來呢？因此便是現在最好的畫家在這方面的作品也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對於人生也不忠實，幾乎常是感情的。其中毫無力量。

當你們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你便會看見美麗的夕陽的。你若要看那壯麗的光景，便不得不作農夫中的一個。你若要了解打魚的詩趣，便不能不日夜與漁人共同勞動於海上，自己也要打魚，與波濤相鬥，冒着暴風雨做了這些困難的工作後，把網扯起，若是很重的，裏面裝滿了魚，便感覺得快樂了；若網裏面是空的，便感覺得失望了；總之，要經驗過這些事情，才能夠了解打魚的詩趣。你若要了解人的力量，並且把這力量表現於藝術的作品上面，你便不得不長久在工場裏勞動，知道創造工作的勞苦和快樂，以熔鐵爐的烈焰來鑄造金屬，感覺到機械裏面的生命。實在你若想寫出人民的感情，你自身便應該透澈此種感情。

而且將來的藝術家要與人民過同樣的生活，像過去的偉大藝術家那樣，他們便用不着販賣他們的作品了。這些作品是他們的生活全體不可缺的一部分；生活沒有彼等

不能完全，彼等沒有生活也不能完全。人們要見這畫家的作品，便可向他所在的都市裏去，而且這樣創作的活潑與清新之美在人們的心意中，才會生出有益的效果。

藝術爲其發達，必以無數的等差程度與工業結合着，洛斯克（Loersch）與社會主義大詩人摩理思（Morris）曾屢次證明藝術不可不與工業混和，他們的證明是很好的。凡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東西，或在街上，或在公共紀念物的內外，都應該具有純粹美術的形狀。

然而此種情形只能在萬人都享着安穩與閒暇的社會中實現。在這時候我們會看見許多藝術團體，其中的各會員都有發揮他的能力的餘地；因爲藝術沒有無數純粹的附屬工作，是不行的。這些藝術團體還要預備裝飾其會員的住宅，猶如那些懇切的志願者，愛丁堡的青年畫家，去裝飾這城裏的貧民醫院的牆壁和天花板一樣。

又某個畫家或雕刻家表現其自身的感情於作品之上，給與他所愛的女子或親友等。因爲愛，或被愛所鼓動而作的作品，難道果然劣於單以貴價來滿足俗人的虛榮心的

今日藝術嗎？

關於生活必需以外的一切娛樂，也都要依着這同樣方針進行。例如想要光鋼琴的人，就可以加入樂器製造家的團體。只要供獻了半日的閒暇，便可得着他所夢想的鋼琴。假若他非常愛研究天文學，他便可以加入天文學家的團體，同着這團體的哲學家、觀察者、數理家，製作天文學器械的技師、學者，以及愛好的人共同工作；他若作了這團體的工作的一部分，便可以得到他所渴望的望遠鏡，因為要建築一個觀象台最需要的工作是粗重的工作如磚瓦匠、木匠、建築師和器械工的工作——最後至於前後的磨光使器具成爲精確，當然除了技師而外，別人都不能做的了。

總之，一個人爲着生產必需品費了幾小時的時間後，每天還有五小時乃至七小時是他自己隨意作事的時間，奢侈慾望的種類雖不同，但這已經能夠十分滿足他的奢侈的慾望了。還有無數的團體着手來供給這些慾望。今日極少數人的特權，將來衆人都可以得到了。所謂奢侈不再是資產階級的愚劣而且虛誇的表現，却成了一種美術的娛樂。

所有的人都是更幸福的了。各人爲着要達到他的目的——想得一本書，一件美術品或一件奢侈品欣欣然來共同工作，便爲得着一種刺激和必要的修養，使生活成爲愉快的。

我們爲着廢除主人與奴隸的差別而勞動，實是爲着兩者的幸福，爲着全人類的幸福而勞動。

第十章 愉快的勞動

當社會主義者宣言說在脫離了資本家控制的社會中，勞動一定會是愉快的；從此不會再有什麼可厭的不衛生的賤役了，但是一般人總是非難這種說法。就是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看出向着這方針的顯著的進步；凡是有了這種進步的地方，雇主們都因此能夠節省其精力。

實際要使一個工廠變成像科學實驗室那樣，又衛生又悅意的地方，也是顯然可能的。並且做到了這樣，也是有益的。在廣大而空氣流通的工廠裏，工作的結果是更要好些；而且很容易漸漸加以改良，每次改良的結果，都使手指的勞力及時間得以節省。至於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工廠，大半都是污穢而不合衛生的，這是因爲一則勞動者不能參預工廠的組織，二則現在工業組織的特色正是在無意識的浪費人類精力。

然而我們現在已經常常看見設備得很好的工廠了，這些工廠的設備實在很好，假

若每日的工作時間不過四五小時而且各人能從其嗜好選擇各種工作，那麼這工廠裏的勞備，實在是極愉快的了。

據我所知道的有幾個大工廠不幸成了專門製造戰爭用具的地方。但考慮這工廠的衛生及智能的組織而論，實在完全的。地面共佔五十英畝，其中的十五英畝是有玻璃屋頂的。路是用耐火磚鋪的，有礦山師別墅的石路那樣的清潔；玻璃屋頂也是異常清潔的；有一羣每天專門擦玻璃的工人。在這些工廠裏，可以鑄造出二十噸重一塊的鋼鐵；大熔鐵爐的烈火焰有一千度以上的熱度，然而假若你站在離這熔鐵爐有三十英尺遠的地方，你就會毫不覺得熱；若不時常看見這爐子張開大口吐出怪物一般的鋼鐵渣滓來，你甚至不會覺得你是站在熔鐵爐的旁邊了。而這些鋼鐵僅有三四個職工來處理，他們走來走去，開龍頭用通水管的水之壓力來轉動絕大的起重機。

你走進這些工廠，以為可以聽着那震得大耳聾的打印機的響聲了，然而進去一看裏面並沒有打印機。百噸的大炮和大西洋航路的輪船的汽筒，都是用水力的壓搾而鑄

造成的，工人只在旁邊扭龍頭使鋼鐵塊合於模型，造出各種形狀，用這個方法不拘如何厚薄鐵塊，一點縫隙也沒有，竟能成純一性質的東西。

我又以為會聽着軋軋的響聲，然而我看見機械切三十英尺長的鋼鐵，却像在切乾牛酪一樣，沒有什麼響聲。我不禁向着引導參觀的技師表示我的讚歎，他答道：

「這不過是經濟問題而已。這倒平鋼鐵的機械已經用了四十二年。若配合的方法不好，缺乏附着力，則每次動於板面而生阻礙，發出軋軋的響聲，這樣一定用不到十年！

「爐氣爐呢？若不利用熱而任其發散，這實在是浪費。當因放射而失去的熱有幾噸煤炭的熱量的時候，豈不是要蒸殺職工麼？

「可以使附近五海里的房屋震動的打印機，也是空費的。用壓榨來鑄造，比用錘打好些，而且費用少——實在損失也少。

「在這些工廠裏面要得着光明，清潔，且使坐的地方有廣闊的地位——這都不過是經濟問題。假若你預先能夠知道怎樣做去，而且有自由活動的餘地，工作一定會更要

好些。」

他又說：「實際我們在來此以前，是非常困難的。在大都會附近地方的土地非常昂貴——因為地主任意把持！」

就是礦坑的情形也是這樣。我們從左拉（Zola）的描寫和報紙的報告，便知道今日礦坑的情形是怎樣的。將來的礦坑，空氣之流通，溫度之適宜，完全像圖書館那樣的安排；在那裏面，馬也不再會死在地下了；至於坑內的搬運，都靠着放在坑口的自動的電纜（Automatic Cable）通風器常動，所以沒有煤氣爆裂之虞。這並不是夢想。這樣的礦坑在英國已經可以看得見了；我已經下去看過。這種精美的組織又只是經濟問題。我所說的這個礦坑，雖是非常的深（四百六十六碼），但僅以二百個礦工，每天竟能產出千噸的煤炭——即每一個礦工每天產出五噸，而同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間）在英國的其他二千餘礦坑，平均一人一年所產出的不上三百噸。

假若必要，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來證明關於物質的組織，福立葉的夢想決

不是「烏托邦」。

然而這個問題已經常常在社會主義的報紙雜誌上討論過，因此輿論大概早已受了這樣的教訓。工廠，鑛造場，鑛坑都能夠弄成像近世大學的實驗室那樣衛生而且美麗的，組織愈良善，人的勞働的生產亦愈多。

果然，將來在平等的社會裏，勞働者不再出賣他們的勞力去在任何條件之下作苦工了，我們還能疑惑在那時候勞働不是一種快樂和安慰麼？可厭的工作也會消滅了，因為這種不衛生的狀態是有害於社會全體的。只有奴隸能屈服於這種舊環境，然而自由人是要創造新環境的，他們的勞働將要成了愉快的了，生產也是無限的加多。今日的例子外到明日就會成了通例了。

家庭的工作現在完全是放在那些今日負擔着人類中的賤役的婦人們的身上，但在將來也要和前面所說各種事物的情形一樣的。

依革命而改造的社會還要消滅家庭的奴隸制——這是奴隸制的最後形式，因其由來最古，所以也許是最穩固的。然而這是不能由共同居住論者夢想的方法或強權共產主義者屢次想像的方針而實現的。

「共同居住」對於多數的人類是可厭的。思慮極深的人物爲其共同事業的目的，自然會感覺得有和他的夥伴會合的必要；他愈感覺得他自身是絕大全體的一部分，他對於共同事業，他愈感覺得有興味。然而說到爲着休息及互相親近的團體上面，則不如是。「共同居住」和「一族同居」却想不到這一點，有的或以人爲的集合來努力滿足此項欲求。

「共同居住」在事實上不過是一所大旅館，可以使某一些人快樂的，甚至一切的人在他們的生涯的某一時期中，也會引以爲快樂的，然而大多數的民衆却喜歡家庭生活（自然是將來的家庭生活）。他們喜歡單獨的房間；諾爾曼人和安格羅撒克遜人甚至還想要六個乃至八個房間的住宅，以便一家族或一羣友人可以在裏面分別居住。有

時「共廬住居」是必要的，但若成了一般的規則，就可厭了。在費了時間於交際之後，想邁着獨居的生活，這是人類天性中的當然的慾望。因此在監獄中的最大苦痛之一，便是不能獨居恰與永久受着羈縛禁錮不能過社會生活的情形一樣。

至於那些贊成共同居住的經濟上的思想，完全是雜質的經濟思想。最重要而且最合於道理的經濟便是使人人得着人生的樂趣，因為人們得到了滿足生活後，其生產的物品之多，是那些終日詛咒環境的人所遠不能及的。(註)

(註)青年意大利亞 (Young Italy) 共產社會的人們已知道在工作之外的日常關係之中自由選

擇的重要。原來宗教的共產主義者皆以共同會食為其理想；從前的基督教徒以共同會食為歸供基

督教的表示。聖餐禮即其遺跡。然而青年意大利亞的人們却已廢棄了此種宗教的習俗；他們雖在公

共會食會食，但裏面祇有分別的小桌子，任他們挑選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坐。聖那嗎 (Pizzeria)

共產社會的人們各有自己的家庭，從公共會食裏取了食物，拿到自己家裏去吃。——原註。

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也排斥共同居住。然而當你去問他們家事應如何組織，他們會

答道：「各人能做『他自己的工作』。我的妻子整理家屋；資產階級的太太們也應該做這一樣的事務。」假若說這樣話的人是一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他便要帶笑對他的妻子說：「我愛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不是沒有奴婢嗎？你也要像同志保羅君或約翰君的妻子一樣的勞動呢？」

人們常常叫婦女——奴婢或妻子——來治理家事。

然而婦女到底也要來要求得到人類解放的權利。她不再願意做家庭的牛馬了。她犧牲了生涯中的許多年來養育兒童，她以為這已經夠了。她不再願意做廚役，修補人，房屋的洒掃人了！因為美國的婦女要貫徹他們的要求，其結果美國內屈身於家政的婦女便漸漸凋零了，因此便發生了一般人的歎息。現在的太太們都喜歡藝術，政治，文學或賭博等；作女工的極少，至於願意做奴婢的人，在美國更不常見了。結果，解決的方法是異常簡單的，而且是生活自身所指出來的。家事的四分之三都是靠著機器來做。

你擦你的靴子，你知道這種工作是怎樣的笨。然而一雙靴子要用毛刷刷二三十次，

豈不是更笨嗎？歐洲人口的十分之一都不得不賣他們的身子來換得污穢狹小的住處和不充足的飲食，婦女們也不得不甘於奴隸的境遇與她的多數同性每早晨去作這樣的工作。

然而理髮匠已經應用機器來梳理頭髮了，不管是軟髮硬髮都可以弄得很快的。我們何不可以把這原理同樣應用到脚上面嗎？現在已經這樣做了，在現在歐美的大旅館內，都普遍的使用擦靴機了。而且漸漸的流傳到旅館以外。在英國大的學校內，學生寄宿在教師家裏，因為每天早晨要用機器擦一千雙靴子，便特設了一處擦靴所，很覺便利；這可以免除那些特別雇來做這種愚笨工作的一百個奴僕了。這擦靴所每天晚間把靴子拿去，用機器擦得很潔淨，第二天早晨送回原處。

至於洗東西呢？沒有一個地方的婦女不怕做這種既費時間而又污穢的工作的。這種工作大概是用手來做，僅僅因為這是家庭奴隸的工作，無足掛齒。

在美國現在要較好一點。美國有很多的城市，已經用水管送熱水到各家戶，恰如在

歐洲送冷水的一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這個問題便是極簡單的了，而且已為一個婦人——柯克蘭夫人（Mrs. Cochrane）——解決了。她的機器費不到三分鐘的時間，便可以把十二打的盤子，碟子洗淨拭乾了。在伊立諾瓦（Illinois）州的某工廠製造出這樣的機器，以平均中等人家能夠購買的價格賣出。又小家庭內為什麼不備送靴子到擦靴所那樣，把器置也送到洗的地方去洗呢？其實甚至於這兩種職務——擦靴子與洗器置——都可以由同一個團體承辦。

搓洗麻布會使手脫皮；掃地板，刷絨氈會使塵埃像雲一般的飛起，而且這樣塵埃也不容易消除的——這些有害健康的工作至今還是由人來做，因為婦女們現在還被視為奴隸；然而因為這也可以用機器來做，而且做得更好，婦女們已漸漸地不做這種工作了。將來所有的機器都要備置在家內，若再把原動力送到各家庭，人民不必勞其筋骨就可以使用機器做各種工作了。

製造這樣機器的費用也是很小的。現在之所以要賣很高的價格，是因為這些機器

不能得着一般人的使用，尤其因為紳士們對於各機器要課額外的稅，他們想過奢侈的生活，而且在土地，原料，製造，販賣，專利，課稅等等上面做投機事業。

然而要從家庭的勞役解放出來，這不是僅僅靠着小的機器所能成功的。所謂家庭是發現於現在的孤立狀態之中的；各家庭要互相聯合起來共同去做他們從前所單獨做的事。

實際，在將來像擦靴的機器，洗器具的機器，洗麻布的機器等等，不必各家都設備一個。反之，將來會有一個共同火爐送熱到全區域的各家屋裏，免得來點火。在美國現在有幾個都市已經這樣做了。從一個中央火爐供給熱水與各家，各屋，這是用水管流通的；若要加强溫度，只要把龍頭扭一下，就可以得着適宜的溫度了。又在特別屋之內想燃火，只要把爲着溫暖的目的從中央貯藏室供給來的煤氣點燃，就行了。所有播種機，維持火種的工作不知費了婦女們的若干時間，現在快消滅了。

蠟燭，洋燈，煤氣都是過去的了。在有些都市內，無論是溝渠處，你要光亮，只須把那個

鈕子一按，就行了，而且要得着豐富的電光，這只是經濟與智識的問題。在美國，人們已說及組織團體來進行廢除家政的工作。每街都必須設一個處理所。每天用一個大馬車到各家去收集要擦的靴子，要洗的器具，要洗的麻布，要修補的物件（假若這是值得修補的），要刷的絨氈，到第二日早晨都弄得很清潔的送回來。在一二小時以後，熱的咖啡和烹調得很好的雞蛋都會擺在你們的桌上了。從十二點鐘到兩點鐘之間，有二千萬以上的美國人還有和這個數目差不多的英國人在吃燒炙的牛羊肉，煮熟的豬肉，馬鈴薯以及各種新鮮的蔬菜等。在二三小時之間至少有八百萬家在燒火烘灸肉羹，烹調蔬菜；有八百萬的婦女犧牲她們的時間來預備一餐飲食，把所有各家庭做的菜蔬的樣數算起來，至多也不過十二種不同的樣式。

曾有一個美國婦人寫道：「在一個地方燒火便夠了的時候，現在却要在五十個地方燒火。」假若你喜歡，你可以在你自己家裏同着你的小孩用膳；然而你試想一想要做幾杯咖啡，一餐飲食，爲什麼要犧牲了五十個婦女一早晨的光陰呢？兩個人用一個地方

的火已經足以烹調些菜蔬和肉了，然而爲什麼還要用五十個地方的火呢？假若你有特別的嗜好，你自己可以隨意去燒炙牛羊肉，也可以隨意烹調各種新鮮菜蔬。然而只應該要一個廚房一處火，並且還要盡力把這廚房設備得異常精緻完備。

爲什麼婦女們的工作就不足掛齒呢？爲什麼各家庭要一個主婦和三四個奴僕爲着一餐飲食費去那許多的時間呢？這是因爲那些企圖解放人類的人並不會把婦女們包含在他們解放的夢想中，他們以爲想到「這種廚房裏的工作」便損失了高貴的男子的尊嚴，他們把這樣的工作放在那些做賤役的婦女們的肩上。

所謂婦女的解放不僅是把大學，法庭，議會的大門開了，請她們進去。因爲現在那些所謂「解放了的」婦女，常常把家庭的工作放在別的婦女的肩上。真正的婦女解放，是在使婦女們不再去做像現在那樣烹調飲食，洗滌衣服的殘酷的工作；把家庭整理得很好，使她有時間來養育小孩，並且參加社交生活。

這樣的時代快要來了。如前面所說，萬事都是進行不已的。只是我們應該完全了解：

一個革命縱然醉心於自由，平等，休戚相關的美名，倘仍維持着家庭的奴隸制，要不得革命的。假若一半的人類仍在做火爐旁邊的奴隸，他們仍然會起來反抗那一半的人類的。

第十一章 自由合意

(一)

我們因爲久習慣於遺傳的偏見，不健全的教育和虛偽的訓練之中，所以除却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因此便有人會相信若是一旦沒有了警察，我們人類怕要像野獸一樣的互相吞食起來；倘若在革命的時間，把強權推翻了，世界便要陷於絕對的混亂狀態中。其實現在人類的許多團體，並不會受何種法律的干涉，自由的自己組織起來，還要比較那些在政府監視之下的團體得着更優越的結果：這樣的事，他們是視若無視的。

假若你翻開一張新聞紙，你會看出其中所記載的不外是政府的行動和政治的紛擾。若別一個世界中的人讀了，定會相信在歐洲除了交易所的事情外，沒有主人的命令，什麼事都不能夠做的。反之，關於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長發育的各種制度，無

不見有什麼記載。沒有——差不多完全沒有！即使有標題着「市井雜談」一欄，（法蘭的報紙常有 *Fats Divers* 一欄）也不過記載着與警察有關係的事而已。家庭的悲劇和反叛行為的劇幕，倘若裏面沒有警察，就決不會記載的。

三萬五千萬的歐洲人（甚相愛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着他們的收入而生活；然而他們的生活除了文學演劇遊技以外，若是政府不以何等方法來干涉，新聞紙是不會注意的。便是歷史也是與這相同的。若說到皇帝的生活和議會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極詳細的知道的；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不好的演說，如某個老議員所說的「便是對於任何一個議員的投票上也不會有影響的」演說，也得以保存至今。皇帝的訪問，政治家的脾氣好不好，他們的談諧和陰謀都被小心地記錄下來留與後人看。然而我們要知道中世紀的都市的狀況，要了解商業同盟各都市（*Hanseatic Cities*）間所結的大貿易機關，要曉得綠昂城怎樣建築彼的大教堂，這都是異常困難的。要是一個學者費盡他畢生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他的著作是不會被人知道的；然而議會的歷史——即是說，這是

不完全的東西，因為只論及社會生活的方面——却繼續出版，流傳甚廣，而且又被用作教材，在學校中教授。

（註）參看第十四章註。——譯者。

這樣，我們甚至不知道人們的隨意團體的每日勞働所逐漸完成的巨大的工作，這便是現世紀的重要工作。

我們因此提出幾個最顯著的現象，指示出來，人們，若非他們的利益絕對相反，必能親密的一致行動，成就含有極複雜性質的共同事業。

顯然的，在那基礎在私有財產上面——即是說，掠奪上面，又是偏狹愚劣的個人主義上面——的現社會中，這種事實，並不多見：這是自然之理。現社會中所謂合意常是不自由的，其目的雖非可詛咒的，然而却常是可卑鄙的。

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不是在舉出幾個可以盲目地模倣的例子，而且這是現社會所不能供給於我們的。我們所想做的事，便是要指示出來，不管強權的個人主義如何壓迫

我們，但在我們的生活（以全體而論）之中，仍有很廣大的一部分是僅依着自由合意而活動的；而且沒有政府時，還要比較平常所想的更要容易些。

爲着要證實我們的理論，我們已經舉出鐵道爲例，現在再回轉來說一遍。

我們知道在歐洲有十七萬五千里鐵道，在這個鐵道網中要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馬得利德（Madrid）西班牙都城）到彼得堡，從加來（Calais）到君士坦丁堡並不停止，也不換車，（若乘特別快車，）你就可以旅行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車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亞細亞也好，直可送到你下車的地方，這樣辦法，手續也很簡單，不過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紙片上寫明下車的地方就行了。

要得到這個結果，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要有像拿破崙或畢斯馬克那樣的英雄出來把歐洲征服了，從巴黎，柏林，或羅馬，畫出鐵道的圖，規定開車的時間。俄皇尼古拉斯第一便夢想着這樣的權力。當他見着莫斯科，彼得堡間的鐵道的草案時，他拿着圓規，在俄國地圖上這兩個都城之間，引了一條直線，一面說：「這就是我的計劃。」這條路線是

建造得一直的，穿過深的山谷，架起高的橋樑；然而過了數年，這個工作便被放棄了，每一英里的鐵路約值十二萬鎊乃至十五萬鎊。

這是一個方法，但是幸而人們還用了別的方法。鐵道一線一線的被建造起來，各線互相聯絡在一起，而這各線所屬的數百不同的公司，關於車到車開，以及從一線通過他線時，商品不必卸下，從各國來的車輛得運轉於全線……等等事情作成種種協定。

這些都只可以依自由合意，書信或提案的交換，或由會議而達到成功的。在這會議中各公司的代表聚會來討論某種特別的問題，他們爲着求得一個合意而來的，決不是要來製造法律。會議完畢，代表們各歸本公司，所帶回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約的草案，至於承認或拒絕，尙待公司來決定。

自然，這也有遇着困難的時候。因爲世界上還有異常固執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終能使所有的人一致。至於對待那些任性的人，也沒有用軍隊強迫的必要。

在各公司間連結成的這樣大的鐵道網，以及因此生出的偉大的交通運輸，實是十

九世紀的最顯著的事蹟，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結果。在八十年前，若有洞穿此事而預言的人，我們的祖父必定會以為這是狂人或瘋子。他們一定要說：「你不能够使百餘個公司的股東都來聽這個道理！這是烏托邦，這是神話。這樣的事只有由中央政府及「有鐵腕」的執政官才可以強制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此等組織中並沒有什麼歐洲鐵道的中央政府沒有沒有鐵道大臣，沒有獨裁官。甚至連大陸議會或管理委員都沒有萬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國家主義者常說：「便是僅僅爲着規定交通運輸的事，也不可不一個中央政府。」我們要問問他們道：「那麼，歐洲的鐵道並沒有政府，何以又會過得好好的呢？那幾百萬的旅客和堆積如山的貨物，又怎樣能夠通運全歐洲呢？假若各鐵道公司能夠互相合意，那麼，將來會占有鐵道的勞働者，又爲甚麼不能夠互相合意呢？假若彼得堡、華沙、線和巴黎、伯耳佛爾（Belort）線的鐵路公司能夠和諧地作事，不必去設一個無用的共同管理者；那麼，在我們社會之中，這由自由勞働者的團體所組織成的社會之中，爲甚

麼必定要一個政府呢？

(二)

以社會全體來說，現在的社會組織是極其不公正的；然而甚至在這個時候，只要人的天性不是正相反對的，縱沒有強權的干涉，他們也能夠協同作事；當我們想舉出實例來證明這個的時候，我們對於反對論也必須知道。

這些實例都有一些缺點，因為現在，實在找不出一個不是強者掠奪弱者，富者掠奪貧者的組織。因此那些統計學家要用他們得意的論法向我們說道：「要消滅這種掠奪，國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們却忘了歷史的教訓。他們把國家製造出無產階級交在掠奪者手中，用來扶助現在的組織這些事，一點都不說。要消滅掠奪而讓其第一原因——私有資本和貧乏；其三分之二都是由國家造出來的——繼續存在，這是否可能，他們也忘記告訴我們。當我們說及各鐵道公司間的協和一致的時候，我想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國家的人

會說：「你不看見現在的鐵路公司不是在壓制，虐待雇工和旅客嗎？那麼，爲着保護公眾利益起見，國家便不得不加以干涉！」

但是我們不是屢屢說過，只要有資本家存在，這種權力的濫用是不會有底止的嗎？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獨占權，正是那個自稱爲我們的恩人的國家所給與的。國家不是爲各公司設立了讓與和保證嗎？國家不是曾派兵來壓制同盟罷工的鐵路工人嗎？在最初的試驗中，（在俄國，最近我們還可看見這樣的事）國家爲着使彼所保證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曾擴張那些鐵道偉人的特權來禁止新聞紙揭載鐵道的災厄嗎？國家不是曾恩寵過范德百爾特，波利亞柯夫（Polyakov），P. L. M. 公司，聖哥沙得（St. Gotthard）等等的理事——「我們今日的王侯」把獨占權給與他們嗎？

因此，若我們舉一個例，即是舉各鐵道公司彼此間的默契合意，決不是經濟的經營之理想，也不是技術的組織之理想。這是證明縱是那些以損人利己爲目的的資本家，不必設立什麼萬國本局，也能夠成功的經營鐵道；然則，工人的社會不必組織什麼歐洲鐵

道的內閣便也可以同樣的做得很好，或者更要好一點。

這裏又有一種反對論來了，在最初看起來，好像更嚴重的。有人說，我們現在所說的合意並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對於小公司頒布法令罷了。例如某一個得着國家資助的富尼公司，強迫着那些從伯林到伯裏的旅客不走直線萊比錫鐵道經過，而取道哥樂尼（Cologne）和佛蘭克福特（Frankfort）。又某公司為得有力的股東的歡心起見，在運輸貨物的時候，走轉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線零落。在美國也是一樣，爲着要使許多的銀圓，入范德白爾特的私囊，常常使旅客和貨物糊裏糊塗走了許多迂曲的路程。

對於這個，我們的答覆仍是一樣：只要有資本家存在，大資本家就會壓抑小資本家。然而壓制不僅是資本的結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壓制小公司，也要靠着國家的幫助以及國家替他們造出的獨占權。

初期的英法社會主義者久已指出怎樣英國的立法盡全力來敗壞小工業，使農民

貧困，使無數的人不得不去替豪富的工業主勞動，並不問工錢之多寡。鐵道的法制恰與這相同。不管是軍事線或補助線，以及那些得了萬國郵政獨占權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着增加富家的利益一方面進行的。當全歐各國的債主羅斯柴爾特投資於鐵道的時候，他的忠僕——王俘大臣必盡力使他得着更多的款。

(註)「初期英法社會主義者」法文本作「馬克斯」——譯者。

在美國，即是強權論者所認為理想的民主國中，關於鐵道的一切事，都是極其醜怪詐僞的。因此，若某公司以廉價的辦法把競爭者推倒了；彼之所以能這樣做，因為可以從國家所贈送的土地中取得報價。近時發表的關於美國小麥業的文書，已足以證明國家怎樣幫助強者來掠奪弱者。富厚的資本的力量得到了國家的幫助，更十倍或百倍的增加起來。因此，當我們看見鐵道公司的聯合 (Syndicates) (自由合意的產物) 能夠成功的保護小公司來抵抗大公司；此種自由合意的實力居然能夠保持自身來抵抗那得着國家恩寵的萬能的資本；我們便不能不驚歎了。

實在，小公司仍然存在，並不管國家的偏頗。假若我們在中央集權的法國僅見着五六個大公司，而在大不列顛國內却有一百個以上的小公司非常協和，而且關於迅速運輸旅客和貨物的組織，確要比法、德兩國的公司好得多。

而且，問題還不是那樣。大資本得着國家的恩寵，只要有利於他，他便可以常常壓倒小的資本。我們所視爲重要的是這個：所有歐洲鐵道的數百家公司之間的合意，是那以法律來牽制各種公司的中央政府之干涉而成立的，此種合意是以各代表組成的會議來維持的；這些代表討論完畢帶回去回復舉派他們的人們的東西，只是提案，而不是法律。這是一種新原理，完全和君主政治或共和政治，專制政治或代議政治等一切政治原理不相同的。此種革新，曾被人們戰戰兢兢地介紹到歐洲的習俗之中，現在却止足不前了。

(三)

我們常常讀到那些喜歡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如果是這樣，則在將來的社

會中，誰來定運河輸送的規則呢？若你們無政府主義者「同志」中的一個想把他的貨船橫在運河中，妨礙着多數的小船，那時誰能制止他，誰又以道理來說服他呢？」

讓我們來承認這種想像是多少有點滑稽的。然而還有這樣的說法：「若某一個公社，或公社的聯合體想把自己的貨船在別公社的船之先出發的時候，也許要因為運輸自己的石子的緣故，使運河塞閉起來，而別公社所急需的小麥便不得不攔着來等候。那麼，若沒有政府，誰又能頒布貨船交通的規則呢？」

然而實際生活却指示出來，就在這種地方也與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樣，沒有了政府，事物的進行也是很好的。自由合意，自由組織，代替了那有害的昂貴的機械，而且能做得更好。

我們知道在荷蘭，運河是怎樣的。這實在是荷蘭的大道。我們又知道那裏的運河的交通運輸是異常熱鬧的。在我們用鐵道和大路運輸的東西，在荷蘭便要用運河的小船來轉運。在那裏你若要使你的船占先出發，便要引起爭吵的。政府爲着保持運輸交通的

秩序起見，也得實際加以干涉。

然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荷蘭人已經以更合於實際的方法來解決一切事件了，在很久以前，他們已設立過一種行會，即船夫的組合。這是因航行上的真正需要而發生的自由聯合。船艇的通行，皆依着航行註冊簿上記錄的次序而行；一個一個依自己的輪次而出發。誰也不能超過別的船隻而先行，若有犯者，即被行會除名。停泊的時期也有一定的，誰也不能在碼頭上多停一刻；倘若在那一定的時期中，某一隻船沒有貨物裝載，船主更倒靛，要立刻把這空船駛開，讓別的船隻來停泊。這樣，便把障礙免除了，縱然在船主間彼此競爭的時候，也不要緊。倘若沒有了船主間的競爭時，此種合意便會越見出於至誠。

至於船主們是否得加入船夫們的組合，在這裏也沒有說的必要，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大多數已經加入了。而且此種組合的利益更要廣大，彼等已沿着萊因河威賽爾（Weser）俄得爾（Oder）甚至推廣到柏林。船夫們並不等着一個偉大的畢斯馬克出來把荷蘭併吞到德國去，然後委任一個「全國運河航行事務高等會議長」在他的衣袖

上佩着許多條金邊，算是符合着這樣長的官銜。船夫願意自己來商定萬國的協定。此外，還有許多航行德國與斯干狄那維亞（北歐）間，甚至航行於俄國的船主們，也都加入了這些組合，以便來規定波羅的海的運輸交通，使船舶的交代。（*Chasse-crois*）得以調和。這種聯合是自由發起，而得着志願的贊成者的加入，與所謂政府毫無關係。

雖然，在這裏也有大資本壓制小資本的事。這些組合也有成爲獨占的傾向，特別在得着國家庇護的組合中，此種傾向更爲顯著。國家對於某組合加以保護，因而便要來干涉的。我們不要忘記，這些組合不過是一種團體，其會員僅有私人的利益，此利益又是極不定的，而且當生產、消費、交易成了社會共同的事，同時船主們爲着滿足他們的需要，也不得不加入同盟的公社，或別的幾百個協同團體，那時候情形一定不同了。在海上，有勢力的船主的團體，在陸地上便沒有勢力了，他們與鐵路、工廠及其他團體訂立合同時，也不能不讓步。

將來的事暫且放下不提；但無論如何現在還另有離開政府而組織成的自然的協

同團體。我們更要多舉些例子出來。

因為我們在說船船的事，便不可不提起在十九世紀中發起的極光榮團體之一，我們也可以此自豪的——即是英國救生船協會（English Lifeboat Association）。

誰都知道在英國海岸遇難的船隻，每年多至于千餘艘以上。堅固的船在海上是不怕暴風雨的。只有在近海岸才容易遇着危險，——如打碎後橋的大浪，吹落橋和帆的狂風，使船播動不易駕駛的波濤，使船擱淺的沙灘和暗礁等等，在近海岸的地方都容易時常遇着。

在古代沿海岸的居民常常燒起火引誘船隻向着暗礁進行，以便搶掠船上的貨物，此種舉動在當時且成了習慣，大家不以爲怪，但甚至就在這時候，他們也要常努力救助被難的船員。他們若看見船隻遭難，立刻駕起小船去救遇難的水手，縱使他們自身葬身於波濤，也不顧惜。在海邊的每個村落內都有一些男子或女子救助遇難船員的英勇的事蹟。

自然，國家與科學家會盡力過減少死亡的數目。燈臺，信號，海圖，與氣象的警報也會大大地減少了死亡的數目，可是每年還有千餘的船隻幾千的人命要人救助的。

有幾個富于仁心的人，因此會竭盡其精力來從事於此種工作。他們自身是很好的水手和航海者，發明出足以抵禦暴風雨不致為其破壞或顛覆的救生船，盡力引起公衆對於他們事業的興趣，募集必要的款來製造救生船停泊於沿海岸一帶，無論何處，只要用得着救生船的地方。彼等便要泊在那裏。

這些人不是雅各賓黨，所以他們並不傾向於政府一方面。他們已知道要使他們的事業得以完全成功，只有靠着大家同心協力的合作，熱心和地方的知識，尤其不可少的乃是水手的自己犧牲的精神。他們也知道在發第一次信號的時候便要把小船駕出去向波濤中駛去，在夜間，黑暗與大浪都是不易避免的；和猛烈的風浪奮鬥了五六小時，甚至十餘小時才能達到遇難的船——這些預備犧牲自己生命去救別人的人們確實是受着休戚相關的感情和犧牲的精神所鼓動，那種感情和精神決不是徽章所能買得的。

這完全是出於合意與個人創意的自發的運動。在沿海岸各地已成立了數百個地方團體。發起人常是富有常識的，不會拿出主人的架子。他們在漁人的村舍中訪求有材能的人，若某一個富豪要在海岸邊設置一處避難所，捐一千鎊的錢作設備的費用，接受了這筆捐款後，地址的選擇等等事，還是由本地方的漁夫和水手去決定。

新救生船的樣式也不由海軍本部來規定。這個協會的一個報告中曾說：「因為救生船的船員應該十分信任他所駕駛的船，這是極重要的，所以本委員會主張依船員所表示的希望，而決定救生船的建造和設備。」因此，每年都會有新的改良。

這種事業完全由志願者團結起來組織，委員會及地方團體來担任；完全以合意與互助來完成的。——呀！無政府主義者呵！而且，他們不要什麼納稅人，只收自然的捐款，一年內至少可得到四萬鎊。

至於成績呢？請看：在一八九一年協會有二百九十三隻救生船，在那年曾救了遇難船舶三十三隻，水手六百〇一人，從創造到現在，共救了三萬二千六百七十一人。

在一八八六年有三隻救生船載着船員在海中沉沒了，立刻便有數百新的志願者出來組織地方團體，其結果，建造了二十隻新船。我們還要知道這協會每年還要送上等的晴雨表與漁夫和水手，只收回比原價要少三分之二的代價。這使氣象學的知識普及，且以科學者所預報的天氣急變警戒團員。

我們還要知道，這幾百個委員會與地方團體的組織，是不分階級的，完全是由志願者、船員以及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的人們構成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不過是通信聯絡的中心，並沒有干涉的職務的。

若在某地方發生表決地方稅或教育的問題的時候，救生船協會的委員並不參加討論的。——這樣的謹慎，可惜那些選舉團體的議員不會做。然而關於救人的事，這些勇敢的人便不許那不會冒過暴風雨的人來替他們立法。當遭難的第一信號發了的時候，他們立刻跑上救生船，協力猛進。他們並不希望什麼徽章，也沒有鑲金的制服，這都是出於仁心。

我們再舉出一個同種類的協會，即是紅十字會。不管彼的名稱怎樣，且考察彼的內
容罷。

我們且想像有人在五十餘年前會說這樣的話：『國家只能夠一天殺二萬人，傷五萬餘人，然而却没有能力去救護自己的受傷者；只要有戰爭存在，便不可不用個人發意去干涉，而且那些有仁心的人爲着這人道的事業，必須作世界的團結。』那個敢於說這樣話的人不知會受着何等的嘲罵呢！最先他就會被人罵爲空想家；如他讓別人說下去，社會聽到下面的話：『這簡直是胡話！最感着需要你們志願者的地方，志願者就必定會缺乏的。你們志願者的病院集中在安全的地方，而在野戰病院裏什麼東西都沒有。像你這樣的空想家完全忘記了那國家的敵對心，會使可憐的兵士得不到救助而死的。這樣令人沮喪的議論，竟得着許多論客的附和。我們中誰不會聽見人們發出此種論調呢？』

然而，現在已知道什麼事會發生過了。紅十字會在各國在各處都自由的自己組織起來了；當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志願隊便起來着手工作了。男子

和婦女都盡力來服務。無數的病院和野戰病院都組織成功了；火車上設着野戰病院，並運送食料，紗布及藥品到戰地去。英國的委員會爲着幫助因戰爭而荒廢了的土地之耕種起見，便集起食物，衣服，播種的穀物，負重的牛馬，送到鄉間去，甚至還把蒸汽器械的鋤頭及使用這個的人送去，只要去讀莫華利耶（Gustave Moynier）著的紅十字會一書，你便會驚嘆其所成就的事業之廣大。

至於那些預言者，常常否認別人的勇氣，好心和材能，而相信只有他們自己的權力才可以管理世界，然而他們所預言的却完全不曾實現過。紅十字會志願隊的義勇決不是言辭所能形容和讚美的。他們只去尋找危險的地位；然而那些受國家薪俸的軍醫當普魯士的軍隊逼近的時候，便同着他部下的人員先逃走了；而紅十字的志願隊，却仍在槍林彈雨之下繼續他們的工作，忍受畢斯馬克和拿破崙第三的將校的虐待，熱心救護各國的受傷者。荷蘭人，意大利，瑞典人，比利時人甚至中國人和日本人也都協同一致，做得很好的。他們依時權的需要，分設病院及野戰病院。特別關於醫院的衛生法，彼此競爭。

得很利害。至今我們還聽見有些法國人說起他曾受荷蘭和德意志的紅十字會的野戰病院的志願隊的優美看護，並表示深刻的感謝。然而，那些強權論者看起來，又覺得怎樣呢？他的理想人物，便是那受國家薪俸的軍醫。至於紅十字會及其衛生的醫院是他不顧及的，因為看護病人的人，又不是什麼官吏呢！

有一個團體，最近才發生，立刻便有數十萬的會員；有不少的野戰病院，病院列車，並用新方法來待遇受傷者：這也是由於幾個獻身的人的自發的創意，才有這樣的結果。

也許有人會說在這個組織裏面，國家多少有些力量。誠然，國家想伸手來握着這個組織。幹部大概由那些被諂佞者所稱爲「鮮血的王公」的人來指揮。國王同皇后也很盡力地庇護本國的幹部。但這組織的成功，却並不是由於這個庇護的力量；這是由於幾千個各國的地方支部，個人的活動，以及一切努力來救助戰事的負傷者的人們的獻身精神的力量。要是國家不來干涉，則這種獻身精神將會更要發達些。

總之，英國人，日本人，瑞典人和中國人在一八七一年奮起救助傷兵，並不是因爲受

了萬國本都幹事的命令，而且在侵入地設立病院，把野戰病院移到戰場上去，並不是因為受了萬國政府的命令。這是由於各國的志願者的發意而成的。他們到了那裏，並不像各國的雅各黨人所預料的，立刻爭打起來；他們共同作事，忘記了國家的區別。

我們定會可惜這樣大的努力竟用在像戰爭那樣的壞事上面，我們會像詩人的孩子那樣自問道：「既然後來要治療他們，為什麼又要先把他們弄傷呢？」我們要破壞資本家和紳閥的強權，便要立刻阻止那叫做戰爭的大屠殺。我們希望紅十字會的志願隊同我們一道來努力作消滅戰爭的活動，並不望他們專門去救助傷兵；此處述及這個大團體，不過用來作為自由合意與隨意扶助所產生的結果的一個說明而已。

倘若我們想把滅絕人類的技術一一列舉出來，實在是舉不完的。只要提出那些扶助德國軍隊強盛的許多團體便夠了。德國軍隊的強盛，並不如世人所相信的，只靠着訓練，那些以普及軍事知識為目的之各團體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在最近一次的軍事聯盟 (Kriegerbund) 的大會中，共有二千四百五十二個聯

合會的代表十五萬一千七百十二人參預會議。此外還有很多的射擊、軍事門技、兵略競爭、風土研究等團體——這些便是發展德國軍隊的專門智識的工場，至於聯隊附設的學校，却算不得什麼。這實在是聯絡各種團體的一個大網，裏面有軍人，有文官；有地理學者，也有體育家；有獵人，也有工藝家；這些人自然的團結起來，組織，聯合，討論往國內各地探險。造成德國軍隊的真正脊骨的，便是這些志願的自由團體。

他們的目的在維持帝國，這實在是可怕的。但我們所留意的是：縱然軍隊組織是「國家的大使命」，但在這一部分也是一樣要由團體的自由合意與個人的自由發意來做，才能夠得到更大的成功。

便是關於戰爭的事，也要靠着自由合意的力量。因為更要證明我們的主張，我們再舉出瑞士的風土考察義勇隊（他們曾詳研究過山路），法國的飛行隊，三十萬的英國義勇隊，英國國家砲兵聯合會，正在組織中的海岸防禦協會，又如商業艦隊組織的提議，腳踏車隊以及私人汽車、汽艇的新團結。

在各處，國家都不斷地把彼的神聖職權讓與私人。各處的自由組織都侵入了國家的領域。以上所舉的事實，不過表示在將來國家消滅的時候，久等候着我們的自由合意的大略而已。

第十二章 反對論

(一)

讓我們現在來審察那些非共產主義的反對論。大部分的反對論都是出於單純的誤解，然而却也引起了重大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那強權的共產主義所引起的反對論，我們是不答辯的，——因為我們自己也反對強權的共產主義。文明各國的國民爲着個人解放的長久的戰鬥，勞苦過甚，他們不忍放棄他們過去的努力，也不能讓那干涉人民生活細故的政府存在，縱使這政府的目的在謀社會的福利，並且縱然強權社會主義的社會能夠建設成功，也不能繼續下去的；一般人的不平，不久便會使彼消滅的，或者使彼不得不依自由原則而自行改造。

我們所說的無政府共產社會即是承認個人的絕對自由不容強權的存在，也無強迫人們勞動的必要的社會。我們研究這問題的經濟方面，且看看假若這樣的社會仍是

由像現在一樣的人民（既不較好也不較壞，既不較現在的人勤勉，也不較現在的人懶惰）組織成的，這樣的社會能不能得着成功發達呢？

這反對論我們是知道的。「假若各人的生存都得到了保證，假若沒有要得着工錢的必要，來強迫他們勞働，那麼，誰也不會勞働罷！假若自己不做也可以，那麼，無論誰也會把他的勞働的責任放在別人的肩頭上。」我們最先要說這個反對論是由於出乎事實以外的淺慮而起的。要知道這問題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一方面，究竟以工錢為目的勞働所得的結果，是否更為有效；他方面，志願的勞働的生產是否少於受着工錢鼓勵的勞働。然而反對論却並不會想到這問題。適當的說，這問題是值得嚴密研究的。然而在精密科學裏，人們對於那些極不重要極簡單的問題，却加以嚴密的探討，而且謹慎地蒐輯和分解事實，然後才決定他的意見。——獨對於此問題，他們並不稍為考察，而且僅以一件特殊的事實，如美國幾處的共產社會不曾成功之類為滿足，便立刻加以判斷了。他們的舉動恰像那律師，他不顧反對方面的理由，以及反對他自己的意見，他只知道那對方是他

在辯論時的敵人罷了；假若他的幸運好，能夠隨機應變，並不管這事件是否合於公道的。因此這一切經濟學的根本基礎的研究，即以人類精力的最少消費供給社會以多量的有益生產物之最便利的條件之研究，便不能前進了。人們或則僅限於反覆地述着平凡的俗說，或則裝出不知道我們的主張的樣子。

在此種淺見之中極可驚的，便是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中，也有幾個著作家迫於時勢，不得不疑惑他們的祖師所定下的公理，即人們的生產勞働之最好的鼓勵是饑的恐懼。他們開始知道，生產之中有一種集合的要素，此種要素到現在差不多還沒有人注意過，但實際上却要比個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呢。工錢勞働所生出的品質不良，近世農業和工業中人類精力之可怖的浪費，那些把自己的負擔放在別人肩頭上的逸樂者之不斷的增加，以及漸漸顯明出來的生產上之某種鼓舞的缺乏，凡此種種現在已開始成了「古典派」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問題了。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自己也疑惑起來，究竟走入迷途沒有；那個假設被不義之財或工錢所誘惑的想像的惡人究竟存在沒有。這種

異端居然穿透了各大學，便在正統派的經濟學的書籍中也可以見着了。

雖然這個人報酬說和工錢制度的舊城堡已由其舊的防守者一塊一塊的拆了下來，與敵人以攻擊的機會了，可是許多社會主義改良派仍要左袒牠咧！

他們恐怕民衆要是沒人加以強制，便不會勞働的。

然而，在我們的一生，不是會聽見過有人曾二次表示過同樣的恐怖麼？一次是在美國解放黑奴以前，反對廢止奴隸的人所表示的；還有一次，是在農奴解放以前，俄國貴族所表示的。反對廢止奴隸的人說：「不用鞭笞，黑奴便要不勞働。」俄國農奴的所有主也說：「農奴要是不受主人的監督，便不去耕田，而任其荒廢。」這是在一七八九年法國貴族所唱的「和唱句」，又是中世紀的「和唱句」，也可說是自開關以來的「和唱句」。凡起了播蕩不正的問題的地方，我們便可聽見這樣的「和唱句」。然而每一次，實際事實又證明其爲虛偽。一七五二年解放的農夫曾以其祖先所不知道的那樣猛烈的精力來耕種田地，解放了的黑奴也比較他的祖先更勤勞地工作；俄國的農夫曾把星期五當

作和星期日一樣的休假日，來慶祝他們解放的蜜月，他們勞動的熱心即以其所獲得自由之程度爲比例，最自由的農夫，其工作最勤苦，最熱心。在田地屬於他自己的地方，他既不顧生死地勞動；這是一句很恰當的話。那些反對廢止奴隸的人的「和唱句」對於奴隸所有主是有價值的；至於奴隸自身，因爲他們知道這種「和唱句」的動機，所以也知其真價值了。

而且，經濟學家自己告訴我們說，工錢勞動者的勞動總是冷淡無精彩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財富的增加是與其努力爲比例的人們的勞動，才是實際切實的和生產的勞動。一切讚美私有財產的聖歌皆可以縮減爲此種公理。

因爲（這是可注意的）經濟學家想稱揚私有財產的恩惠，向我們說，雖在不出產的，卑濕的，像石頭一樣的土地，若用農民的私有者去耕種，也可得非常豐饒的收穫；可是這也絲毫不能作他們的私有財產贊成說的證據。經濟學家承認那使你的勞動結果不會被人掠奪去的唯一保證便是占有勞動機關——這是真的——他們不過證明當人

能自由勞働的時候，能夠自由選擇職業，沒有管理者來阻礙他，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勞働所得的利息只有他自己和那同他一樣勞働的人才能夠享受到，懶惰者是得不到的。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議論演繹出來的，只有這一點；而且這也是我們自己所同意的。

至於占有勞働機關的形式，那些經濟學家只不過在他們對於耕作者保證他的生產和改良所生的利益的辯證中間，接論及並且，他們又維持私有財產說，反對一切其他形式的所有，所以他們又辯證土地在共有財產的形式之下，不能生產出像在私人所有之下那樣的豐富收穫。然而他們也不能證明這個；實際上事實所表現的恰與這相反。

例如瑞士瓦吾德縣 (Vaud) 的公社在冬季村民全體一同去斫伐共有的樹林。在這勞働的節期中，對於工作的最大熱心以及人類精力的最大表現完全顯示出來了。一切工錢的勞働和私有的努力都不能與這個相比的。

又如俄國的某村，全村人民一同去割公社所有或租借的田地上的草。在那裏你們便可看出當人們爲着共同生產而共同勞働的時候，能夠生產若干量的東西。同伴之間

互相競爭所割的草的多少，婦女們也奮勇做事，不落刈草者之後。這也是一個勞働節期。在這節期中一百個人於數小時之間便能夠完成在平常各人分開做時，幾天方能做完的工作。孤立的所有者的工作若拿來與這比較，便是何等可悲的對照啊！

實在，我們還可從美國的開拓者和瑞士、德國、俄國以及某一些法國的村落中，引出許多的例子。又如俄國石工、木匠、船夫、漁夫等的組合（Artels）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引用的，這些人擔任一種事業，分配其生產與報酬於自己組合之中，並且經過中間人（經紀人）之手。我在英國所見着的，當以這同樣的原則，付給報酬的時候，船塢中所實行的工作，這些都可引用的。我們還可舉出游牧種族的共同大狩獵以及其他無數偉大的共同事業。無論在什麼地方共同事業確實要比工業勞働者與孤立私有主的工作優勝得多。

安樂——即是生理上、藝術上、道德上的欲求之滿足，常常是鼓舞勞働者的最有力的東西。做傭工的人雖辛辛苦苦，還難于維繫生命；而自由的勞働者知道為着他自己的

別人的慰安和奢侈，是以他的努力爲比例而增加的，因此愈加發揮其精力與才能，更得着很多的上等生產物。一個是永遠釘在貧窮上面的，其他一個却有將來的慰安和奢侈的希望。全體的祕訣都在這裏了。因此在一個以萬人的安樂爲目的的社會，以人人有享受各種生活的表現的可能爲目的的社會中，當然只有志願的勞動，要比較在現在的奴隸制，農奴制，工錢制，鞭笞之下的勞動所生產的物品更多而且更好。

(11)

在今日凡能夠把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勞動的負擔，放在別人肩上的，都這樣做，而且誰也相信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會這樣的。

生存所必需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手工作。我們無論做藝術家也好，科學家也好，要是我們不用手工作做出來的東西——麵包，衣服，道路，船舶，燈光，熱度等等。我們連什麼事都不會做出來。而且無論我們的娛樂是何等高尙的藝術品，何等精緻的玄學的東西，然而都要靠着手工作的。恰恰各人都想避免這種勞動——生活的基礎。

我們早已熟知在今日必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要做手工作，便是把自己每天關閉在不衛生的工廠裏約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把自己鎖在同樣的工作上面，過了二三十年，甚至于一生。

這便是說這些人被命定爲得着些少的工錢，不能顧到明天的安全，常有失業的恐懼，永遠是貧窮困苦的，其中大部分的，總是爲着自己和自己子孫以外的人衣、食、住、娛樂，教育等勞働了四十年之後，終死於慈善病院之中。

這便是說把你的全生蓋上了「劣等」的印；因為政治家常說：手腕勞働者總要劣於頭腦勞働者，那個在工廠裏勞働了十小時的人並沒有時間，更沒有方法，來享受這科學與藝術之高尚娛樂，甚或不會有賞鑒此等娛樂的準備；他不能不以從特權階級席上落下來，的麵包碎屑爲滿足了。

我們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手工作自然成了命運的詛咒了。

我們又知道所有的人僅有一個夢想——即使自己而且使自己的子孫從此種劣

等狀態中脫離出來；爲他們自己創造一個「獨立的」地位，這是什麼呢？——便是也靠着他人的勞働而生活。

只要手腕勞働者階級與頭腦勞働者分開存在的時候，即黑手與白手的區別存在的時候，情形總是如此的。

實在，當勞働者知道從生到死所等待着他的命運，便只是生活於凡庸，貧窮與明日之不安全中，那麼，他對於這憂鬱的工作還能夠有什麼興趣呢？因此當我們看見大多數人每天早晨動手去做他們的困苦的工作，我們不禁驚奇他們的堅忍和對於工作的熱心，以及那使他們像盲從動力的機械一樣，毫沒有明日希望地過他們的困苦生活，而且永不會想到有一天他們或他們的子孫會因爲是人類的一部分，便應享受今日少數特權所寵愛的人所壟斷了的一切豐饒的財富（豐富的自然的寶藏）一切智識的娛樂，科學和藝術的創道的那種習慣。

我們要廢止工錢制度，我們要實行社會革命，便是要廢止手腕勞働與頭腦勞働間

的區別；如此，則勞働便不會再是命運的詛咒了：彼將成爲——人的一切的材能之自由的運動。

而且現在應該把那假定優等的勞働，只能發於工錢制度的鞭笞之下的傳說，付之於嚴格的分析了。

我們不必去參觀什麼模範工廠和製造場，只要到尋常的工廠裏去看看，就足以看出那已經成了近世工業之特質的人類精力之絕大的耗費。一個組織得多少合理的工廠，也會有一百以上的人們勞力之浪費，而其目的不過是每天替雇主儲蓄了幾鎊的利息罷了。

在這裏你又會看見許多從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終日坐在板檯上屈着胸像患着熱病那樣的戰慄着他們的頭和身體，又像術士那樣快的挽繫那製花邊檯剩下的廢物——不值價的棉絲斷節——的兩端。像這樣搖搖戰慄的身體能生出怎樣的子孫貢獻與國家呢？雇主却要說：「但他們在我的工廠中所占的位置甚小，每天不過替我

賺了六辨士的淨利。」

在倫敦的某大工廠裏，我們可以看出那些因為常常把放着火柴的木盤頂在頭上從這間屋搬到那間屋去的緣故，在十六七歲便禿了髮的女子，其實這把火柴搬到他們的桌上的工作，一架簡單的機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沒有特別技能的婦女的勞働，用不着多大的費用，爲什麼還要用機械呢？假若這些女工做不成許多事，我們可以另外雇用一些人來代替，因爲在街上這類的人多得很多！」

在一個結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見一個赤足的小孩挾着一束報紙睡在一所大廈門前的石階上……因爲童工是如此價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這小孩每晚沿街賣報，賣得十個辨士，他只能得着一辨士或一辨士半。而在所有的各大都市中，你又會看見許多強健的男子彷徨於街市，他們已失業數月了；同時他們的女兒在織物工作的工場裏的邊熱蒸氣之中，變成了蒼白色；他們的兒子或則提着靴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靴，或則呆立在街角，向過往的人索一二個辨士，或則把應該用來學習一種技能的光陰耗費在去替賣

小菜者提籃子的上面，以致到了十八歲或二十歲依舊成爲照例的失業者。

從舊金山到莫斯科，從奈勃爾士(Naples)到司托克荷姆(Stockholm)情形都這樣的。人類精力的浪費，便是近代工業最顯著的特質，至於商業上的浪費比較上更要巨大，這是不用說的。

把經濟學這個名稱，給與在工錢制度之下精力浪費的學問，這是何等可悲的諷刺呵！

不僅如此！假若你去和一個組織很完備的工廠的管理人談話，他便要直率地向你說，在今日要得着熟練，勤勉，熱心的，專心工作的工人很不容易。『假若每星期一來求工作的二三十人之中，有一個這樣的人，縱然恰在我們要減人的時候，我們也決定雇用他。我們一見這樣的人便知道的，我們一定要雇用他，便縱然第二日就要開除老朽不動快的工人也可以。』而那些已接到解職的通告的，和那明天就要接到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進資本的預備兵的大隊——失業的工人——裏去，這些人僅僅在工作很多或起

了罷工潮屢主抵抗罷工者的時候，才能夠在織機或工作臺的旁邊工作。至於那些廠內的工作減少被上等工廠辭退出來的工人呢？他們也會加入那些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隊伍裏去，進二等工廠裏工作，這些二等工廠僅僅能不致虧本，對於購買者，特別是遠方的購買者，常以誑詐欺騙的方法對付。

假若你又去同工人們自身談談，你必定會明白工廠裏通例是——決不要盡你的能力做去。『工錢少——工作劣』這便是工人初進這樣的工廠時，他的同伴所給與他的忠告。

因為勞働者都知道假若他們起了好心，依從雇主的願望努力地勞働，增加了物品的出產，那麼，這種辛苦的勞働便成了將來工錢等級的標準了。所以在這一類的工廠裏，他們決不願盡力地去生產。在有些工業裏，生產額只限于維持高的價格，有時還有一種暗號，『巧妙地去幹』這就是說，『工錢劣，工作也劣』

工錢的勞働便是奴隸的勞働罷；這樣的勞働並不能，而且也不必生產出其所能生

產的。現在正應該把以爲工錢制度是生產事業之最良的獎勵的那種傳說拋棄了。若論現在的工業比我們祖父時代的工業，生產上加多了幾百倍，這是由於前世紀末業理化學的突然發達；並不是工錢制度的資本家組織，而是與這組織完全無關的。

(三)

那些會精密地研究過本問題的人，決不會否認共產主義的利益，假若他們真正了解這個，便要主張共產主義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換句話說，是無政府的。他們知道受着金錢的報酬的勞働，甚或就在「勞働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國家付給與其管治下的勞働團體，這也仍舊保存着工錢制度的特質，及其貽害。他們承認縱使社會占有了生產機關，全體的組織也會即刻受着工錢制度的害。他們更贊同靠着對於兒童的「完全的」(Integral)普及教育，和文明社會的勤勉的習慣，而且各人有選擇和變更職業的自由，同等的人爲了萬人的安樂都喜歡勞働；因此一個共產社會是不會缺乏生產者的，反而這些生產者立刻會使土地的生產力增加到三倍乃至十倍以上，給工業以一個新的刺

激。

這個，我們的反對論者也同意的。他們却又說：『但是危險是要從那些少數的懶惰者方面來的，他們雖在那使勞働成爲愉快的之完備的狀態下面，也不肯勞働，也不會有規則的勞働習慣。今日因爲有飢餓的恐慌，所以無論誰，即使是最倔強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動作。遲到的人便要受斥退。然而「一隻黑羊可以染污全體的羊羣」，二三個怠惰者和倔強者足以誘惑他人，惹起工場裏的無秩序與亂暴的精神，致工作成爲不可能，所以其結果我們不得不恢復元來的強制制度，強迫那些倔強的巨魁與他人共同就業。那麼，——以工作的成績爲標準而付給的工錢制度，豈不是既不傷勞働者獨立的感情，又得行強制的唯一方法嗎？所有其他的手段多少總帶有強權之不斷的干涉的意味，爲自由人所極憎恨的。——我們相信這便是公平敘述的反對論了。

我們第一便要分別這樣的反對論，是屬於要承認國家、刑法、裁判官、獄吏一方面的。強權論者說：『只要還有極少數的人不服從社會習慣，我們便必要保存行政官、法

庭，監獄等，縱然這些制度已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泉源，也是無法的事。」

所以我們只能重述着我們關於強權的大體屢次所說的話：『你們要避免一種弊害，却把一種更大的弊害用來做避免的方法，而且這已成了你所要補救的這些弊害的根源。你們不要忘記創造現時資本制度的，便是那工錢制度，那不賣勞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資本制度的罪惡，你們是早已知道的了。』而且此種強權論者的論法，不過是帶着諷辯的色彩來承認現制度的罪惡。工錢制度不是爲着要除去共產主義的弊害而創設的；其起源和國家私有財產的起源相同，是在別的地方。這是從被武力迫抑的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生出來的，不過穿上近代的服裝罷了。因此，贊成工錢制度的議論，是和替國家及私有財產辯護的議論一樣，都是無價值的。

然而我們仍想把這反對論考察一下，看看其中究竟有無真理。

第一——一個依自由勞動的原理而建設的社會，假若遇着懶惰的人，是不是不要像現在那樣強權組織和工錢制度，才能維持下去嗎？

例如有一個爲着某種企業團結起來的志願者的團體。因爲大衆都深信這企業會成功的，他們都同心一致地勞働，然而其中有一個人，他却常常缺席，不盡他的責任。難道因爲他一個人的緣故，便必須把這團體解散嗎？或者選舉出一個會長來課以罰金嗎？再不然，製造出懲罰的條例嗎？或者像學校打缺席的分數那樣來分配嗎？其實，顯然不會這樣做的；只有在某一天這個使企業陷於危險地位的朋友會受着勸告：『朋友，我們很願意和你一塊勞働；可是你時常放棄你的責任，你又荒廢了你的工作，我們現在不能不和你分離了。去罷，去找那些對於你這種行爲覺得不要緊的同伴罷！』

這是極其自然的方法，各處都在實行的，便在今日一切和罰金、扣薪、監督等制度競爭的工業裏，也實行這種方法的；一個工人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到工廠裏去，然而假若他做的工作做得不好，又有懶惰的習慣和其他的缺點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假若他是愛吵鬧的，那麼，就這樣了結了；他必須要離開這工廠。

強權論者主張那使工廠裏的工作規則正，品質好的人，便是萬能的雇主和監督。實

則，在每個稍爲複雜的同業中，在一件生產品完成以前須經過多數人之手，那使工作品質良好的人，便是工廠自身，換句話說，即是勞働者全體。因此在不列顛私人工業的工廠中，所謂監督那樣的人很少，比法國工場中監督的平均數少得多，比不列顛國有工廠也更少。

維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種標準，也是用這樣的方法。強權論者說這是靠田間守兵，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實際上公德的維持，是和田間守兵，裁判官，警察等無甚關係的人們在很久以前，便這樣的說過了：『生出罪惡的多半是法律。』

不僅在工業的工廠裏，事物的進行是向着這方面的，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事實都是如此的，只有那些書蟲，才是不曾注意過。當一個會與其他的鐵路公司聯合的某鐵路公司不果履行其契約，火車遲誤了時間，貨物凌亂的堆在車站上，其他的各公司便強迫解除此種契約，這種強迫已可以了。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贊成國家的一派，是這樣相信的，商業的交易之所以能遵守，全

是因為懼怕法律的緣故。但事實絕對不是這樣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約的商人都不會到裁判官面前的。商業最繁盛的地方，如倫敦那樣，單是債主起訴訟的事實，已足使大多數的商人全然拒絕與那強迫他們中的一個訴之於法律的人進行任何交易。

既是這樣，為什麼這在工廠裏的工人，商業中的商人，以及運輸組織中的鐵路公司中間，現在所用的方法又不能用於以志願勞働為基礎的社會中呢？

例如有一個協會，各會員相約實行下面的契約：「我們一同承認凡我們的房屋，糧食，街道，運輸機關，學校，博物館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你從二十歲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這二三十年間，每天應拿出四五小時來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選擇你所願意加入的團體，或者另組織新團體，但亦以從事必需的生產為限。其餘的時間你可以用來與你所喜歡的人協同來從事於保養，藝術，科學，總之，依着你的嗜好做去。」

「我們所求於你的，不過是一年之中在從事於衣食住的生產，公共衛生，運輸等團體中，勞働一千二百小時或一千五百小時而已。我們對於這些勞働的報酬，便是你可以

自由使用這些團體所已生產或將生產的東西。然而假若我們聯合的幾千個團體不
 容納你，（不管動機如何）假若你絕對不能夠生產有用的物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麼，
 你就像孤獨的人或廢人那樣過生活罷！假若我們是異常富裕的，能夠以生活必需品給
 你的時候，我們也很喜歡給與你的。你是一個人，你也有生活的權利。然而你如要生活在
 特別情形之下，離開人民的隊伍，那麼，你在與別的公民的日常關係上，便要受着苦惱。如
 果不是你的朋友們發現了你的才能，親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勞働，解除你對於社會的
 一切道德的義務，你就會被人視為中產階級社會的死鬼。

「最後，假若你不喜歡這個，去罷，去到這廣大的世界的別一處尋求其他的地位，找
 尋其他的同志，和他們一同組織新主義的團體。至於我們，則喜歡我們自己所有的了。」

假若共產社會裏懶人太多，這便是在那社會裏去掉懶人的方法。

（四）

我們不相信在真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中，有憂慮這樣的事變的必要。

其實，不管資本私有供獻多大的報酬與懶惰者的事實，沒有病而真正懶惰的人實在比較的少。

工人們常說中產階級是懶惰者。自然在這些人中懶惰者確實是很多的，但他們也是例外。在各個製造工業中我們反而常常看見幾個異常勤勉的中產階級。誠然中產階級的多數憑藉着特權地位的利益，使他們自己去作勞苦最少的工作，而且還要在空氣、食物等合於衛生的狀態下勞働，所以他做事時不會到異常疲乏的地步。然而這種狀態正是我們無例外地爲一切勞働者所要求的。

我們還應該說，要是有錢的人靠着他們的特權地位只去做無益的事，或有害於社會的事，然而什麼關員、局長、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幾小時多少有點勞苦的工作，爲着這義務工作，他們都不得不犧牲他們的閑暇時間了。然而正因爲中產階級會費注精力來防衛他們的特權地位，來做有害的事，所以他們才能夠打倒有土地的貴族，而得長久支配民衆。假若他們是懶惰者，他們早就已不能存在了，像古代貴族那樣

消滅下去了。所以在將來只要他們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時的愉快的，有益的，而且合於衛生的工作之這種社會中，他們定會好好兒地勞働，而且他們也看不過人們在這樣可怕的状态之下勞働，而不加以改良。假若像赫胥黎那樣的人，只要跑到倫敦溝渠裏作了五小時的工，他一定會發見把這溝渠弄得像他自己的生理學實驗室那樣衛生的方法。

至於說勞働者大多數的懶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經濟學家和慈善家才能說出這樣的胡話。

你若去問一個聰明的製造業家，他定會告訴你說，如果工人只知懶惰，一切的工廠都只得關門了，無論什麼嚴酷的手段和偵察的制度也不中用。你該記得一八八七年幾個煽動者用「巧妙地去幹」主義——「工錢少，作工劣」從從容容地做罷，不要過於勞苦，把你好能力耗費盡了。」來開始宣傳的時候，不列顛的雇主的恐慌狼狽的情形。這些人在前還痛罵勞働者的不道德及其工作的粗惡，這時却大呼：「他們使勞働者墮落，他們要毀滅工業。」假若勞働者早就是懶惰者，對於他們，雇主還不斷地以斥退出工廠

的話來恐嚇；那麼，「墮落」二字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當我們說起懶惰者的時候，我們必定要知道這是社會中極少數的問題；而且在爲這少數立法以前，先來研究那懶惰者的起源，豈不更好嗎？任何人若以難眼來觀察，他定可看見在學校中被稱爲懶惰者的兒童，大概是那些不懂得教師所教授的功課的人，他們之所以不懂，實則並非由於他們的懶惰，而是教授法不良所生出的結果。又有很多因爲貧窮和所受的不合衛生的教育之故，而得「腦貧血」，以致對於教師所授，不易懂得。一個對於希臘語，拉丁語等功課懶惰的兒童，若以科學教他，特別以手工實科教他，就能夠做得很好。學數學愚蠢的女孩，若一旦偶然有人把她從來不會懂得的算術原則詳細地解說一番，她也許會成爲班中第一個數學家了。在工廠裏懶惰的工人，若來培植他的園地，他在天將明時便會耕作起來，一面眺望那初昇的紅日，入夜當全自然休息的時候，他又會工作起來。

有人說塵埃便是那在不適當地方的物質之謂。這個定義差不多可適用於現在所

謂懶惰的人的十分之九。他們是迷入和他們的性質及材能不適合的方向的人。我們讀大人物的傳記，定會驚異他們之中竟有很多的「懶惰者」。他們在未發見適當的道路以前，總是異常懶惰；但後來就非常勤快了。達爾文、司提文生（Stephenson）及其他的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懶惰者。

所謂懶惰者常常是那不願把一生的光陰犧牲來做針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錶的工作的百分之一，而想把他的豐富的精神用在別的方面的人。他又是一個反叛者，他不甘爲了替雇主獲得無數的快樂的緣故，一生都在工作上過活，而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是要比他愚笨些，所不幸者，是他不會生於高樓大廈，而在破屋之中。

還有一些懶惰者之所以懶惰，是因爲他們對於社會強迫他們用以謀生的職業不會熟悉。他們看見自己親手所作出來的物品是不完全的，盡力想好好地去做，總不成功；後來知道他們已得了工作的不良習慣，是不會成功的，因此便開始憎恨起他們的職業來，而且因爲不知道別的，更憎恨起一般的工作來。多數勞動者和技術家的失敗，都在這

個原因上面。

反之，從青年時代便把鋼琴學習得奏得很好；或能把飽鑿，毛刷，銼子等東西使得很好的人，他決不會拋棄他的鋼琴，鑿，銼子等。只要他不勞働過度，他便要覺得他的工作是很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這所謂懶惰的名稱之下集起了由各種原因生出的結果，這些對於社會並不是害惡之源，而能成爲利益之源。像關於犯罪和人類材能的一切問題一樣，人們聚集起許多事實，但彼此間並無共通點。他們說起懶惰和罪惡，並不會去分析過其原因。他們只急急於處罰這些過失，而不會去考究過刑罰是否反能獎勵「懶惰」與「犯罪」。(註)

(註)見我的俄法獄中記 (In Russian and French Prisons) 一八八七年在倫敦出版

所以自由社會若看見了其中懶惰者數目的增加，要想法來阻止，彼在借助於刑罰之先，便要先去考察其原因。例如我們先前所說的，患貧血病的兒童的腦筋中，是不能再把學問貫輸進去的了；應該先給以營養，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體質強壯；不要再把時

間荒費了，把他帶到鄉間或海邊去；並不用書本，即露天教授他各種學問——教幾何，就測量某尖閣的距離，某樹木的高度；教自然科學，就摘花或在海裏打魚；教理科，就製造捕魚用的小船。然而千萬不要把什麼典雅的文章和已廢棄的語言，再裝入他的腦筋裏去。不要把他弄成一個懶惰者。

這樣的兒童是不會有秩序和規則的習慣的。所以應使他們先在自己中保持秩序，然後，在聰明的教師的指導之下，實驗室，工場，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許多器具所做的工，都會把這方法教給他們，然而千萬不可把學校的秩序教給他們，其結果會使他們反而無秩序的。因為學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棹子的排列，而且這是混沌亂雜的，教授之真正影響，決不會引起任何人的對於和諧團結的愛心以及工作的順序方式。

八百萬個學生代表出八百萬不同種類的材能，你們用那一個教育總長爲這八百萬學生所制定下的教授法，只不過設了一個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罷了。難道你們不知道麼？你們的學校成了一個懶惰的大學，恰如你們的監獄是一個犯罪的大學一樣。要

使學校自由，應把你們的大學學級廢掉，只靠着志願者的教授；你們應從這種方法開始，不可再作出什麼制止懶惰的法律了，因為這樣的法律只有使懶惰者愈見增加的。

那麼，對於那些不願一生專門去做某物品的極小部分的勞働者，以及幾乎悶死於小的器械終於嫌厭的人們，應該使他們有機會去耕種田地，斬伐材木，冒暴風，航大海，乘飛機在空中突進；但不要使他們一生都在看守一架小機器，或擊螺旋釘的頭，或鑽縫針的眼孔了。

去消滅懶惰的原因，而且你們也會明白真正嫌厭勞働，特別嫌厭隨意勞働的人，是極少數，差不多可說是沒有，因此也無為他們特別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第十二章 集產主義的工錢制度

在我們看來，集產主義者改造社會的方法有兩層的錯誤。他們一面講推翻資本制度而同時又希望保存着代議政治和工錢制度——這兩個東西是資本制度的基礎。

至於所謂代議政治，我們已常常說過了。在英國，法國，德國，或在美國，歷史所給與人們的教訓已不少了，爲什麼那些聰明的人士（在集產黨裏面也有這樣的人）仍去做國會或市議會的議員呢？我們實在不能明白。

現在議會制度已崩壞了，四面八方都起了攻擊議會制度的呼聲，而且一天高似一天了。不僅代議制度的原理，便是彼的原理，也被人攻擊得無存在的餘地了。然而那些號稱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怎麼還可以妨護這已經宣布了死刑的制度呢？

議會制度是中產階級建設來反抗王權保持自己的權利的，而且同時可用彼來擴充其管治勞動者的勢力；因此，議會制度實是中產階級特有的制度。便是那些擁護這種

制度的人也不會絕對主張一個國會或市議會真正可以代表一國或一城。其中較有見識的人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中產階級也不過利用議會制度來建築一道堤壩，反抗王權保護自己罷了，並不會給人民以自由的。況且現在的人民都覺悟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同時這利益的種類又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這個制度格外覺得沒用了。因此各國的民主黨雖努力求各種改良的方法，但終於是徒然的。「直接投票」(Referendum)已試行了，然而結果是失敗的；有些人又空談「比例的代表制」，「少數人的代表制」以及其他「議會的烏托邦」。總之，他們都是努力去找出不能實現的東西，每次總是經過新的實驗後才知道失敗了；於是，人民對於代議政治的信任便一天一天的消失了。

就工錢制度而論，也是一樣的；因為既然人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和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又怎樣能維持着工錢制度呢？然而集產主義者却要這樣做，他們用「勞働券」來作成集產主義者的大雇主——國家之下報酬勞働的方法。

英國早年的社會主義者(從奧文的時代起)之所以要採用「勞働券」制，是很

容易明白的。他們不過是要資本與勞働的調和而已。他們憎厭那以革命的行動來奪取資本家的財產的思想。

蒲魯東後來也抱着這同樣的思想，其原因也是容易明白的。在他的互依主義的制度裏，他努力想減少資本的毒害，並不管私有財產的存廢，私有財產是他平日極其厭惡的，然而他相信要保護個人反抗國家私有財產便又是必要的。

還有那些多少帶有資產階級的色彩的經濟學家贊成「勞働券」也是無足怪的。至於以「勞働券」作工錢付給勞働者，或以印有君主國或民主國的首領的肖像的錢幣付給勞働者，他們都視為無關重要的。他們只想保存着房屋、土地、工廠等等的私有制；——至少也得保存着房屋和製造上所必需的資本的私有制，而勞働券恰適合於保存私有財產的目的。

只要勞働券能與珠玉車馬等交換的時候，那麼，有房屋的財主也會願意把彼等當作房租收去。一天房屋、田地、工廠屬於私人，就一天有許多的勞働者爲着求得財主們允

許在他們的田間或工廠裏作工，或在他們的房屋裏居住，便不得不付租錢與財主；不啻是勞働券也好，或錢幣也好，但總算是租錢。只要向勞働者索取租錢的制度仍存在，而且此種索取租錢的權利在財主的手裏，那麼，財主們也願意接受金錢、紙幣，以及可以與各種貨物交換的支票。然而當我們承認房屋、田地、工廠不應再歸私人占有——而應是屬於公共的財產時，怎樣還擁護勞働券——這工資的新形式呢？

(11)

我們現在且來詳細考察現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集產主義者所倡道的勞働報酬的制度。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現在還自稱為集產主義者，所謂「集產」包含着一切生產機關之共有，以及「各團體依共產主義或其他原理，來自由分配生產物只要他們以為是適當的。」

約言之，集產主義便是這樣：各人在田間、工場、學校、病院及其他地方勞働。至於勞働時間則由領有土地、工場、道路等等的國家來規定。對於每日的勞働都由國家給以勞働

勞作報酬，在這勞券上面清清楚楚寫着：八小時的勞券，勞働者拿着這票子便可向國有商店或各種組合購買各種東西。這種票子又是可以分開的，可以隨意買一小時勞働的肉，十分鐘的火柴，三十分鐘的烟草。在集產黨革命成功之後，我們不再說什麼「兩辨士的肥皂」，而要說「五分鐘的肥皂」了。

多數的集產主義者迷信着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及馬克思）所定的特殊勞働與單純勞働的區別，告訴我們說：特殊或專門的勞働之報酬，應該比單純勞働的報酬多些。因此一小時醫生的勞働應視為和二小時看護婦的勞働或三小時掘土工的勞働相等。所以集產黨人格龍倫德（Gronlund）說：「專門或特殊勞働所得的報酬，應倍於單純的勞働，因為這種勞働需要長時間的學習。」

其他的集產主義者如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蓋司德（Guede）則不承認此種區別。他們宣言「工錢平等」，即醫生、校長、大學教授與掘地工人所得到的工錢（即勞働券）是一樣的。病院裏的看護者的八小時的勞働，是和八小時掘土工的勞働，或在工廠礦

坑中的勞働價值相等的。

還有一些人主張更讓步一點；他們以爲可憎厭的不衛生的勞働——如在陰溝裏作工之類——比較那愉快的勞働所得的報酬多一點。他們說，在陰溝中勞働一小時應該和大學教授的二小時的勞働相等。

此外還有某一些集產主義者贊成以各產業組合的勞働總額付給報酬。某一個組合可以說：「這裏有一百噸的鋼鐵，是我們團體裏一百個工人花費了十天的工夫生產出來的。他們每天勞働八小時，那麼，生產一百噸鋼鐵，要費去八千小時的時間。——一噸便要費去八十小時。」因此，國家便給這組合以一小時的勞働券八千張。組合得到了這八千張券，便以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來分配與鐵工組合員。

一方面，一百個礦工花費了二十日的時間，掘出八千噸煤炭，則一噸煤炭價二小時。於是礦工行會得着一萬六千張一小時的勞働券，且照他們所認爲適當的方法分配此等勞働券於會員之間。

假若礦工抗議的說一噸鋼鐵的價值不是八十小時的勞働，不過是六十小時的勞働罷了；假若大學教授要求他每日的報酬應四倍於看護婦；那麼，國家便來干涉他們，解決他們的爭議。

總之，這便是集產黨希望從社會革命中發生出來的組織。他們的原理，我們已經明白的，便是生產機關爲集合的財產，且以各人所費於生產的時間爲標準，同時斟酌他的勞働之生產力而分配報酬。至於政治組織還是議會制度，不過改良一下罷了，如採用直接投票——國民全體以爲可否的投票——且對於被選作議員的人予以確定的訓令。我們承認此種制度在我們看來是絕對不能實行的。

集產主義者最初宣言一個革命的原理——即私有財產之廢止——可是言猶在耳，他們便起來否認此種主張，且維持着從私有財產中發生的生產和消費的組織了。

他們一面宣言這革命的原理，一面又忽視此原理之必然的結果。他們忘記了要廢止勞働機關——土地，工廠，道路，資本——之私有，便必定要使社會向着新的道路進行；

而且還必定要完全顛覆現在的生產組織，其目的及其手段都應該改換過，而且在土地、機械及其他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的時候，更不得不立刻把個人間每日的關係改換過。

他們說：「不要私有財產，」但立刻便努力來維持私有財產的日常之形式。「就生產方面來說，你們是一個公社。什麼田地，工具，機械，以及其他一切已發明的東西——工廠，鐵道，港口，礦山等都是你們的。在這集合財產中，各人應有的部分都沒有分別。

「但是從明天起你們要細細商量你們各人對於製造新機器，開掘新礦山等工作應該擔任的一部分。你們要精密地估量新出產物的何部分是屬你們各人的。你們要計算你們勞動的幾分時間，而且還要注意不要使你們的鄰人的一分鐘比較你們的一分鐘買得更多的物品。

「並且以一小時兩小時來計算是沒有正確的標準的，因為在有些工廠裏一個工人同時可以管理六架機器，在有些工廠裏却只能管理兩架；你們便要計算你們所費去

的體力，腦力，神經力。你們又要計算你們做徒弟的時間，以便估計你們各人對於將來財產的貢獻。這些都是在你們宣言對於過去財產並不計算各人應有的部分之後所做的事。

但是我們很明白一個社會是不能基礎在兩個絕對相反的原理，兩個處處互相矛盾的原理上面的。要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公社有了這樣的組織以後，那麼，不是被迫而回復到生產機關的私有，就是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共產的社會。

(三)

我們已經說過某一些集產主義的著作家企圖在特殊或專門勞働與單純勞働之間定下一個區別。他們以為工程師，建築家，醫生一小時的勞働應與鐵匠，泥土工，看護婦二小時或三小時的勞働相等。而且在那些必需學習的各種職業與散工每日的簡單工作之間，也應定一個同樣的區別。

要定立這種區別，便必然會維持着現社會的種種不平等。這便是在工人與那些企

圖來管理工人的人們之間預先劃出一個界限。這仍然把社會分成兩種區別得很顯明的階級——上面是有智識的貴族，下面是手胼足胝的賤民——一階級的人命定了去替別一階級服役；他們用自己的手來供給別一階級的人的衣食；而他一階級的人却利用他們的閒暇來研究怎樣管理那些替他們勞働的人們的方法。

這便是使現社會的一個顯著的特質復活而且使彼得着社會革命的認可。這便是把在古代已衰亡了的社會中受着攻擊的弊害，當作一種原理來建設。

我們知道我們將要得着的一種回答。他們必定要照例說起「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還要引用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以及馬克思的話來證明工錢的等級有存在的理由，因為工程師的「勞働力」所取償於社會的實較掘土工人的「勞働力」為多。實際上——經濟學家不是會證明過工程師應該比掘土工人多支給二十倍，因為要造成一個工程師所「必需」的費用是要超過造成掘土工人必需的費用麼？馬克思不是也會斷言這二種手工作間的區別同樣的合於邏輯的麼？他根據着里加圖的價值說並加以

自己的解釋，主張貨物的交換，應以生產此貨物社會上所需的工作量爲正比例，此外，再不能得着別的結論。

然而我們對於此問題另有意見。我們知道假若工程師，科學家，醫生所得的報酬比一個工人大十倍或百倍；織布工人的報酬比農業勞動者大三倍，比製火柴的女孩大十倍，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生產費用」，不過是由於教育的壟斷，或工業的壟斷而已。工程師，科學家，醫生不過利用他們的資本——他們的文憑——恰如中產階級的雇主利用其工廠，貴族之利用其門第爵位一樣。

至於雇主之所以付給工程師以二十倍大於工人的報酬，這不過是由於個人一身的利益；假若這個工程師一年可使生產費用節省四千鎊，雇主便給八百鎊與他。假若一個工頭很巧妙地刻薄工人節省了四百鎊，他便很高興地每年給八十鎊或一百二十鎊與這個工頭。他拿出四十鎊，便希望得着四百鎊；這便是資本制度的精華。至於各種手工業間的差別，也是由於這同樣的理由。

因此我們不必再討論什麼由於熟練勞働而生的「生產費用」了；他們也許又要告訴我們說：一個在大學裏愉快地度過他的青春的學生有權利來得着比較一個從十歲就辛辛苦苦地憔悴於深山窮洞之中的礦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錢；一個織布工人有權利來得着比農業勞働者大三四倍的工錢。實際上，教養一個織布工人的費用並不見得就比教養農業勞働者的費用大四倍。織布工人之所以享着這種恩惠全由於在國際貿易中，他們的工業從別的工業未發達的國家所得來的利益，而且由於各國政府所給與此工業的特權優於農業。

誰也不會計算過一個生產者的生產費用，假若說一個高等遊民在社會中的費用比一個勞働者多數倍，我們把貧民中幼孩的死亡，貧血病的流行，以及天亡等等事實計算起來，且看看一個強健的散工人在社會中的消費究竟是不是比熟練的職工的費用少些！

例如給了一先令三辨士與巴黎的勞働者，給了三辨士與那為製造花邊幾乎使眼

瞎瞎了的農家女，給了一先令八辨士與農夫，難道有人能夠說這便足以代表他們的「生產費用」麼？我們深知道平民勞動所得的工錢，較他們的出產少了許多，但我們又知道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全因為在現代可驚異的社會組織之下，要是他們不願得這微少的工錢，他們便會餓死。

我們從此看來可知報酬的差別是租稅，政府的干涉，和資本家的獨占之混合的結果。要之這是國家和資本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關於工錢的一切學說都是發明來掩飾現社會的不公平的，我們不必再來討論。

或者有人會向我們說，集產主義者的工錢等差說，是要進步一點。他們說：「我們甯願見熟練的職工得到比尋常工人所得的多兩三倍的工錢，却不願見一個大官在一日中便得着一個工人一年中勤苦工作所不能得到的錢；因為前一件事總要好一點。而且這更進一步走向平等了。」

而在我們看來，這却是退步。要在新社會中定下單純勞動與專門勞動的區別，這無

異乎在革命時又把我們現在所屈服而又不能不認爲是不正當的殘暴事實加以認可，而認作一個原理。這簡直在做法國議會的那一班先生們的舉動，他們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大聲宣言廢止封建的權利，然而在八月八日他們又承認同樣的權利，徵收農民的賦稅以賠償貴族，且把此賦稅置於革命的保護下。這又像在做俄國政府，俄國政府在解放農奴後，又會宣言，從前已認屬於農民的土地，今後又爲貴族所有。

或者再舉出一個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議決公社議會員的薪資每日十五佛郎（英文本作十二先令六辨士），而同時城壘上的國防隊的兵士每日僅得着三十個蘇（英文本作一先令三辨士），還有人稱此決議爲高的民主主義的平等。實際上公社不過把從前官吏與兵丁，治者與被治者間的不平等加以認可罷了。此種決議若出之於臨機應變的衆議院，似乎還值得別人稱讚，若出之於革命的公社，則未免可笑了。公社不會把彼的革命的原理施諸實行，便自己把彼等宣告死刑了。

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國務員每年得四千鎊的薪俸，而勞動者却不得以每年四

十鎊上下的工錢爲滿足；工頭所得的錢也要比平常工人的工錢多兩三倍，而且在工人自己中也有許多等級，從八先令一天的工人，到三辨士一天的農家女；我們不贊成國務員的高薪俸；同時也不贊成工人和貧家女之間有八先令和三辨士的區別。我們說：「推倒教育的特權與門第的特權。」我們之所以要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因爲這些特權觸犯了我們。

彼等在此強權的社會中已觸犯了我們了。難道在將來宣告平等的社會中，我們還能夠讓彼等存在嗎？

因此有些集產主義者已知道在受了革命影響的社會中，再要維持工錢的等差，是不能夠的，便急急提倡工錢的平等。但他們又遇着新的困難，他們的工錢平等說也和別的集產主義者的工錢差別說一樣，是同樣不能實現的「烏托邦」。

社會既把一切社會財富收歸公有，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對於這財富皆有權利，並不管他們對於生產這財富時所盡的力量如何；——這樣的一個社會，便不得不廢除一切

工錢制度；不管錢弊也好，勞働券也好，應一律廢止。

(四)

集產主義者說：「以各人的事業爲標準而給報酬，」換句話說，就是以他對於社會所盡的職務的分量作標準。他們以爲當社會革命發生，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之時，卽應實行此種原理。然而在我們看來，假若社會革命竟不幸而提倡此原理，則無異乎自己表示其失敗而已；這也就是表示過去數世紀放在我們肩上的社會問題，現在又不能解決了。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工人勞働愈久，所得報酬愈少，——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此種原理，初看起來，好像是向着正義的先聲。然而實際上却仍是繼續着從前的不公道而已。有了此種原理，工錢制度纔發生出來，於是便生出了現社會的一切弊害和較顯著的
不平等；因爲自從社會以貨幣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錢來估量勞働的價值的時候起，自
從社會決定工人只應該收受他的勞働所能得到的工錢的日子起，那個得着國家幫助

的資本家社會的全歷史，實際上已寫出來了。資本家社會實在是從此原理生出萌芽來的。

那麼，難道我們還要回到出發點，再經過一番同樣的進化嗎？那些理論家希望如此，但幸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以為革命必須是共產主義的；否則，便會沉溺於腥血之中，又應該從新來開始。

我們為社會所盡的職務，不管是在工廠裏，在田間勞働，或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夠以金錢來估量其價值的。說到生產上面，實在並無所謂價值（被一般人誤稱為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亦無使用價值的正確尺度。假設現在有兩個人，每天為社會勞働五小時，年年不息，雖是職業不同，然而所給予他們的愉快則一。所以在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勞働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工作分割起來，說甲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之結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的工作之結果相等。

我們在大體上可以說一個人一生每天犧牲了十小時的閒暇，他對於社會的貢獻，

是比較那些每天只犧牲五小時的閒暇或全然不犧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們却不能夠單指出他二小時的工作，說他這二小時工作的出產是要比別的一個人一小時的出產多一倍，給報酬時也多給一倍與他。這樣做起來，便是蔑視了工業、農業和現社會全體的種種事情；而且把個人工作是全社會過去和現在的勞働之結果這樣的事，完全忽視了。這好像一個人明明生在鋼鐵時代，還夢想在石器時代中生活一樣。

試走進一個近代的煤礦裏，看看那立在大機器前面來升降吊籠的人。他手裏拿着一條槓杆，逆轉或停止機器的動作；他把柄子放下，一瞬間吊籠便翻轉來，他把吊籠扯上來又放下去，做得異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眼睛不動的注視着掛在壁間的指針器，這指針器指示那昇降的吊籠每秒鐘所達到豎坑的那一點。指針若達到一定的度數時，他立即停止吊籠，恰在所需要的地點，一碼也不會高，也不會低。炭夫便把煤炭車取下代以空車，於是他立刻扭轉槓杆，吊籠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須這樣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時或十小時。假若他的腦筋稍爲休息了一下，吊

籠便會飛起來與齒輪衝突，打碎車輪，弄斷繩索，撞傷人，使礦坑裏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若他每反轉槓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鐘，其結果，雖在今日最完善的礦坑裏，每天也會減少二十噸至五十噸的出產。

那麼，在礦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嗎？或者又是那個在下面以信號叫他扯起吊籠的小孩呢？還是那些在豎坑底下冒着生命危險，甚或因煤氣爆發死於礦中的礦工呢？還是那個在計算錯誤了一點就會失却礦脈，叫礦工去掘毫無價值的岩石的工程師呢？或者還是那個投資於礦山，不聽專家的勸告，相信那裏可掘出精良的煤炭的礦山主呢？

所有在礦坑中勞働的人對於煤炭出產的貢獻，當依他們的體力，精力，智識，才力，技能為比例。我們可以說他們各人都有生活的權利，滿足他的需要的權利，而且在各人生活必需品得到保證之後，也有滿足奢侈慾望的權利。那麼，我們怎樣能夠估量他們中各個人勞働的價值呢？

並且，他們所採掘出來的煤炭，就完全是他們的工作結果嗎？這不也是那些建築鐵

道達到礦坑的人，以及在車站四旁築支路的人的出產嗎？又還不是那些耕種田地，挖掘鐵礦，斬伐森林，製造燒煤炭的機械，漸漸地使全礦業發展的人嗎？

要把這些人各個間的工作劃出一個區別出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依他們工作的結果來估量他們的工作，是不合理的；把他們的全工作分作若干部分，以勞動的鐘點來算分數，也是不合理的。只有這一種事是對的：把需要放在工作之上，不管工作如何，只管需要如何，最先應承認生活的權利，其次應承認安樂的權利，於一切參與生產的人。

然而我們且就人類活動的別一方面——就各種生活現像的全體來看看。我們之中究竟誰能夠為他的工作來要求最高的酬報呢？是診斷疾病的醫生呢？還是那以醫生方法來看護病人使之全愈的看護婦呢？最初發明蒸汽機的那個人呢？還是那個偶然一天拉繩子——這繩子是從前用來開活塞的小門，使蒸氣進去——疲倦了，把繩子縛在機器的槓杆上面，就出去和他的同伴遊戲，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他已經發明了現代機器的主要部分——自動的小門——的小孩呢？

是火車頭的發明家呢？還是那個提議用枕木來代替鐵道下面的石頭（從前鐵道下面用石頭來墊，因為沒有彈力，所以火車時常出軌。）的紐克塞（Newcastle）的工人呢？是火車的司機人呢？還是那個執紅綠色小旗叫火車停止或前進的打旗號的人呢？我們又把那橫穿過大西洋的海底電線的功勞歸給與什麼人呢？歸給與那個在博學的科學家等宣言海底電線不能通消息的時候，堅持着要這樣做的電汽工程師呢？還是歸給與那個會進言說用不着粗大的繩索而應代以簾一般的電線的地文學家莫理（Maury）呢？或是歸給與那些不分晝夜在「大東方」（Great Eastern）船的甲板上一碼一碼的檢查海底電線，把那輪船公司的股東誤放在電線之不導電的外包裹面，使電線無用的釘子一一取去的不知何方人士的志願者呢？

並且就較大的範圍來說，即在包含得有快樂、憂患，以及種種臨時發生的變故的人間生涯中，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夠舉出某人是對於牠會盡過很大的職務的，而且用金錢來估量其價值，以致惹起他生氣。有時這種職務不過是一句話——一句合時的

話——有時或者又是要幾年幾月的經營才做到的。難道對於這「不可計算的」勞役，我們能夠用「勞働券」去估量麼？

「各個人的勞働」然而假若各人不願意使他的勞役超過自己所得到的金錢，鈔票或社會的報酬，那麼，人類社會將不能繼續到二代以上。假若做母親的不肯花費光陰來養育她的兒子，假若各人不能得到相等的代價，便一點東西都不肯給別人，假若人們看不見酬報的地方，就不肯多給一點與別人，那麼，則人類種族便要滅亡了。

假若中產階級的社會仍舊一天一天的腐敗下去，假若我們已走入一無可逃避的黑暗巷子裏，非用大刀，闊斧，火把來攻擊舊制度，便不能脫逃出來；這全是因為我們計算得太利害了。這是因為我們心中存個「爲求收入方肯給與」的觀念。這是因為我們把社會當作一個以債權和債務爲基礎的商務公司。

而且，集產主義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含糊地知道，若實行「以各人的工作爲標準而分配」的原理，社會便不能存在了。他們以爲個人必要的需要（我們不是說奢侈的

欲求)常不能夠和他的工作相符。因此德柏模 (De Paeppe) 說：「這個原則(超卓出羣的個人主義的原則)會被關於兒童與青年的教育(包含他們的養育和寄宿)之社會的干涉，以及關於病者弱者之扶助和老年勞働者養老的地方等等的社會制度所緩和了。」他們知道一個有了三個小孩的四十歲的男子，他的需要總比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多些。他們也知道一個夜夜不睡，坐在搖籃旁邊喂小孩的奶的婦人，不能夠和一個睡眠得很充足的男子做出一樣多的工作來。他們似乎也知道那些為社會勞働過度，以至於衰弱的男女，也許不會再比那些隨便把光陰消遣過去，過着國家高官的特權生活，自飽私囊的先生們做出更多的工作了。

他們極力來設法緩和他們的原則。他們說：「社會要來養育小孩，扶助老人和弱者。自然，社會自身可以担负的費用，將以需要為標準，來緩和此種工作的原則。」

慈善，慈善，從前基督教徒的慈善，這次由國家來做了。他們相信孤兒院的改良，實行老人和病者的保險——來緩和他們的原則。然而他們還是免不掉有那種「先弄個傷

痕，然後方來醫治」的思想！

因此，他們否認了共產主義，任意嘲笑了「各取所需」的公式，這些經濟學大家感覺了他們忘記了一些東西，這便是生產者的需要，他們現在也承認的。不過他們要國家來量估這需要，而且要國家來確定究竟需要與勞働是否相權衡。

國家要布施慈善事業。從此去英國的貧民救濟法，貧民習藝所僅一步而已。

這只是很小的差異，因為甚至就是我們所反抗的社會的這個繼母，已不得不緩和她的個人主義的原則了；她也不得不在此同樣慈善的形式之下，對共產主義的方針讓步了。

她也恐怕她的商店被搶劫，特來布施半個辨士的飯食；她又建立醫院（大概是設備得很壞的，但有時也有極壯麗的）來防備傳染病的流行。她依工作的鐘點把報酬給了以後，她也常常看顧她所掠奪了的那些人的子女。她想起了他們的需要，又做點慈善事業。

我們常常說過，貧窮是財富的第一原因。創造第一個資本家出來的，便是貧窮。因為在我們常常聽見說明「剩餘價值」成蓄積之先，就有許多人迫於饑寒不得不賣却他們的勞力，以免餓死。貧窮造就了資本家。至於中世紀末貧民的數目急劇的增加，便是由於國家建設之後隨之而起的侵略與戰爭，以及因掠奪東方各國而生出的富之增加。這兩個原因，便把鄉村與都市的聯絡打斷，教彼等廢止從前常常實行的「協同生活」而代以有利於掠奪者的工錢制度。

難道生出這種原理的革命，敢稱爲社會革命嗎？社會革命，這是對於受餓，受苦，受壓迫的人們何等親切的一個名辭呵！

這是絕對不能的。當舊的制度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之下打得粉碎的時候，呼聲便起了：「萬人的麵包呵！住居呵！安樂呵！」人民會聽從的；他們要說：「我們要來滿足我們自己不會知道的對於生活快樂和自由的渴念。當我們人人都嘗過了這種幸福的滋味，我們便要動手來工作，把中產階級統治的痕跡，及其賬簿式的道德，「情實」的哲學，「我

的，你的」的制度，一起來毀滅。像蒲魯東所說：「破壞之後，我們便要來建設；」我們的建設是要基礎在無政府與共產主義上面的。

第十四章 消費與生產

當我們以一種完全和一切強權學派不同的眼光來觀察社會及其政治組織，不是以國家爲本而下及於個人，乃是以自由的個人爲起點，而後達到自由的社會，這時候對於經濟問題，我們也採取同樣的方法。我們在討論生產，交易，租稅，政府等問題之前，應先研究個人的需要及其滿足的方法。

初看起來好像這兩者的區別是很小的，其實此種區別會把官學派的經濟學完全推倒。

不論翻開任何經濟學家的著作，最先總是討論生產；即是分析現在所用來製造財富的方法，如分工，工廠及其機械，資本的積蓄等。從亞丹斯密到馬斯思都是由這個方法進行的。至於消費；即現社會中用來滿足個人需要的方法，只不過在他們著作的後面才略略談到而且他們只解釋在那些互相競爭財產的人們中間財富是怎樣分配的。

也許你要說這是當然的。在滿足需要之先，自然應該製造用以滿足需要的物品。然而在生產任何物品之前，是不是必須先感着需要？譬如人去狩獵，牧畜，耕種，製造器具，後來又發明機械，豈不是都先感着必要而做的麼？支配生產的不就是對於需要的研究麼？所以應先攷究需要如何，然後再討論滿足此等需要的生產組織，這才是很正當的方法。

這便是我們所要做的。

然而若從此觀察點來觀察經濟學，則經濟學的形狀完全變更了。經濟學不再是單純事實的記載，而成了一種科學；我們且可以為之下一個定義：「人類需要及以人類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費來滿足此種需要的方法之研究。」其真正的名稱，應為社會的生理學。彼實在與動植物生理學所構成的科學並立。所謂動植物生理學即是動植物的需要及滿足此需要的最有利益的方法之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所占的地位與有機體的生理學在生物科學中所占的是相同的。

譬如說，人類結合而成爲一社會。大家都感着住衛生房子的需要。野蠻人的小屋已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需要着稍爲住得舒服、堅固的房子。於是發生了下面的問題：依現在人們的生產力來說，究竟所有的人都能夠各有各的房屋麼？難道又有什麼東西阻礙着他們，使他們不能得到呢？

而且當我們發出這個問話後，我們便知道在歐洲的各個家庭都能夠有一所完全像現在在英國、比利時或波爾蒲城（Pulman City）的房屋一樣舒服的房子，或者還有同樣多的房間。只要勞働了一定的日數，就可以造成一所家具完全、電燈輝煌、空氣流通，異常清潔的房子了。

然而十分之九的歐洲人從來不曾住過一所衛生的房子，因爲一般平民天天都要去爲着滿足統治者的欲求而勞働，永遠沒有閒暇和金錢來建造自己所夢想的房屋。要是現在的社會狀態繼續不變，他們便不能得着房屋，而且只有永遠在僅能容膝的小屋子裏居住着。

因此可看出我們的方法是和經濟學家的方法完全相反的。他們相信所謂生產的法則是一定不變的，又計算每年新造的房屋的數目，以統計來證明，因為新造的房屋太少了，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所以十分之九的歐洲人是不能不住小屋的。

更就食物而言。經濟學家逐一計算了從分工所得的利益，便告訴我們說，分工後有些人應從事農業的工作，有些人則應從事製造。他們說，農夫出產這樣多，工場生產那樣多，用那樣的方法交易，又分析販賣，利益，純利，或剩餘價值，工錢，租稅，銀行及其他等等。

然而我們聽他們說了這樣久，却毫無所得。假若我們來問問他們：「各個家庭每年已經能夠生產足以養十人，二十人乃至百人的小麥了，為什麼還有百萬的人類得不到麵包呢？」他們仍然以從前的話來答覆我們——「分工，工錢，剩餘價值，資本等等——而且還是達到「生產不能滿足萬人的需要」的同一結論。其實縱令此結論是真實的，也不能答覆我們的問題。我們所問的是：「人們究竟能否以自己的勞力去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麵包？要是不能夠，那麼，是受着什麼東西的阻礙呢？」

現在有三萬五千萬的歐洲人。(註)他們每年需要這許多的麵包，這許多的肉，酒，牛乳，蛋，牛油等等。他們又需要這許多的房屋衣服等等。這是他們的需要的最小限度，他們能夠生產這一切東西麼？要是能夠，難道還有充足的閒暇來研究科學，藝術，娛樂麼？——換句話說，就是還有閒暇來享有在絕對的必需物品以外的各種事物麼？假若對於這問題作肯定的回答，——那麼，什麼東西妨害着他們的前進呢？用什麼方法來破壞那障礙物呢？要達到這樣的結果，是不是要些時間呢？讓他們趕快動手罷！但我們不要失掉了生產的目的——即是使萬人的需要皆得以滿足。

(註)此爲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統計，現在已增加不少。一九一四年歐洲的人口爲四萬五千二百萬，據近時調查約十萬萬之多。——譯者。

假若現在人們的最切迫的需要尚未滿足，——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增加我們勞動的生產力呢？難道沒有另外的原因麼？也許會是生產失掉了滿足人們的需要的那個目的，走入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其組織也陷於過失了。我們既然能證明這果然是

如此的，那麼，我們且來研究怎樣改造生產的組織，才能真正滿足所有的人的需要。

在我們看來，這便是處理現今事體的唯一正當方法，也就是使經濟學成爲一種科學（社會生理學）的唯一方法。

這是很顯然的：此種科學在敘述文明國民、印度的公社，或野蠻人現在所行的生產事實的時候，與現在經濟學家所記的事實並不會有什麼大的差別；這即是說，這是單純記載的一章，和動物學植物學的記載的章節相同的。然而假若這章節是寫來說明那滿足人類需要所必需的能力之經濟的，那麼，彼除了記載的價值外，還應該是正確精密。彼應該明明白白地表示出來現在社會制度下之可驚的人類精力的浪費，而且應該證實要是現制度存在一日，人類的需要便永不會滿足的。

我們知道，觀察點現在應該完全變更了。在那織出許多碼布的織布機之後，在穿鋼鐵板的穿孔器之後，在存儲着股息的保險箱之後，我們常常看見那些從事生產的工人替別人預備宴席，而自己却完全享受不到。我們也應該知道那立足點是錯了，所謂價值

與交易的「法則」不過是現在發生的事實之一種虛偽的說明而已；而且當生產已改造來適應一切社會的需要時，事物的進行又會完全不同了。

(二)

若從我們的眼光來觀察，則經濟學的原則未有不變易其形狀的。

譬如說生產過剩，這是我們常常聽見的一個名辭。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學士會員，或學士會名譽員的候補者，未有不承認經濟的恐慌是由於生產過剩——即在某一時期中生產了更多的棉花，衣服，鐘錶等超過需要以上！難道我們不會反對過那拚命去無理地生產超過世人的消費額的物品的資本家的貪慾麼！

然而，要是我們肯仔細去攷究一下，便可知道這些理論都是不正當的。實際上在世界上，一般的用品中果真有一件生產過多的物品麼？我們試把各國的重要輸出品一件一件的檢查一遍，就可以知道所有的輸出品全部若供給與輸出國的住民全體消費還是不夠呢？

俄國農民送到歐洲的小麥，並不是他們的剩餘。在歐俄便在收穫極豐饒的時候，所產的小麥和米也只足以供給本國人民的消費。然而照例，農民要付給地租與賦稅，便得不忍饒賣却他們真正需要的小麥。

英國送到世界各處的煤炭，也並不是彼此的剩餘，因為每年留與內地各家庭消費的平均每人不過得四分之三噸，連一噸都不到。而數百萬的英國人在冬天便不能烤火，甚或只能煮一點菜罷了。實際上，除去無益的奢侈品而外，在輸出為各國之冠的英國，只有一件一般的用品，其生產額大概是超過社會的需要——這便是棉花。然而就不列顛全體的居民看來，三分之一以上是穿着破爛的衣服的，這件事便足以使我們疑惑這輸出棉花，若用來供給這人民全體的真的需要，不是還嫌不足麼？

通例輸出品並不是剩餘的，也許起初的時候是這樣，但現在却不是了。古語說：「做靴子的，常是赤腳。」真不錯。在從前，個人的職工是這樣，在現在，國民也是這樣。我們把必需的物品輸出去了。我們這樣做，因為工人用他們所得的工錢不能夠買到他們所生產

的物●品●而●且●還●要●付●地●租●利●息●與●資●本●家●銀●行●家●

人類的不斷地增進的幸福之欲求，不但沒有滿足，而且生活的絕對必需品也時常缺乏。因此「剩餘生產」這句話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像那些經濟學的論者所解釋的那樣意思。

再從別一點來觀察——所有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明確的法則，即是：「人的生產額多於他的消費額。」他靠自己勞動所得的東西過活，而且還有剩餘。所以一農家所生產的東西，足以供給數家族的消費。

在我們看來，這種反覆地說着的語句，並無什麼意思。假若這是說明每代的人民多少總要留下點東西與後代，這却是真的；例如一個農夫種了一株樹，這株樹可以繼續生長三四十年乃至百年，他的孫子還可以採取這樹的菓實。又如他開墾了幾畝荒地，因此便增多了對於後代的遺產。道路，橋樑，運河，他的房屋和他的家具也是留與後代的如許的財富。

但他們的意思却不是這樣。他們說農夫所生產的是要比他所必需消費的多些。其實他們却應該說：國家常常把他（指農夫）的生產的大部分當作賦稅拿去了，教會也向他徵收什麼稅，地主又向他索取地租，其結果便成了一階級的人；他們在從前消費他們所生產的東西（但除去爲着意外災禍的貯蓄，和殖森林，修道路所要的費用等）。但現在却不能不過着艱難困苦的生活，工作度日，其餘的出產都被國家、僧侶、地主、盤剝重利者等等取去了。

因此我們常常說：農業勞動者與工業勞動者等所消費的不及他所生產的那樣多，——因爲他們不得不出售他們勞動的產物的大部分，而以剩下的一小部分爲滿足。我們知道，假若以個人的需要爲我們的經濟學的出發點，則我們一定會達到共產主義；即是以最澈底最經濟的方法來滿足一切需要的組織。反之，若以現在的生產方法爲出發點，以利益及剩餘價值爲目的，而不問我們的生產是否適合滿足我們的需要，則我們必然會走到資本主義的路上去，至多亦不過集產主義——這不過是現在工錢制

度的兩種不同的形式而已。

實在，當我們攷究個人與社會的需要，及在人類發達的種種過程中人們所用以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時，我們一定會感覺得必須廢止像現在那樣的偶然生產，而應該使我們的努力成爲有系統的。人皆知那不會消費由一代傳給一代的富源被少數人占有了，對於一般人是無利益的。而且我們又知道由此種方法，全社會四方之三的需要便不得滿足，因此現在浪費人類的精力來製造無益的東西的這種舉動更是罪惡的了。

我們更知道使用任何一種物品的最有利益的方法，是在先滿足最切迫的需要；換句話說，凡物品的所謂「使用價值」並不在於單純的奢侈的慾望，如從前屢次所說的；而在於滿足真正的需要。

共產主義——換言之，即是適合消費、生產、交易三者通體觀察之一種組織——因此成了如此理解事態的論理的結果——在我們看來，只有這個才是真正科學的。

要滿足一切人的需要的社會，要知道生產應該如何組織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社會，

不可不掃盡關於工業的各種偏見，而最先應該掃去的便是經濟學家常常宣傳的分工說，我且在下章來討論。

第十五章 分工

從來的經濟學只記述社會中已發生的事實，而且只是爲着權力階級的利益來辨明此等事實。因此彼也贊成工業的分工。因爲覺得這是很有利于資本家的，彼便以此作爲一個原理。

近世經濟學的鼻祖亞丹斯密曾說過，試看鄉間的鐵匠。假若他對於製釘子的事不會熟練過，即使非常勤勞，一天也只能製就二三百個釘子。然而假若他別的事一點不做，專門製釘子，則他一天供給二千三百，也是很容易的。於是亞丹斯密便急急的下結論道：「分工罷！專門罷！專門的去做罷！我們單要那些只知道製釘頭或釘尖的鐵匠便夠了。我們用這種方法更可以增加我們的生產。我們可以更加富裕。」

那個被命定爲一生專門製釘頭的鐵匠完全失掉了對於他的職業的興趣。他因爲技能有限，便不得不盲從雇主，全然靠雇主的恩惠而生活，一年之中有四個月是要遇着

失業的事情。而且當他的工作可以用學徒來代替的時候，他所得的工錢便會減少。亞丹·斯密完全不會想到這些事，便叫道：「分工萬歲！這便是增進國富的真正金礦呵！」

後來，西斯蒙地 (Simondi) 與史露 (J. B. Say) 知道了分工不能使全體國

民富裕，只不過使富者愈富而已。被定為一生只是去做針的十八分之一的部分的勞働者，只有變成愚蠢，而且會陷于貧窮的地位。——這時候，官學派的經濟學家果會有何種的提議麼？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們並不會說過：——若勞働者一生只做一種同樣的完全機械的工作，便會失掉他的才智和發明的精神；反之，若一人兼做幾種不同的職務，其結果便可增加國民的生產力。總之，關於這樣的話，他們一句也不會說過。然而這却是我們目前的重要問題。

假若只有經濟學家來宣傳永久的分工和常常世襲的分工，那倒還不要緊，讓他們談談就是了。然而學者博士所倡導的思想很能深入人心，使一般人變成頑固者流；中產階級的人民，甚或工人常常聽見人說起分工，贏利，利益，債權等等當作已解決了的問題，

久而久之，到後來他們便也說和經濟學家的同樣的話；崇拜同樣的神怪了。

因此我們看見很多的社會主義者，有些甚至不怕指出現代經濟學的謬誤，但也承認分工。若向他們說起革命中的勞働組織，他們一定回答說，分工制是還該維持的；假若你在革命之前，是在做磨針的工作，革命後也應該照舊做去。自然你每天不會再做五小時以上的工作，然而你却應該永遠磨針，一直到你死；而同時却有別的人在研究機械，預備來使你一生能夠磨千百萬的針；還有些人則成爲文學，科學，美術等高尙的事業的專家。巴斯德是生來爲着發明牛痘的種苗的，你是生來爲着磨針的，革命要叫你們各人仍舊去做各人的事。唉！這個可怕的原則，對於社會是有害的，對於個人是殘酷的，這真是萬惡的淵藪，我們現在且將彼此的各方面來說一下罷。

分工的結果已爲我們所深知道了。這是很顯然的，我們人民因此被分爲兩個階級：一方面是生產者，消費很少，只做體力的工作，被擯在思想以外；因爲不用腦力，所以工作也做得不好；他方面是消費者，生產甚少，或竟自不生產，他們有替別人思想的權利，他們

的思想極愚蠢，因為他們對於那用手勞動的人的全世界，一點都不知道。土地的勞動者關於機械，一點都不知道，而機械的勞動者關於農業的事一點都不懂。近世工業的理想，便是叫一個小孩子管他，他所不能了解而且不必了解的機械。又叫一個工頭來監督他，要是他稍稍不小心，立刻便要受罰。工業化的農業的理想，便是不要所有的農業勞動者，只雇僱會做雜事的人來管理蒸汽犁和打穀機器。分工的意思，就是把人們一生的命運注定，——有的要在工廠中結繩，有的要做企業的監督者，有的要在煤礦的某一部推大的煤炭籠，然而誰也沒有關於那機械，那企業，那礦坑全體的知識。由此他們毀壞了對於工作的愛戀和發明的才能，而這兩者在近世工業的初期，實是我們所自誇的機械創造者。

他們對於個人要這樣做，對於各國也是要這樣做。人類被分爲國別的工場，各有他的專門。人們說，俄國爲自然所限定來生產穀物，英國來紡績棉紗，比利時來織布，瑞士來造就看護婦和女教師。而且各城市也將彼此的專門工作限定了：里昂織綢，奧威尼製花邊，巴黎造奢侈品。經濟學家說，這樣做便爲生產與消費開拓了一個廣大的地盤，而且這樣

做去，爲着人類的無限財富的時代便快到眼前了。

然而專門智識普及到外國的時候，這些大希望便消失了。假若永遠只有英國一處在紡織棉紗和大規模的金屬工作，永遠只有巴黎一處在製造華美的奢侈品，都做得很好，經濟學家便可以大談分工，不會遇到什麼反對了。

然而一種思想界的新潮流漸漸地使所有的文明國家都來自己製造。他們以前都是從外國或自己的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時努力謀脫離母國的羈絆）輸入各種物品，現在覺得在自己國內製造更有利益。科學的發見使生產方法普及，因此，本來在內地很容易生產出來的物品，而要用高價到外國去買，未免太不合算。也沒有人願意再這樣做了。分工說長久被人相信是極正確的，現在我們却看見這產業革命已給了彼一致命的打擊了。

第十六章 工業的分散 (註)

(註)關於此種思想的更完備的研究，見我的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一九二二年出版。——原註。

在拿破崙戰爭後，不列顛把法國在十八世紀末勃興的主要工業全完壞破了，而且占領了海上的霸權，竟所向無敵了。彼乘着這形勢，又知道怎樣利用其特權與便益，以圖實利。他便建立了工業上的獨占權，拿只有彼獨家能製造的物品去向鄰國收回代價，使彼の富裕愈見增加。

然而在十八世紀的中產階級革命廢除了農奴制，而造成了法國的無產階級之後，那受了一時挫折的法國工業，又勃興起來走向興隆的氣運了。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法國的製造業已可以獨立，不再是英國的從屬了。現在法國便成了有數的輸出國，每年輸出的製造品，其價值已達到六千萬鎊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工藝品。法國中製造輸出品，或靠外國貿易為生活的人實有三百萬之多。

所以法國已經不是英國的從屬了。彼也極力想獲得外國工業的某一部分，如綢與已做成的衣服之類的獨占權，而且已從此得了莫大的利益；然而法國也將永久失掉此種獨占權，猶之英國將永失其棉紗的獨占權一樣。

工業東漸，已達德意志。在五十年前，德國所用屬於高等工業的大部分製造品，都是由英、法兩國供給的。但現在却不是那樣了。在過去五十年間，特別自普法戰爭以來，德國已將彼的工業完全改造過了。新設的工廠裏都裝有最良的機械，從曼奇士脫家的棉紗，從里昂來的綢等等的最近創造的工業品，現在已經能夠在德國的新工廠中製造了。在里昂和曼奇士脫，曾用二三代的工人才能夠創設完備的近代機械，德國已完全採用了。德國設立了許多適合工業需要的工藝學校，其結果供給了一羣聰明的工人——能夠用手腕與腦筋二者勞動的實際技術家——與工廠。德國工業的出發點，便是曼奇士脫和里昂兩地經過了五十年的暗中摸索，努力和經驗才達到的地點。

德國國內製造業逐漸進步，因之英法兩國輸入德國的物品便一年一年地減少。到

後來不僅在亞洲，非洲，德國是英法製造品的競敵，便在倫敦，巴黎也是如此。一般短見的法國人便會高聲攻擊「弗爾克福條約」；英國的製造家便會解釋德國與英國競爭的理由，在於鐵道關稅的無差別，他們只囂囂於這問題的不重要的一方面，而把偉大的歷史事實忽略了。然而確實的事實是如此：從前在英法兩國手中的主要工業，漸向東進，彼來到了德國，這個少壯，富於精力，而且又有聰明的中產階級的國家，也要以外國貿易來增加彼此的富裕了。

德意志自從脫離了英法兩國的羈絆之後，已能自己織出自家的綿布，製造自家的機械——實際，便是製造一切的貨物，——這時候，主要的工業在俄國已有了根底了。俄國的工業不過是最近勃興的，其發展之速很可令人驚異。

在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時候，俄國差不多可說是沒有工廠。彼所需要的一切機械，鐵軌，機關車，細衣料等都是從西方來的。然而在二十年後，彼便有了八萬五千所的工廠了。此等工廠產出的貨物，其價值已增加了四倍。

舊的機械廢除了，現在俄國使用的鋼鐵全部，鐵的四分之三，煤炭的三分之二，機關車，客車，鐵軌的全部和幾乎所有的輪船，都是自家製造的。

據一般經濟學家說，俄國是應該永久為農業國的，然而俄國現在已急劇地發達為一個工業國了。彼在英國定購的物品差不多可說是沒有，在德國定購的也很少。

經濟學家說對於這些事實，關稅應負其責，然而在俄國製造的綿布，却與在倫敦製造的綿布一樣，皆以同樣的價格出售。資本是不知道什麼祖國的，德英兩國的資本家伴隨着他們國內的技師監督同往俄國波蘭去做製造業，其出品的優良，足與從英國輸入的最良物品競爭。若一旦把稅關撤廢了，製造業只能因此更得利。近來這些不列顛的製造業家又給予由西歐輸入的綿布毛織物等業以一個大的打擊。他們在俄國的南部及中部設立起廣大的毛織物工廠，裝置由布拉福德 (Bradford) 輸入的最完備的機械，因此，現在英法與三國所輸入俄國的，只有高等的綿布和毛織物，其餘的都在國內製造，在工廠和家庭工業兩處製造。

主要的工業不僅東漸，而且也蔓延及南部半島。一八八四年杜林的（Triest）博覽會已足以表明意大利工業品的進步；而且我們也不可不知道法意兩國中產階級互相嫉視的原因，便由於他們工業的競爭。西班牙也成了工業國了；同時在東歐，波希米亞（Bohemia）一躍而為工業的新中心，設置有完備的機械，而且應用最良的科學方法。

（註）此節法文來源句間略有差異，今依英文本——譯者。

我們也可以舉出匈牙利的主要工業的迅速進步，然而若要舉例說還是用巴西來做例子較好些。經濟學家斯定巴西應該永遠栽培棉花，當作原料輸出，一方面又從歐洲輸入棉布，作為交換。實際上，四十年前巴西僅有九個很可憐的小紡紗廠，紡錘之數不過三百八十五。然而在現在却有一百六十個紡紗廠了，共有一百五十萬個紡錘，五萬架織機，每年有五萬萬碼的織物輸到市場。

就是墨西哥，彼也能夠很好地自己製造棉布，不再從歐洲輸入了。至的美國，彼已脫離了歐洲的羈絆，現在很得意地發展彼の製造力到很大的程度了。

然而最足以反對工業的國別專門說的顯明的證據，便是印度。

我們都知道這理論：歐洲的大國需要着殖民地，因為要彼等供給原料——棉花，蠶絲，未洗的羊毛，香料等——於母國。而這母國雖自稱把精製品送與彼等，實在不過是把損壞的織物，機械上不完全的鐵材，以及一切彼自己用不着的東西送出去罷了。這些東西，在彼自身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然而彼却要用高價來賣與殖民地。

這理論便是如此，——而且這樣已經實行了很久的時間了。倫敦與曼奇士脫積蓄了財富，而印度同時便要破產了。在倫敦的印度博物館中我們可以看見的英國商人從加爾各塔 (Calcutta) 孟買 (Bombay) 等處收集來的前代未聞的財寶。

然而別的英國商人則具有極單純的思想，以為與其每年從英國輸入價值二千萬鎊，乃至二千四百萬鎊的貨物，不如就在印度本地用土人來製造綿布，更要便利得多。

起初這些實驗會得着失敗的結果。印度的織工——雖然在他們自己的組合內是熟練的職工——是不能忍耐這種工廠生活的；從利物浦運來的機械也是罕有的，而且

氣候也有大的關係；那些商人應該在英屬印度能成爲母國的說敵（像今日那樣）之前，去適應那已經深知道的新狀態。

印度現在有二百餘所紡紗廠，工人共二十三萬名，紡錘六百萬個，織機八萬架；此外還有製麻工廠四十所，紡錘四十萬個。每年輸出中國、荷屬印度、非洲的白綿布（向來稱爲英國專門製造的布）約值八百萬鎊。當英國工人常常失業陷於非常困乏的時候，印度的婦女每日得着六辨士的工錢，在用機器織造那輸出遠東各地的綿布。總之，聰明的製造業家完全知道日子不久就會到了，那時他們會不曉得怎樣處置那些從前織造英國輸出到各地的綿布的「工廠職工」才好。而且這也是顯然的：印度將來連一噸的鐵也不要從英國輸入了。至於使用在印度獲得的煤炭和鐵礦的第一困難，也已經除掉了；並且能夠和英國競爭的鑄鐵所已遍設於印度洋岸了。

殖民地以其工業品的生產同母國競爭，這真是可以組織二十世紀的經濟的要素。那麼，爲什麼印度不從事於製造工業呢？有什麼障礙呢？資本麼？——然而只要有任

人掠奪的窮人的地方，便有資本去的。智識麼？智識是不承認國界的。工人技術的熟練麼？——不，決不是，難道印度的勞働者還不及現在勞働於英國織物工廠中的無數？（豈不到十八歲的青年男女麼？）

（註）日文本作二十三萬七千，法文本作九萬二千。——譯者

(11)

看了各國的工業之後，再來觀察特別的部分是很有趣味的。

例如綢緞是十九世紀前半法國的重要物產。我們都知道里昂是怎樣成了綢緞業的中心市場。起初製造綢子的生絲集在法國南部，漸漸地從意大利，西班牙，奧大利，高加索，日本等處購來。一八七五年在里昂附近製綢子用的五百萬基羅（Kilo 或作斤）生絲內，只有四十萬基羅是在法國生產的。然而既是里昂可以用輸入的生絲做綢緞，爲什麼瑞士，德國，俄國又不能同樣製造呢？果然，齊利池（Zurich）附近村落的綢緞工業也發達起來了。伯里（Bâle）已成了綢緞貿易的一個大中心點。高加索地方行政廳也

從馬塞雇婦女，從里昂雇工人來教喬治亞人（Georgians）以完善的養蠶法，教高加索農民以織綢緞的技術。奧大利也做這種方法。德國得了里昂工人的幫助，也建立了織綢緞的大工廠。而美國在巴脫孫（Paterson）也做了這同樣的事業。

現在綢緞業已不再是法國的獨占物了。德國、奧國、美國、英國都能自己製造綢緞，而且現在法國所用的綢緞的三分之一，還是從外面輸入的。高加索農民在冬季織造綢手巾，所得的工錢，還不夠里昂的織綢工人的生活費。意大利和德國也送綢緞到法國。里昂在一八七〇年到七四年，輸出值四萬六千萬佛郎的綢，而現在的輸出額却僅有從前那數目的一半。實在，不久日子會來了，那時里昂只送高等物品及新樣式的東西到德國、俄國、日本去作爲標本而已。

而且在所有的工業中，都是這樣。比利時已失去了呢絨的獨占權；俄、奧、美各國也在製造呢絨了。瑞士及法領猶拉（Turin）已不能再握著鐘表業的獨占權；鐘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製造了。蘇格蘭也不再把精製的砂糖輸到俄國去了；而俄國的精製的砂糖反

而送到英國來。意大利雖沒有鐵和煤炭，却也能製造自己的船艦的甲板和構架了。化學工業不再是英國的獨占了；甚至在烏拉地方（Urals）也可以製造硫酸和曹達。在溫特沙爾（Winterthur）製造蒸汽機，曾博得世界的好評；而在現在便是那個既沒有鐵又沒有煤的瑞士，靠着彼此的優秀的工業學校，也能夠製造出比英國更良好而且價廉的機械。交易的理論便這樣地滅亡了。

商業的趨勢也同所有其他的東西一樣，向着分散的方面走去。

任何國民都知道，把農業和許多種類的工廠聯結起來是有利益的。經濟學家所嘆嘆稱贊的專門的分工，確實曾增加了資本家的富裕，但現在却已歸於無用了。反之，若各地方，各國民，自己生產他們所需要的小麥，菜蔬，自己製造他們所消費的全部物品，對於他們自己是很有利的。這樣的種類加多，便是以相互的協作，達到生產之完全發展最確實的保證，而且是進步的動因；至於專門化則為進步的阻礙。

農業要接近工廠，才能夠繁盛。當一個工廠成立時，立刻其附近必定要成立其他各

種的工廠，如此互相幫助，互相以發明來鼓勵，他們便得以增加其生產力了。

(三)

一面輸出小麥，一面輸入麵粉；輸出羊毛而輸入呢絨；輸出鐵料而輸入機械；這真是極愚蠢的事。固然因為運輸是要耗費金錢和時間的，然而我們特別注重的是：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在農業方面也是要落伍的；不能煉鋼鐵的國家，其他的工業也是只有退後的；而且假若一個國家不從事於各種不同的工業，則其國民的工業和技藝的材能永遠不會發達的。

在現在的生產界中，萬事都是要合體的。要是沒有機械，沒有大的灌溉力，沒有鐵道，沒有肥料製造所，土地的耕種是不能成功的。而且要使這機械，這鐵道，這灌溉機等等適應地方的狀態，非先要發達多少發明的精神，多少技術的熟練不可，然而在這只以鋤和鍤為耕具的時候，此種精神和技術是異常缺乏的。

假若田地的耕種得宜，而且能生出我們得正當期待的豐富的收穫，最重要的便是

工廠，製造所，鑄鐵所，與此田地同樣發達。於是種種不同的職業，種種不同的技藝，皆由此物興了，兩者皆爲着一個共同的目的盡力。——這些便是進步的真力量。

我們現在且想像某一都市或一個地方——不論大小——的居民第一次走向社會革命的路上去。

常常有人告訴我們說：「一點也不會變更的。」礦山，工廠等都被沒收爲國有，或社會共有，各人仍舊回去做他原來的工作，革命於是便完成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場夢罷了：社會革命之發生決不能如此簡單。

我們已經說過，若一日革命在巴黎，里昂，或其他任何都市爆發了，——若工人占領了工廠，房屋，銀行等，那麼，現在的生產，便會因此簡單事實而完全革命化了。

國際貿易將完全停止；外國輸入的麵粉也停止了；貨物食物的流通也停滯了。於是這起義的都市便不得不由自己供給，改造生產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假若彼不能做到這樣，便只有走向滅亡之一途。假若彼能夠成功，則可以使全國的經濟生活革命化了。

糧食的輸入額減少，而消費却增加了，製造輸出品的一百萬巴黎工人又失了業，此時從遠近各國輸入的貨物又未運到，奢侈品業也暫時停頓——那麼，在革命後六個月之間，人民拿什麼來吃呢？

我們想，在堆積糧食的店倉空虛了的時候，民衆便會想法從土地上面獲得食物。他們會知道耕田的必要，把巴黎及其附近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聯合起來的必要，他們會把裝飾業置諸不問，而先來想法滿足最切迫的需要——麵包。

大多數的都市居民都會變成農業家了。自然，並不像現在的農夫那樣，弄得精疲力盡，才能夠謀得一年中的飲食；他們要依市場園藝家和集約農法的原理，大規模地使用已發明及將來可發明的最良機械。他們要耕種土地，——然而却不像鄉間的牛馬：這樣的事一個巴黎的珠寶商也會反對的。他們依更優良的原則把耕作法改造過了；這件事不必在將來，便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中，為避免被敵人征服起見，也要即刻做到的。

假若那些聰明的男女利用他們現在的經驗快活地團結起來同做愉快的工作，當

他們從事於農業的時候，恰像百餘年前在香得馬爾（Champs de Mars）開的聯合大祭中勞働的人們一樣。——如果勞働不是過度的，又受着科學的安排，人人能夠發明和改良他的器具，而且自覺他自己是社會中一個有益的分⼦，那麼，勞働便是愉快的。

自然，他們並不專種燕麥及小麥——從前在外國定購的物品，現在他們也要自己製造了。我們還要記着：在起叛亂的各地人民看來，那些不加入革命運動的地方，也應該列在「外國的部分」內。在一七九三年及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時期中，巴黎連近在城門的鄉村地方也覺得與「外國的部分」無異。在一七九三——九四年多羅耶（Troyes）的穀物投機者會使巴黎的無種黨（Sans-Culottes）（註）受着絕大的饑饉，甚至還要比凡賽爾的陰謀者所引進法國的德軍給與他們（指無種黨）的打擊更要利害得多。所以叛亂的都市必須不依賴「外人」而自己去做，為什麼不做呢？法國當被大陸諸國封鎖，缺乏甘蔗糖的時候，便會發明甜菜糖來代替。當巴黎人民不能得外國輸入的硝石的時候，他們便會在自己的土窖裏發見了。難道我們還不如那些連科學的最初言

語還說不清楚的我們的祖先麼？

「註」一七九三年的「無賴黨」是那時平民革命的敵人給與革命黨的綽號；——見克氏的「秩序」

——譯者。

革命不僅是現在政治制度的變革而已。革命應包含着人類智慧的覺醒，以及發明精神之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進；這是像拉普拉斯，拉馬克，拉華西（Lavoisier）等，科學家的新科學的曙光。不僅是制度的革命而且是更深刻的人心的革命。

可是還有經濟學家向我們說，在「革命之後」各人都要回到他從前的工廠中，好像經過革命，不過與在芳丹卜羅（Fontainebleau）（英文本作Fontaine）樹林散步之後回到家裏一樣。

第一，所謂攫取中產階級的財產必須包含着工廠，製造所，造船所中全部經濟生活的完全改造。

革命是必要向着這方面行動的。若巴黎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被中產階級統治的

擁護者把彼與世界的交通斷絕了一二年，城內不會爲工廠生活所毀壞的百萬有智能的人民——鼓勵發明精神的那個小工業都市——不要外面的幫助只靠着那放射出光線的太陽的原動力，掃清一切不潔物的風力，以及在我們所踏踐的地中勞働着的沈默的活力，便可以把人們的腦力所能做出的何等事業表現出來了。

我們將會看見職業之種類不同，以及爲革命所激起的世界各地的互相協作能夠使幾百萬聰明的人都得着衣，食，住，以及一切種類的奢侈品之供給。

我們也用不着寫一部小說來證明這個。我們所確信的，所已經實驗而且認爲能實行的，很多都是可以有力地實行的，只要依着革命之大膽的鼓吹和民衆之自發的衝動，則其計畫便有效力而且活潑。

第十七章 農業

經濟學常被入非難爲從一個分明虛偽的原則中演繹出一切的，這原理即是：驅使人們增進其生產力的唯一刺激物是最狹義的個人一身的利益。

這種非難是完全不錯的；我們若想到在工業之大發明和大進步的時代中，人們都是在追求着萬人的幸福，而少有顧及一己的富裕的，那麼，我們會更覺得這是不錯的了。從來科學的大發明家和大研究者都是特別以謀人類的較大自由爲目的的。假若瓦特、司提文生、加攷德（Jacquard）等人當初能預料到他們夜以繼日苦心研究的結果，會使無數的勞働者陷於悲慘的苦境中，他們一定要焚棄他們的計畫，毀壞他們的模型了。此外在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通行的原則，也是一樣虛偽的。這是一般經濟學家所共同默認的：縱然在某一部類中發現了生產過剩的現象，社會仍還沒有充足的生產品以備足一切人的需要，因此人們不賣他們的勞力去求工錢的日子是永不會求到的。此種

默認是建立在經濟學家的一切所謂「法則」及學說的基礎上面的。

而且當任何文明的個人或團體自己發問道：萬人的需要是什麼？要用什麼手段才能滿足這些需要？這時候他定會明白在工業中與在農業中一樣，已有了很充足的物品足以應萬人的需要了，只要他知道怎樣應用這些手段來滿足真正的需要。

關於工業，這是確實不易，無人可否認的。我們只要調查大工業中採取煤炭及礦物，鑄造鋼鐵，以及大規模地製造用於衣服等上面的物品等等……所取的方法，我們便可看見生產額已能增加到四倍以上，而同時勞動也能減省。

我們再進一步說，農業和工業的情形也是一樣的。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一樣，已能夠增加他們的生產額不僅到四倍，而且還要到十倍以上；只要他們覺得這個的必
要——只要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建立起來代替了資本制度，他們立刻可以這樣實行的。

世人說到農業，無論什麼時候，總想像到一個農夫握着鋤，屈着腰，拿一些選擇得不

好的種子隨便撒在地上，於是便急焦地等候着那季候之順或不順所生產出的收穫；他們又想像到那自朝至夕勞苦不息而所得的報酬不過是粗拙的床，乾的麵包，惡劣的飲料的農民家族。總之，他們簡直在描畫拉布呂野（La Bruyère）的「野獸圖」了。

對於這些沉溺於如此苦海中的人們，社會所提出的最上救濟方法，不過是減輕他們的租稅和地租罷了。至於說使耕田者直立起來，每日得有閒暇的時間，只要勞動幾小時，則所生產的食物至少足以養活百餘人，不僅養其一家而已；——這樣的事，甚至大多數的社會改良派也還不敢想到的。一般社會主義者的最熱烈的未來的夢想，也還脫不了美國式的粗放耕作法（譯者按恰與集約農法相反）的範圍，這畢竟不過是農藝技術的幼稚期罷了。

然而有思想的農業家現在已有更廣大的理想了，——他的計畫的範圍更擴大了。他只要求一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生產出供他一家取用的菜蔬了；養二十五頭牛羊所需要的地面，並不比從前養一頭時所需的地面寬廣些；他的目的是要自己造土壤，並不去

管季節和氣候，只把那些嫩植物附近的空氣和土壤都弄得溫和的；總之，從前在五十年英畝田地中的收穫物，現在要在這一英畝中生產出來，不惟沒有何等過度的疲勞——反而會大大地減少從前的勞働量。他知道爲着養活所有的人的緣故，各人在田上勞働的時間並不要許多，恰恰各人所能夠快快樂樂地做去的。

這便是現在農業的傾向了。

農業化學論的祖師里比 (Liebig) 一流的科學家，因爲偏愛學理，往往走入謬誤之途，而目不識丁的農學家却開闢了到繁榮的新路。巴黎，多羅耶，綠昂的市場園藝家，蘇格蘭，英格蘭的園藝家，弗勒曼特 (Flaman) 龍巴底 (Lombardy) 的農夫，薩爾塞 (Jersy) 蓋爾奈塞 (Gueneey) 的農民，西西利諸島的農夫等等已開闢了極大的地平線，許多人的心都還不曾了解彼等的。在今日以前一農家靠着土地生產而生活，至少要十七英畝乃至二十英畝才夠，(農民怎樣生活這是我們所知道的)；而在今日若依集約農法來耕種土地，則我們再不能說什麼是可以生產一家族的一切必需(甚至畜

侈品也可以包含在內)的最小地面了。因為那時出產的豐饒，決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在二十年前(法文本作十年前)，人們已確定地承認大不列顛的二千萬人口，只靠着國內生產的物品，不從外國輸入什麼東西，便能夠生活得很好了。然而現在我們看法德英三國近來的進步，又注視那展開於我們眼簾前的新地平線，我們可以說不管土地的瘠瘦，只要以像現在許多地方已採用了的耕種法來耕種，那麼，這五六千萬的不列顛人民，和土地的生產物比較起來還是相差得很遠呢！

無論如何，(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我們且認定這是絕對證明了的：假若明日巴黎及其二州，西來與西萊愛俄斯一旦組織為一無政府主義的公社，萬人都來勞動，不要外國輸入一英斗小麥，一頭家畜，一籃菓物，他們只有這二州的土地，然而他們不僅能產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穀物，肉類和菜蔬，甚至一切現在視為奢侈品的食物也可以生產出來了。

而且我們還要肯定說，此種勞働的總量比較現在以奧威尼、俄羅斯等處收穫的穀物，用粗放農法在各處生產得很少的菜蔬，和南部地方生產的菓類來供給這二州的人民所耗費的勞働總量却少得多。

不必說，我們決不願把一切的交易完全廢掉，也不是要把那些只能在一定的季節和氣候中生產的東西，用多少人工的耕種法生產出來。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現在人們所了解的交易的理論，是過於誇張的，——交易常常無用而且有害。我們便斷言關於南部的葡萄栽培者，俄羅斯，匈牙利等國的穀物生產者等的絕大勞働，世人是不能了解的。倘若那些生產者廢棄了現所採用的粗放農法，而代以集約農法，則此種過度的勞働也可以因之而節省了。

(11)

在此我不能把我們的主張所根據的許多事實一一臚列出來。對於那些願意更進一步研究的人，我特把我的另一部著述：「田莊工廠與手場」介紹與他們。我們特別藉

對此問題有興趣的諸君去讀法國及其他各國出版的幾種好書，其書名列載於本書之末。（見附註一）至於大都市中的居民，對於農業的實際如何尚沒有真實的觀念，我們便勸他去攷察附近的市場農園。他們只要去觀察，去訪問園藝家，則新世界便會在他們的眼前出現了。於是他們更能夠看出歐洲的農業在二十世紀中應當如何了；而且他們會了解當我們知道了從土地中取出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祕訣以後，社會革命應當如何何強有力的武裝了。

我們只要舉出幾件事實便足以證明我們的主張，是決非誇大的了。我們且先來大體的討論一下。

歐洲農業陷於何等悲慘的狀態中我們是知道的了。土地耕作者縱不為地主所劫掠，亦必為國家所強奪。假若偶然國家的賦稅減輕了一點，然而同時放債的人又拿借據來束縛他們，實際上他們便成了某銀行公司的土地的租戶了。地主、國家、銀行家以地租、賦稅、利息三種東西來劫掠他們。掠去的數目，各國雖多寡不同，然而從不會在尚未得

的收穫物四分之一以下的，大概總要到收穫的半數。在法國與意大利的農業家近來纔納與國家的，竟到全體百分之四十四之多。

且地主及國家的所得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的。如耕作者以不可思議的勞働，發明或創意使生產額大爲增加，於是他應獻與地主、國家、銀行家的貢物，也要比例的增加了。假若每英畝的收穫增加了一倍，同時地租也要增加一倍，賦稅也要增加一倍，若其價格騰貴，則國家更要增加賦稅。其他亦以此爲標準。總之，無論何處，土地的耕種者每日總要作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的工；這三個禿鷹便把他所得的一切東西都攫去了；凡能助他改良耕作的一切東西，都被他們攫去了。這便是農業進步如此遲緩的原因。

耕作者只能偶爾有一點進步，而且只能在例外的地方，例外的情形下，乘着那三種吸血鬼自己爭鬥的時候，才做得到的。而且我們尙未說及各耕作者所納與製造業家的貢獻。每架機器，每個鋤頭，每桶化學肥料所售與他的價格總要較實價高三四倍。此外我們還要記着那從土地的生產中徵收多額的中間人（經紀人）。

在像現時這樣發明與進步的世紀中，而農業却只能在有限的地域中，偶爾有一點改良，是什麼緣故呢？其原因便在這裏了。

幸而我們還有那鷹眼所看不到的沙漠中的沃地；在那裏我們可以知道集約農法所能爲人類生產的究竟如何。我們且舉幾個例子。

在美國的平原（那裏只能在春季才有小麥的收成，一英畝可收到七英斗至十五英斗，而且常常還要遭定期的洪水的損害）只要用五百人，勞働了八個月，便能產出五萬人一年間所需要的食料了。有了最近三年的改良，則一個人一年間（以三百日計算）的勞働，便能生產出二百五十個人一年的食料了，（弄成麵粉在支加哥交付）這個結果是從手腕勞働之絕大節省而得來的；即在那些一望無涯的大平原上，無論耕種，割苜，打穀，差不多都是依着軍隊式的組織的。無益的各處奔跑，是沒有的，浪費時間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切的事都是做得很整齊的，恰像行列那樣的整齊。

這是大規模的農業——粗放農法，只取天然沃土，並不想加以改良。倘這一塊土地

的生產限量告竭，他們即捨棄而移到別的新地上去，又要把這地方的生產量取盡。然而這中間也有所謂「集約」農法的，即是以機械工作，而且逐漸加多機械的使用。其目的是要把一塊限定的地方耕作得很好，施以肥料，加以改良，集中工作而求得着可能範圍內的最大收成。此種耕作法年年向各處蔓延，在法國南部和美國西部沃野中的農民，用粗放耕作法，平均每年每英畝可收得十一英斗至十五英斗，他們便以為滿足了；而在法國北部則一英畝照例可收得三十九英斗，或五十五英斗，有時甚或可得六十英斗的。還要不到四分之一英畝的地面，便可以產出一人一年的消費量了。

耕作法愈集約，則因生產小麥所費的勞力亦愈節省。倘能在預備工作上和土地必需的改良上（排水，取除石塊等等）上均以機械來代替人力，則將來便可得到加倍的收穫，永遠是如此的。假若是普通的田地，不施肥料，也不要其他的什麼工作，只要能把雜草清除得乾乾淨淨，就可以年年豐收了。這在英國黑湖爾盤縣（Hertfordshire）的羅

散司德（Rohanstead）（註）內，已繼續實行了四十年了。

(註這是英國羅斯勳爵 (D. H. Popen) 一八一四——一九零零) 的田地。羅斯曾在他的田地上作過多

種農業的實驗。關於此事的書籍，除克氏在「附註」中所定的一種外，尚有海爾氏一九零五年的

「羅斯勳爵實驗的記載」(Hall: The Book of Rothamstead Experiments) ——譯者。

我們不要著什麼農業的小說，然而我却希望每英畝土地生產出四十四英斗的收穫。這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好田地，只不過施以合理的耕作便夠了；我們且看這種耕作法是什麼？

西萊及西萊麥俄斯二州的居民共有三百六十萬，其食料每年約需二千二百萬英斗的穀物（以小麥為主）；依我們的臆斷，他們要收穫這些生產物，那麼，在他們所有的一百五十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中，非耕作四十九萬四千二百英畝不可。當然他們不再用鋤耨耕作了，因為這個要費極長的時間，一日勞働五小時，共要九十六日，才能夠耕出一英畝。那麼，不如一次把全體的土地改良——應排水者排水，應坦平者坦平，取除石塊，縱然這種預備工作需要五百萬日的勞働（每日五小時），平均一英畝也只要十日

的勞働罷了。

於是他們用蒸汽犁來鋤田，一英畝只費時一日又五分之三，再耕第二次，每英畝也只需要一日又五分之三。種子也不是胡亂無定的集在一處，而是用蒸汽選擇過的，播種時是要整整齊齊一列一列的，不是像隨風吹散到四方那樣。假若這種工作是在良好的情形下做的，那麼，全體合計起來每日作工五小時，每英畝還要不到十日！然而倘若在三四年中費了一千萬日的勞働於良好的耕作，則其結果，後來雖把勞働時間減少了一半，也能在一英畝中得到四十四英斗至五十五英斗的收穫了。

如此，要供給這三百六十萬居民所需的麵包，只需要一千五百萬日的勞働便夠了！而且這樣的工作雖沒有鐵一般的筋骨的人，或從來不會在田野勞働過的人，也都可以做的。至於創意和工作之大體的分配，却非由熟悉土地的人來做不可。若說到工作本身，則居於都市中的男女學習了數小時之後，決不會連看守機械及農地工作之一部分都做不來的。

當我們想到在現在的混沌中，像巴黎那樣的都市裏，除掉上流階級的遊民外，還有十萬內外的各種職業的失業者，那麼，我們會知道單是在現社會組織中失掉了的人，力若用之於合理的耕作，便足以產出這二州三四百萬居民必需的麵包。

我們現在還要再說一遍，這並不是在做夢，而且此時我們尙未說出真正的契約農法來。我們並不曾以小麥（哈奈特（Haquette））在二年之間得到的，爲根據，小麥一粒，再種下去，便可生產五千乃至六千粒，有時甚至可得到一萬粒，五口之家有一百二十方碼的土地，一年所必需的麵包便夠了。反之，我們却只敘述法英比等國的許多農夫所既行而成功的，以及依今日大規模的實驗所得的學識與經驗，可以在明日做得到的而已。

然而要是不經一次革命，不說明日，便到了後日，這也是不能實行的，因爲這是與資本家地主等無利的，並且因爲那些知道他們的利益在此的農夫既沒有學識，又沒有金錢，更沒有時間，來得着進行所必需的一切東西。

現在的社會還未達到這個程度。但若巴黎人民起來宣告成立無政府主義公社，他

們便必要向着這個方向走的，因為他們決不會愚蠢到那樣的地步，還繼續着製造奢侈的玩具（在維也納，華沙，柏林，等處也都在造這種東西）去冒麵包缺乏的危險了。

而且，農業工作若得着機械的幫助，立刻會變成一切職業中最有趣味最快樂的了。他們要說：『我們已有很多的珠寶了，很多的木偶的衣服了，現在止是勞働者藉農業來修養體力，貫注元氣，玩味自然，尋求人生的快樂的好時機了，——這些都是他們在附近城市的黑暗工廠中，久已忘去了的事！』

在中世紀的時候，瑞士人脫去了王候的羈絆，與其說是靠着槍炮的力量，不如說是靠着阿爾普士一帶牧野的力量更恰當些。近世的農業也要使都市叛亂起來，打破中產階級聯合的勢力，而取得自己的自由。

(三)

我們已經看見怎樣巴黎附近二州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只要把他們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加以耕種便可得到足以供給他們的需要的麵包了。現在我們且來論牲畜。

便是食肉最多的英國人，其所消費的，平均也不過一個成年的人一年二百二十磅罷了。假定吃的是壯牛，則一個人還吃不到一條牛的三分之一。五個人（小孩在內）吃一條牛便很夠了。如此，則三百五六十萬居民每年的消費量也不過是七十萬頭而已。

以現在的牧場組織，養六十六萬頭牛，至少也需要五百萬英畝的土地。平均每頭牛需九英畝。然若換以泉流濕潤恰到適度的草原（如在法國西南部數千英畝中近來所已實行了的）則只要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便夠了。若再實行集約農法培養甜菜根以充秣草，則只要其四分之一，即三十一萬英畝便綽有餘裕了。若我們更用玉黍蜀，且實行亞刺伯人保藏秣草的方法（於秣草青時便割而壓榨之），則有二十一萬七千五百英畝的土地，便可得到十分充足的秣糧了。

米蘭（Milan）附近地方，向來用溝渠的污水灌溉的田地，共有二萬二千英畝，每英畝所生的秣草，只足以養二三頭牛；而在別的兩三處良好的田地上，只要十英畝便可收穫一百七十七噸乾草，可供三十六頭擠乳的牡牛一年的食料。在現在牧場組織之下，養

一頭牛需要着九英畝的土地，而在新組織之下，養九頭牛也只要二英畝半的土地便夠了。這正是近世農業中相反對的兩極端。

在蓋爾奈塞的已經利用了的九千八百八十四英畝土地中，差不多有一半（四千六百九十五英畝）是被穀物和菜蔬掩蔽了的；只有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還是秣草地。而在此五千一百八十九英畝中，却飼養着一千四百八十四匹馬，七十二百六十頭牛，九百隻羊，四千二百口豬；若把羊，豬等不算在內，平均每二英畝地可養三頭以上的牛。不用說，這些土地的膏腴自然是用海草和化學肥料造出來的。

返回來再說巴黎及其附近三百五十萬的居民，我們可看出他們飼養牲畜所需要的已要不到五百萬英畝的土地，只要十九萬七千英畝便夠了。但我們不要以這最低的數目為滿足，我們要行尋常的集約耕作法；在供給了衆人的麵包之後餘下的一百零一萬三千英畝中，拿出三十九萬五千英畝——若你們願意，四十九萬四千英畝也可以——作飼養小牲畜（可以代替牛的）所必要的土地。

我們且慷慨的承認，若要把這土地弄成合於生產的狀態，就算要五百萬日的工作時間。

只要在一年內，用了二千萬日的勞働（其中一半是用在永久的改良方面的）我們衆人都可得着麵包與肉類的保證了，至於家禽豬兔等肉還不算在內；而且還不會把那些有了上等菜蔬和果實，因之消費的肉量較少的人民算在內。這些人所消費的肉量實在比英國人消費的少得多，英國人因爲沒有充足的菜蔬，故以肉類來補充。試把這二千萬日的勞働（一日工作五小時）分配起來，一個人究竟應該擔負若干呢？實在少得很。在三百五六十萬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二十萬個壯丁，而且還有許多能作工的婦女。那麼，要使衆人都得着麵包和肉類，一日作工五小時，每人每年只作十七日便夠了。若說因擠牛乳又要加上三百萬日，甚或六百萬日的勞働，總共平均起來每年每人只勞働二十五日便綽有餘裕了，三種主要的食物都不會缺乏了，而且這種工作簡直是愉快的田間的運動。在現時這三種東西是十分之九的當家的人天天所焦慮着的。

我們又要來說一遍，這不是夢想。我們所說的盡是用大規模的實驗所已做到或正在做的一切。只要財產法和一般人的無知不來加以反對，農業在明日便可依此方針而改造了。

當巴黎人民了解了要知道食物為何及如何生產食物二者是公共利害的問題；而且任何人都知道此問題比較現時在議會中所討論的一切重要得多的時候，——那麼，革命便實現了。巴黎人民便要將二州占領而耕種之。巴黎的勞働者爲了要得那租額而且不足的食物緣故，會耗費其生涯的三分之一於辛苦的勞働，現在要在他的城堡（假若那時還有）的圍繞中，他的牆壁之下，自己來生產了，這只是幾小時的衛生的和有趣的的工作。

於是再來說到菜蔬和菓實。我們且離開巴黎，去參觀一個市場園藝家的設備。這個市場園藝家在距各大學約二三「啓羅」的地方，居然做成了不可解的奇蹟。（一般的經濟學家所不會知道的。）

譬如說我們所拜訪的是一位彭斯君 (H. Ponce)，他是某一本關於市場園藝的書籍的著者，他把土地所貢獻與他的一切，完全公布於世，絕對不會守着絲毫秘密。

彭斯君，尤其他的工人，都辛苦地像黑奴一般的勞働着。八個人耕種了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他們每天勞働十二小時乃至十五小時，即較實際必要的勞働多了三倍。他們共有二十四個人，並不算多。自然彭斯君會說這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每年須納地租一百鎊，從兵營那裏買肥料，又需要着一百鎊，既花了這樣可驚的巨款，他便不能不掠奪工人了。他一定會這樣的說：「我被別人掠奪了，我也要掠奪轉來。」當他開始這事業的時候，便花費了一千二百鎊，其中大半都是送到工業界遊惰的領主的手中去了。實際上，這個設備所費的勞働時間最多還不到三千日。

據我們調查他的收穫：十噸內外的胡蘿蔔，十噸內外的洋蔥，紅蘿蔔，小菜，六千顆洋白菜，三千顆花椰菜，五千籃番茄，五千打上等菓實，十五萬四千顆生菜；總之，即從一百二十碼長一百零九碼寬的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中，要生出百二十三噸的菜蔬和菓實，

平均一英畝可生出四十四噸以上的菜蔬。

然而每人每年所食的菜蔬及菓實至多不過六百六十磅；有了二英畝的市場園，便能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一年中食掉上極豐富的菜蔬了。因此，只用二十四個人來耕種這二英畝又十分之七的地坪，每日勞働五小時，只須勞働一年，便能夠生產出供給三百五十個壯丁的十分充足的菓實和菜蔬了。這三百五十個壯丁大概至少可等於五百個普通的人。

又從別一方面看：像彭斯君那樣的耕作，——現在已有超過他的成績的了——那三百五十個壯丁每年只勞働一百零三小時，便足以產出五百個人所必需的菜蔬和菓實了。

這樣的生產並非例外的。在巴黎，五千個市場園藝家在二千二百二十英畝的土地上便常常得着這樣的結果。然而因為平均每英畝地須納三十二鎊的地租，所以這些市場園藝家現在便陷於牛馬樣的慘狀中了。

難到這些人人都能確定的事實還不足以證明一萬七千三百英畝的土地（由五十一萬九千英畝中分出的）可以供給我二州的三百五六十萬居民一切必要的蔬菜及豐富的菓實麼？

至於生產這些菓實和菜蔬所必需的勞働，我們若以市場園藝家的工作為標準而計算，一日勞働五小時，不過五千萬日而已。（即是一個壯丁五十日的勞働。）若採用爾塞和蓋爾奈盛行的工作法，還可以減省一層勞力。我們還要記着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為要付那高無倫比的地租，便不能不生產早於季候的菓實，以求售得高價，因此他們更要更加勤苦；而且這種工作法所需要的勞働，比較生產平常的菜蔬和菓實所需的更要多得多。巴黎的市場園藝家因為沒有供給他的農圃多賴費用的力量，加之又不得不出高價去買玻璃，木材，鐵，煤炭等，故雖明知從溫室取熱費用較少，也只得仍舊從肥料中取人工的溫熱。

（四）

今之市場園藝家爲了要得此種可驚的收穫的緣故，便不得不變成了一種機械，而捨棄了人生的快樂。然而這些辛苦勞働的人，對於人類確實會盡了一個大貢獻，即是教我們知道，土壤是可以「製造」的。他們用肥料的駝床製造土壤，這肥料的駝床對於植物的苗和早生的菓實所必需的溫熱是已有了功效的；他們製造出的土壤是很多的，若不分賣出去，則農園的地面每年要增高一英寸。他們製造的成績是極良好的，〔巴拉爾（Barthel）在他的農業字典中的一篇關於市場園藝的論文內會這樣告訴我們〕所以近時的契約中規定着，倘市場園藝家離開他現在的地方遷往別處的時候，他可以把他土壤帶去。肥土是要和各種器具，玻璃格子一同放在車上運去的，——這便是實際耕作者對於里加圖派（認定地租是均平土地的天然利益之方法的）的博識議論的答辯。『土壤生出人所生的價值。』這便是園藝家的格言了。

然而巴黎和綠昂的市場園藝家若想着與蓋爾奈漢或英國的同類勞働者所得同樣的結果，則必須要較後者更加三倍的勤苦。因爲後者把工業應用到農業上，用溫室

的方法，更進而製造氣候。

在五十年前，室溫不過是富貴家獨享的奢侈品罷了。其爲用只是培養外國植物供其娛樂；但現在却漸漸的爲一般人使用了。近來在蓋爾奈塞和基爾塞已發生了大工業了，在這兩個地方有幾百英畝的土地是用玻璃罩着的——還不會算入其他各地小農園中無數的小溫室。又在倫敦市外的威孫（Waltham）在一九一二年共一百零三英畝）和其他英格蘭、蘇格蘭的各地方，幾英畝的溫室正在不斷的建築咧！

彼等的建築有種種的：最上等的是以花崗石作牆壁的，下等的是用木板和玻璃格子製的，僅足以蔽風雨而已；像後者的建築費，縱加上應納與資本家經紀人等的各費，現在總共也不過是玻璃罩着的每一方碼，還不到三先令六辨士。一年中大概至少要三四個月；而且還有全不需要熱的冷的花房也能產出很良好的出品——自然，不是葡萄及熱帶植物，而是馬鈴薯，胡蘿蔔，豆子，番茄等物。

人類用此種方法便可脫離氣候的束縛了，同時像在暖床那樣辛苦的勞働也可免

掉了，一方面肥料可以節省，一方面工作也可以節省。每一英畝中用三個人，每個人一星期作不到六十小時的勞働，從前要幾英畝的土地才能夠產出的東西，現在在極小的地方便生產出來了。

凡此等近世耕作進取的結果，即是，若某一個都市的壯丁的半數勞働了五十日，（每日五小時）來培養不合季節的最新鮮的菜蔬和菓實，那麼，他們便可以供給這都市全人口一年所需要的此類菜蔬和菓實而有餘。

然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實，我們不應該忘去的。在今日，溫室已有變成單是玻璃罩下的菜園的一種傾向。因為只用於這個目的，則只要有玻璃和木板罩着，不要溫暖，便可得着驚人的收穫——譬如馬鈴薯的第一次收穫在四月末，一英畝能收得五英斗；此後在玻璃罩下的夏天之最高溫度之際，也可得第二次第三次收穫。

我在田園工廠與手工場一書內已舉出很多傾向於這方面的事實了。在這裏只說這一點就夠了。在礮爾塞，用三十四個人勞働，其中只有一個熟練的園藝家，耕種在玻璃

罩下的十三英畝的土地，他們便可得着一百四十三噸的菓實和早生菜蔬；而這種非常
的耕作所費的煤炭還不上一千噸。

在磯爾塞和蓋爾奈塞已經大規模的實行這個了；單爲着輸出這些溫室中的收穫
物的緣故，已有無數的汽船不斷地航行於蓋爾奈塞與倫敦之間了。

現在要同樣收穫五百英斗的馬鈴薯，我們每年必須耕種四英畝的地面，還要做種
殖，培養，耕耘等等的工作；然而在玻璃罩下，縱然起初因造溫室的時候每一方碼的地面
大概每人要費半天的勞働，——但以後在每年的勞働量中，却要較前節省一半，甚或省
至四分之三了。

這些都是事實，任何人都能夠自己確認的成績。這些事實所暗示的是：若人們能巧
妙地運用土地，便可以從土地中得着何等豐富的物品了。

(五)

我在上面所說的都是曾經過了實地試驗的，如田地的集約農法，灌溉的牧草地，

室以及玻璃罩下的菜園，完全是實在的東西。而且這些耕作方法漸漸地擴張和普及，這個傾向我們已可看見了，因為此等方法使生產加多而工作減少，而且生產更較前為確實。

實在，若去考察蓋爾奈塞的最簡單的玻璃棚，我們敢完全斷定四月中在玻璃下收穫馬鈴薯所費的勞力，比較在露天之下收穫時所費的勞力少得多，若在露天裏耕作，則必須掘四倍大的土地，又要做灌溉鋤草等事情。假使採用完全的器具和機械，雖最初要用去一筆巨款購器具，可是後來却能使勞力大大地節省。

關於在玻璃罩下普通菜蔬的耕種之完全的精細計算現在還沒有。因為這些耕作法是近來才開始採用的，所以實行的地方還少。然而關於這五十餘年來早生葡萄的耕種法之計算却已有了。這些計算是極其明確的。

在英國的北部，蘇格蘭的邊界上，凡炭坑附近的地方一噸煤炭的價格不過是三先令，人們久已用彼等來培養暖室中的葡萄了。三十年以前，這些葡萄在正月裏成熟後，培

養者便以每磅二十先令的價格出賣了，販賣的人買到後，又以每磅四十先令的價格轉賣與拿破崙第三的手下人，而供奉於拿氏的食桌之上。而在今日這同樣的培養者只要得着每磅二先令六辨士的價，便把他的葡萄出賣了。他自己在一本園藝雜誌中這樣地告訴我們。價格低落的原因，是在正月中許多噸的葡萄不經地出現於倫敦與巴黎。

靠着煤炭的廉價和耕種法的巧妙，葡萄和尋常菓實的方向相反，漸漸從北部移到南部了。其費用是極少的，所以在五年裏英國和薩爾塞的園藝家僅以每磅一先令八辨士的價格，便把他們的葡萄賣去了，而且此種價格恰與三十年前的四十先令的價格一樣，只是由弛緩的生產所維持着的。

在三月裏，比利時的葡萄六辨士賣到八辨士，而在十月裏，很多的葡萄培養出來了，——在倫敦附近地方，玻璃下，稍加一點人工的熱度便可產生的——每磅的售價恰與瑞士和萊茵的葡萄園裏的售價相同，即是每磅售價一二辨士而已。然而這仍要較實費高過三分之二，因為這個園藝家要支付過高的地租，以及開業的費用，和溫度的經費等。

與資本家和經紀人。若能了解這個，則我們可以斷言當秋冷之時，在我們的深霧的倫敦，以及和彼在同一緯度的地方，只要以「幾乎少到沒有」的費用便可得到甘味的葡萄。如在某都市附近的地方，靠近我們的屋子的長九英尺十英寸，寬六英尺半的一個灰泥塗抹的破舊玻璃屋，在十月裏也能收穫五十磅的葡萄，這樣已繼續地行了九年了。這收穫是從漢堡的已長了六年的葡萄莖來的。而且這玻璃屋又漏雨。在夜裏的溫度竟會與外面的一樣。這顯然是不能加熱的，因為這恰和街道一樣，加了熱又有什麼益處呢？所應加以注意的便是每半年光景把葡萄藤修剪一次，把一車的肥料放在種在欄外赤色黏土中的葡萄莖的周圍。

（註）便是這葡萄莖自身也可以表示出二三代園丁之苦心的研究。這是一株漢堡的變種，極適於寒冷的冬季；要受着冬天的霜，才能夠成熟。——法文本註。

在他方面，我們若估計萊因或利滿湖（Lake Lemna）的附近地方培養葡萄所需要的費用：在山的斜坡上疊石重重，築起的平場，把肥料和土搬運到二三百英尺高的上

面去……等等，我們便可得着下面的結論：即全瑞士或萊茵河畔培養葡萄所必需的工作的費用，比較在倫敦市外的玻璃棚下的費用更大得多。

這似乎是離奇之論，因為一般人都相信，在歐洲南部葡萄是自然生殖的，栽葡萄的人並不必再有什麼花費。然而農業家和園藝家却不反對我們的說法，而且反來確證我們的主張。英國園藝雜誌的主筆兼實際園藝家的某君曾在十九世紀雜誌中說過：「在英國最有利益的耕種，即是培養葡萄。」而且葡萄的市價自身即可證明的。

若把這些事實譯成共產主義的用語，我們便可下斷語道，在歐洲的任何氣候中，簡單的玻璃棚下培養二三株葡萄，人們（無論男女）只要每年把他的閒暇時間分二十小時出來，稍稍費點神來看顧，——這種工作大概是極愉快的——就能夠產出他的家族和朋友所需要的十分充足的葡萄了。這種說法不僅適用於葡萄，而且可適用於一切的菓樹。

一個公社若大規模的實行集約農法，則公社的各居民每人每年只做十小時內外

的勞働，就可以得着各種各類的內地產和外國產的一切菜蔬和一切所希望的菓實。

實在，以直接的實驗來確證上述的事實，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且假設有一百英畝輕鬆的肥土（像在威孫的那樣）搬到了一些市場農園裏，每一個農園都有養育幼苗和種子的玻璃屋。又假設還有五十英畝蓋着玻璃屋的土地，而且全體組織都由那有實地經驗的法國的市場園藝家（Marchés）與蓋爾奈塞或威孫的溫室培養者來辦理。

要維持這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以磯爾塞地方的平均數為準，在玻璃棚下的每英畝地需要着三個人的勞働，——每年要不到八千六百小時的勞働——一百五十英畝的地需要着一百三十萬小時的勞働。假若其中有五十個適當的園藝家每日在勞働五小時，則其餘的勞働雖由那些毫無園藝技能只會使鋤鉞搬取植物的人來做，也行了。但此種工作至少也可以產出四五萬人必需的，以及不必需的蔬菜菓實等了。（我們從懶章便可知道了。）在這些人數當中，有一萬三千五百個壯丁，他們願意在菜園中勞働的。

每個人一年中只應勞動一百小時便夠了。這種勞動無異乎是在比較傳說中的「賽米拉米斯」(Sennirams)還要美麗的菜園內同着朋友及兒童們娛樂一般。總之，這種勞動時間實在和愉快的保養時間無異。

這便是使我們能夠吃充足的菓實和豐富的蔬菜所費去的勞動的出入帳；現在我們的菓實是被人掠奪去了的，至於菜蔬，則我們的管家婦只拿有限的量與我們吃，因為她恐怕資本家多掠奪去了兩三個辨士。(見附註二)

在將來，人類一定能夠自覺到什麼是他所能做的，這種自覺便會給他以要做的力量。

他會知道到現在妨害着一切革命的暗礁便是精神的怯懦。

(六)

我們能夠很容易的認出在社會革命前面的新地平線。

當我們每次說起革命的時候，那些會見過孩童受餓的狀況的勞動者一聽見了，臉

便沉下來了，問道：「麵包究竟怎樣？假若各人盡量的吃，也夠麼？假若那個常是反動派之無知的機械的農民像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時的惡黨（Bandes Noires）那樣，使我們都市居民陷於饑餓之中，我們又將怎樣做呢？」

任他們盡力去作惡罷！大都市不依靠他們，也能夠生存了。

那麼，今日窒息悶居於手工場及工廠中的無數勞働者恢復了自由以後，又將被壓主用於何處呢？難道在革命之後，他們還要繼續把自己鎖閉於工廠麼？當穀物之貯藏告罄，肉類缺乏，菜蔬絕種的時候，他們不想法繼續生產，還依然製造輸出的奢侈的玩具麼？決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要離開都市而走向田間去的！他們靠着身體極弱的人也能夠使用的機械之幫助，要使從來受着束縛的農業起了革命，猶如在一一切制度和思想中起革命一樣。

許多英畝的土地都要爲玻璃所蓋着，無數的男女都用他們的織織手指來保護草木的幼苗，俾其成長。又有許多英畝的土地是要用蒸汽牽來犁過，用肥料來改良，更把岩

石弄成粉末造成人工的土壤來肥沃土質。偶爾來勞動的愉快的羣衆，會把豐饒的收穫出現於這許多英畝的地面上了；這時候，偶爾的勞動者的工作和實驗，一方面是受着精通農事的人的指導，一方面由那從長夢中驚醒起來而且爲光亮的烽火——萬人的幸福——所照耀着的人民的偉大實行精神引導着前進。

而且在二三月之內，早生的收穫便可以滿足最迫切的需要了，然後供給人民的一切食物，這人民盼壞了千百年到現在至少也可以緩和他們的饑餓，而儘量地大吃了。

同時那反叛了而且自知其所需要的國民中最孚人望的天才便更進一步盡力於農業的新方法之實驗；這些新方法我們已略窺見其端倪，只需要再受着實驗的洗禮，使之得一般人採用便很好了。第一受着實驗的便是「光」——這個未知的農業力作者在雅諾次克（Yarkich）的緯度之下，四十五日之間，便可使大麥成熟了；人造的或集中的「光」在速使植物之生長的工作上，將要和「熱」競爭了。將來的種箱（Grain box）會發明一種機器把太陽光線導來使之工作，於是我們不必再求地底的煤炭中所

貯藏的光熱了。其次實驗培養細菌來灌溉土地的方法——這僅是昨日才以為是合理的思想，我們依此，可以把那些能培養植物支根，分解與同化土壤成分的微細生物放在土地裏面。

往後他們還要實驗……但是我們就說到這裏為止，否則便要走入空想的領域中了。我們且來研究確已得到的實際事實。我們若用那和工業競爭得勝了的大規模地使用的耕作法，則我們的愉快的勞働即可得到安樂與奢侈。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可以明白近世科學的發見已指示了端倪的各種方法，如何可以實行。現在我們且專門來闡明那存在於人類的需要及滿足此等需要的方法之研究中的新道路。

革命有時所缺乏的，便是創意的勇敢。

我們的心在少年時代便被養成極狹小的了，而且在成人時代又被過去的事實所束縛着，因此幾乎不敢思想。對於一種新思想，在表示我們自己的主張以前，却必要去參考百年前的陳腐書籍，以便知道古賢先哲對此問題的主張如何。

假若在這次革命中，創意和思想的勇敢是不缺乏的，則決不會因食物而失敗的。

在法國革命的偉大日子中，最偉大最美麗的一日，便是從法國各處來到巴黎的委員爲着聯合大祭日的準備，一同拿起鋤頭來鏟平香德馬爾的土地。

那一天全法國結合成一個了；法國受着此種新精神的鼓舞，在這共同耕種土地的勞働中，也可以得了一點其將來的眞面影了。

而將來已得了自由的社會，由於土地的共同勞働，便可以發見其結合力，而消滅那使他們分裂的憎惡與壓制了。

因此，新社會若能了解了休戚相關，————即那個使人們的精力和創造力增進了百倍的絕大力量，——便會以所有青春的氣力，向着未來之征服前進。

若社會既不再替不知道的買主生產，而只求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嗜好，則彼不特能完全保證各分子的生活與安樂，而且還使他們各人都得着隨意選擇工作，隨意完成工作的自由，和由此生出的道德上的滿足，以及不擾亂他人生活時的自己生活的快樂。

休戚相關的感情所生出的新勇氣鼓舞着我們大家一同向着占領智識和藝術創造的高尙娛樂之目標前進。

受着這樣鼓舞的社會是不怕內訌和外患的。對抗着舊勢力之結合的便是新的和諧，各人和全體的創意，以及由人民才力的覺醒所生出的勇氣。

在這種不可抗拒的勢力之前，「謀叛的王公」是沒有力量的了。他們不能做別的，只有低頭屈服，去作駕車的馬，拖起人道的馬車，向着社會革命所開闢的新地平線馳去！

(完)

附註

(其一)

參考以下各書：

La Répartition métrique des impôts by A. Toubeau, two vols., published by Guillaumin in 1880. (我們對於杜波林的結論毫不贊同，但該書乃是指示證明從地中可得如何收穫的材料之真正事實。)

Le Culture maraîchère, by M. Ponce, Paris 1869.

Le Potager Grasset, Paris 1885. 第良一本實地的工作。

Physiologie et Culture du blé, by Risler, Paris 1881.

Le blé, sa Culture intensive et extensive, by Lecouteux, Paris 1885.

La Cité Chinoise, by Eugène Simon.

Le dictionnaire d'agriculture, by Barrai (Hachette, editor)

The Rothamstead Experiments, by Wm. Fream, London, 1898, "Culture without manure, etc. (the "Field" office editor;)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by the author, (Thomas Nelson & Sons,)

(其二)

關於農業所述的計算，即證明西萊和西萊愛俄斯二州的居民每年只須費極少的時間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働來生產食物就可以過着完全安樂的生活的計算，現在概括如左：

西萊和西萊愛俄斯二州

一八八九年居民數

三·九〇〇·〇〇〇

土地面積 (英畝)

一·五〇七·三〇〇

每英畝居民平均數

二·六

因養育居民所耕作的土地面積(英畝)：

穀類

四九四,〇〇〇

天然和人工的牧野

四九四,〇〇〇

蔬菜和菓實

從一七,三〇〇到二五,〇〇〇

其餘房屋,道路,公園,森林等所占面積

四九四,〇〇〇

因耕作及改良上述土地的面積一年中必需的勞働日數(每日五小時)

穀類(耕種與收穫)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牧草,牛乳,牧畜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市場園藝,上等菓實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臨時的勞働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若強健的壯丁（男女都包括在內）的一半願意從事於農業，則七千萬日的勞働，分配與一百二十萬人，每人每日勞働五小時，每年只要勞働五十八日便夠了。那麼，二州的人口所必需的一切麵包，牛乳，菜蔬，菓實等，無論是作普通用的，或奢侈品用的，都可以得到了。在今日一個工人要得到他的一家必需的食物，（其實大體總是不會滿足過他們的需要的）所費的時間，至少要占他的一年三百天勞働日的三分之一，即並不是二百九十小時，而是一千小時。換句話說，他竟要多勞働七百小時來餵肥那些遊民和所謂支配者；他們不能自己產出自己的食物，却從商人那裏去買，商人又向農夫那裏去買；農夫因為被國家和地主掠奪了，不能得到良好的器具，只得用那粗惡的器械，勉強打起精神去勞働，因此不能得着良好的收穫。

正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郡可船序	三	十	十五	奇	寄
自序一	五	三	二四	願	願
	五	八	三十	略?	略!
自序一	十一	十		綠昂列恩	綠昂列恩
	十二	二		雅各賓	雅各賓
	十二	六		雅各賓	雅各賓
自序二	十九	六	六	店	居
	二三	二	十一	勞	勞

三三
三四

三七

五五

十五
二七

獲十

獲千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克氏全集

第二卷

麵包略取

著者

克魯泡特金

翻譯者

蕭甘

發行者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

價目

精裝本實價壹元六角

55